最后的闺秀



张允和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允和近影(纪红摄)



周有光、张允和仿佛老年之宝玉、黛玉共读《西厢记》。
(李荣增摄)



周有光在追求张允和时说："我一无所有，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答道："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933 年 4 月 30 日，周有光、张允和结为秦晋之好。温暖的爱绵延至今，俊美的新婚夫妇变成了一对幸福的老寿星。



1994年，张允和与周有光在家中。



1938年，周有光、张允和在重庆南温泉。由于日寇入侵，战争使他们痛失小女儿，儿子也差点死于流弹。国难当头，家家都有一段伤心史。



1947年3月，周有光、张允和在美国耶鲁大学草地上。芳草萋萋，风和日丽，而他们心里只惦记着内忧外患的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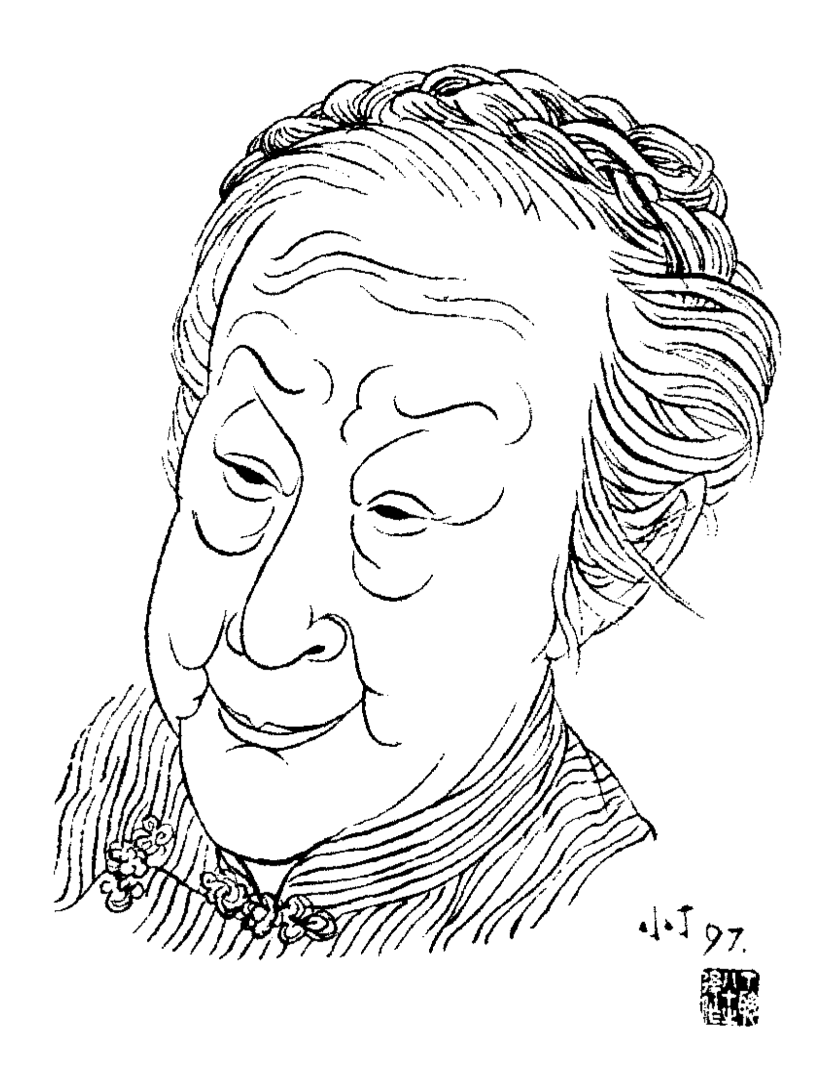
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周有光学问涉猎既深且广，是“几合一”式(many in one)的博学者。图为1947年5月周有光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前。



1948 年，英国剑桥大学留下了周有光、张允和这两位中国学者的身影。



1953 年，周有光、张允和回到苏州老家。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对改变祖国落后面貌，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小丁97.


小丁88

前 言

叶稚珊

肯让我写前言的作者一定很年轻，初出茅庐，不为人知。是的，这位作者"二八年华"，本书是她的处女作。

我只看了书的目录，因为多数篇章我已先睹为快，有的还很熟悉。我有机会经常接触作者，而作者的才华风貌，她的人格和性格魅力都远远超过了她的作品。相信看到她的作品的人都一定想见见作者，因为她的作品所叙及的人和事只有少数幸运者可经历和触及。这些充满暖意和怀旧感的棕色老照片，通过她那纤细的手，将温婉而又充满快乐的感觉传递给我们。她本人就是一部由特殊时代、特殊环境、特殊经历，优秀的先天基因和后天造化而成的完美作品。

这些话用在作者身上如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无论我怎样费尽心机地去描述，你也不会想像出就在这车海人流中，在这由高楼和商品构成的喧嚣的大城市里，在普通的居民楼里，她的生活意境却远远高于、雅于庭院深深，深几许。

精于丹青，擅长摄影，生花妙笔，即使你有七十二般武艺，想让没有见过她的人通过你的描述"认识她"吗？

我有过自信，"二八年华"的丰仪，不信我就写不出来。从未遇到过的炎炎夏日里，我对着电脑，对着纸笔，坐立不安，汗流如注，不敢接编辑催促的电话，结果还是一张白纸，最新最美的图画始终没有画出来。这真是不能全怨我无能：此景只应天上有……



口头、笔头的表达都不足以形容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可我又实在不甘心，总想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她的生活。我相信，无需更多的语言，只要亲眼看一下她的日常生活，记录她随便哪一天的生活内容，就会引起你心灵的感动。这种感动不是疾风暴雨式的，你会沉静下来，在沉静中体味，由表及里，然后由衷地期盼也让自己的孩子来看一看。许多次，我带着所信赖的朋友，带着他们的配偶和孩子，虔诚地一睹其芳华，悄悄地扩大着“追星族”的队伍。

在她的处女作之前，作者还有几件事也许可以问鼎“吉尼斯”：八十六岁开始学电脑打字，而她并不认识汉语拼音，她从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注拼音开始，不到一年便敲打自如。当然还有前提条件，作者的丈夫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被沈从文称为“周百科”的周有光先生。周有光是名副其实的护花使者，无论何时，一声“帮帮忙”，他立刻离开自己的电脑，穿过饭厅，站到卧室里的另一台电脑前。作者打出的每一字都有丈夫的温言软语和盈盈笑意，因此她最先会打的是“亲爱的”三个字。

第二项“吉尼斯”是：以八十七岁高龄使停刊七十年的家庭杂志《水》得以恢复。复刊词说：

> 七十年前，我们张家姐妹兄弟，组织了小小的刊物叫《水》。那时我们年少，喜欢水的德行，正如沈家二哥（从文）说过：
>
> “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
> 如今，我们的“如花岁月”都过去了。但是，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我们有下一代，下下一代，我们像

细水长流的水一样，由点点滴滴，流到小河，流到大江，汇入汪洋大海。

这本由作者任主编、校对、发行的刊物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捐款和赞助，发行量二十五份，如今已出了六期。高山流水知音多，许多人闻讯来函希望能成为长期订户，但多不能得到满足。

张允和先生年方二八，不是“那一个”如花的二八，而是“这一个”比花更美的88。四个玉润珠圆的0，两个喜性吉祥的不倒翁。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夕，张先生给几个年轻的朋友发出了邀请信：“亲爱的……和我一起度过最幸福的一天。”九十二岁的周先生喜作海阔天空的漫谈，他对每一个领域涉足之深令专业工作者也感到钦佩、敬重。他对新的信息捕捉之灵敏，令年轻人也惊讶。他是学金融经济出身，曾在大学任教；近五十岁时改行研究语言文字，成为汉语拼音的首创者之一；他是《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著书立说不再受他的专业所限，他的随笔是报刊的“抢手货”，立意之高、之雅自不必说，文章似不用动一字，也不能动一字，编辑们慨叹作者都像周老这样，恐怕自己就要失业了。周先生受张先生影响是昆曲爱好者，张先生受周先生影响是评弹爱好者。在欣赏这种纯粹民族、古典的艺术时，他们也不忘为其注入现代生机。他们在一些专家朋友的协助下，饶有兴味地用五线谱、简谱、中文、国际音标、英语拼音等记下了评弹的词和曲，使无论哪国的音乐家拿起乐谱就可以演奏或演唱。以学术为乐，把娱乐学术化，这是他们生活取之不尽的快乐源泉，也是他们能使青春永驻的健身健脑秘诀。

“快乐极了”、“得意得不得了”几乎成了张先生的口头语，每一次打电话，她都会按捺不住地这么说。每一天都“快乐极了”的张先生为什么五一节“最快乐”？周先生说：“我们是4月



30日结婚，第二年结婚那天生的孩子。两件喜事都是在劳动节的前一天。”

张先生还不定期地请一些“亲爱的”来参加“一壶酒、一碟菜”的“蝴蝶会”，这本是曲友聚会的做法。大家古今中外、文学戏曲，自由漫谈，还在酒席上行“新水令”（因来客多不能饮酒，故以水代之。“酒令”变成为“水令”。——编者注）。她精心写好一张张诗词、曲牌、格言、妙语，放在一个古瓷瓶中，轮到谁，罚清茶一杯、罚讲笑话一则，罚唱一曲……今年7月5日的蝴蝶会，张先生一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四座皆惊、皆叹。我特意拿了一张下署“光、允”的水令，上面写着：

人老去星星非故
春又来年年依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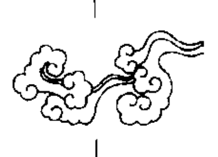
认识周先生、张先生十年多了，“年年依旧”而人并未见老去。在这次蝴蝶会上，张先生命我为她的文集写前言，我诚惶诚恐，万万不敢当。可是张先生说：“《半个字的电报》是你发的，《水》是从你这儿泛滥的，这个任务只好由你来完成。”想一想，我当年把她的名作《半个字的电报》发表在《群言》杂志上，又收入《当代女性散文精粹》中，还在《新民晚报》上写了《有一本杂志名为“水”》，都不曾想到会给这对习惯于安静生活的老人带来多少麻烦，只是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精彩的文章和这种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生活，是一种责任感驱使我做了这些事。

今天为了满足张先生希望这本书的作者、编辑、前言、后记都是女性所为的愿望，我斗胆写下这篇前言。不管是不是有人指责我不自量力，只要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本白发才女的杰作，我都会“快乐极了”！

（1997年9月）

目　录





两口子

伤痕篇

忆恩师

爱昆曲

长相忆



人之初

人们救活了我

奶妈哺育了我



本来没有我

1909年，在安徽合肥龙门巷的一所大院里。夏天的早晨，不到3点钟，中国人说这是丑时。一个女娃娃离了娘胎。人家都是哇哇地生下来的，而我是默默无声地落草的。一个没有生命的小东西。

老人们告诉我，脐带紧紧绕了我的细脖子三圈。窒息得太久的婴儿，小脸已经发紫。我的老祖母，坐镇在产房里，千方百计要把死的搞成活的。

这一年夏天，比往年更热。我是阴历六月初九，也就是阳历7月25日生的。在这六月的天气里，产房里的一群妇人围绕着这个不满四斤重的婴儿，忙得汗流浃背，气都透不过来。比起鲁迅文章里的九斤老太，我是惭愧得很。

收生婆先把三圈脐带解开，再把婴儿倒拎起来，给我挨了几十个屁股，我不怕痛，不吭声；又用热水、冷水交替着浇婴儿的背和胸，我不怕热，更不怕冷，也不吭声。人工呼吸，那时是新的玩意儿，也算是采用了。我只是不吭声。先后用了十几种方法，我就是不吭声嘛！时间一分、一刻、一小时地过去了，已经过了上午10点钟。我始终绷着越来越紧的小脸，再也不吭声。

有人说，这个女娃娃不会活了，已经花了七个多钟头抢救。她是老天爷没有赋予生命的小东西，再花多大的气力也是没有用。

可是老祖母不同意。我的祖母没有生过孩子，我的父亲是



五房承继到大房来的。在生我之前，我母亲已经生过三个孩子，只留下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大姐。祖母已经六十多岁了，盼孩子盼得快要发疯了。

男孩子好，女孩子也好。她想，能生女孩子，就能生男孩子。

这时候老祖母坐在那张紫檀嵌螺钿的古老的圈椅上，像一尊大佛。她既是命令，也是哀求那些七手八脚的女人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一个喜欢抽水烟的圆圆脸、胖乎乎的女人说："让我抽几袋水烟试试看。"大家心里都嘀咕：方法都使尽了，你又有什么神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喷烟会喷活了婴儿。但是谁也不敢反对。

于是乎这一个女人忙着找水烟袋，那一个女人忙着搓纸芯，一大包上等皮丝烟已经端正好了。胖女人忙着点起烟来。

收生婆小心地捧起了婴儿。胖女人抽了一袋又一袋的烟，喷到婴儿的脸上。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产房里除了抽水烟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收生婆心里数着一袋一袋的烟，已经五十多袋了。婴儿板着越来越紧的小丑脸，始终不吭声。婴儿的身体也越来越发紫，蒙古斑也看不清了，她只有一个瘦瘦的小尖鼻子还算逗人喜欢。

抽烟的胖女人虽然过足了烟瘾，但是她很疲倦，汗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收生婆更是疲倦，捧着我，两只手酸得要命。别的女人忙着替她们俩擦汗。这么个大热天，谁也不敢用扇子。

这正午的时候，天气热得叫人一无是处。产房里的人们希望来一阵暴雨，似乎这个希望比救活婴儿更重要。

大家望着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祖母。老祖母坐得笔直，把她的驼背都几乎伸直了。她把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从半夜

到现在，快八个钟头了。她老人家，巍然不动。女人们除了给产妇喝些汤汤水水外，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喝水和吃饭。

时间过得真快，也真慢，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时钟响亮地敲了 12 点，老祖母闭上了眼睛。她是信佛的，嘴里想念佛，但是产房是个不洁净的地方，不能念。老祖母夺取婴儿的战斗是没有希望了。她知道这些女人只要她一声命令，马上就会停止这种艰苦的工作。

收生婆捧着婴儿，手酸得抬不起来。她把婴儿放到她的扎花布的围裙里，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为了解除她的疲劳，她默默地算着喷烟的次数，是整整一百袋烟了。她无可奈何地对老祖母说："老太太，已经一百袋烟了。老太太，您去歇歇吧？"她说着说着，就把围裙里的婴儿不经心地抖落到脚盆里去了，因为是个死孩子。婴儿滚到盆里，三百六十度的大翻身。我的小尖鼻子掀了掀，小嘴动了动。是受了很大的震动。可是谁也没有注意。

老太太眼里满是泪水，伤心地说，"再喷她八袋烟，我就去休息。"老太太手里平常总有一串佛珠，珠子有一百零八颗。她相信一百零八才是功德圆满。

胖女人无可奈何地再抽烟，喷到脚盆里。她决定以后要戒烟，这烟抽得太不顺利了。她抽了喷，喷了抽，喷得又利落又爽快。她不屑顾盼这个死丫头、丑丫头。喷完了八袋烟就可以休息了。一袋、两袋、三袋、四袋，时间更是飞快地过去。

老祖母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脚盆边。孙女儿是完了，看她最后一眼吧，总是我的后代。

她老人家泪眼模糊地向烟雾中的孙女儿告别。她似乎看见婴儿的小尖鼻子在掀动，小嘴似乎要讲话。老祖母想：我是眼花了。她阻止胖女人再喷烟，用手帕擦干净自己的眼泪，再度低下身子去仔细盯着婴儿。



奇怪，不但鼻子和嘴唇在动，小瘦手似乎也要举起来，仿佛在宣告："我真正来到了人间了！"

这一下老祖母又惊又喜，站立不稳，身子几乎倒下来，布满了红丝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耀。她忙叫着："活了，活了，你们看！"大家拥向脚盆边。果然，婴儿十分轻微的啼声都能听见了。一屋子的人都沸腾起来。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是在闷热的产房里，大家高兴地叫喊："活了！""真的活了吗？"门外的人也跟着喊，"真的活了吗？"

天空闪烁着电闪，照得产房里通亮。天空中霹雳响的雷声像炸弹一样爆炸开来。人们所希望的大雨，马上就要来临。可是产房里的人们没有看见明亮的电光，看到的是，一个小生命的更大的光亮。她们的耳朵也对雷声没有感觉。这小小婴儿的十分轻微的哭声，不是哭声，是笑声，遮没了巨大的雷声。

老祖母阻止了人们的欢呼，生怕把那娇小脆弱的孙女儿吓死。收生婆连忙从脚盆里轻轻地抱起了婴儿，这真是捧了一个活宝贝了。

真是奇怪！一个平凡的女人，就是这样不平凡地诞生的。

（1988年6月）

红双喜

我的好奶妈

我的弱小的生命，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像早上大雾中一缕细雾；又像我们小时候，轻轻一吹就可能破的“滴弄”①；更像“摇漾春如线”的一根游丝。可是我的小神经，却像电流一样，轻快又健壮地活动到现在八十八个春秋。

好奶妈，我不知道她的姓，更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我一生下来，看到的第一个人。她是一个羞怯的乡村少妇，丢下她壮健的女儿来哺养我。而我却是一个人世间最难哺养的早产婴儿，我在母亲肚子里，不耐烦地呆了七个多月，就急急到了人间。可我是一个生下来，不声不响、不哭不笑的人。多亏好心的人们救活了我，就是现在，放在氧气包里可能也救不活的婴儿。



我的奶妈有乌黑、深情的大眼睛，那么温和慈爱；她有不高不矮的端正的鼻子，但是在喂奶的时候，总要避开我的脑门；她粗大而又柔软的手轻轻地拍着我，她的嘴里唱的是叫我进入神仙世界的催眠曲。我是她胸前的小袋鼠，遇到一点叫我害怕的事，我就躲到她的怀里，像小袋鼠进入妈妈口袋里一样。只要她搂着我，我就感觉到平安无事了。虽然她刚来的时候，只是为了钱，可是当母亲把责任交给她的时候，我就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

① 滴弄：很薄的玻璃玩具，一吹一吸就发出滴咚的声音，稍微吹重就容易破。

她不让太阳晒我的小脸，也怕微风吹我的柔发。她之对我像合肥乡下一首民歌：

> 高楼高楼十八家，打开门帘望见她。粉白脸、糯米牙，板子鞋、万子花，大红袄子四拐揸。回家去问我的妈，卖田卖地娶来家。热水又怕烫了她，冷水又怕寒了她；头顶又怕跌了她，嘴含又怕咬了她；烧香又怕折了她，不烧香又怕菩萨不保佑她。

我的奶妈对我就像小伙子爱他新娶的媳妇一样。

辛亥（1911）年，革命的时候，我二十二个月，我们全家二十多口人，由合肥龙门巷，坐船到了上海。先住麦根路，后住铁马路图南里。

我在三岁前，生过无数次的小儿惊险疾病。我好哭，也许是为了我生下来十个小时都不吭声的缘故，所以我得痛痛快快地哭。早上天不亮、鸡未叫我就哭了。除了厨子喜欢我，可以请他早起做早饭外，许多人都不喜欢我。人人都喜欢胖乎乎、一逗就笑的孩子，谁喜欢我这个瘦骨嶙峋，一逗就哭的孩子。我那时不在乎，我有奶妈的爱足够我享受。

我三岁半的时候，正是除夕，两个奶妈带我和三妹（她比我小十四个月）向长辈们辞岁后，回到我们楼上小绣房来。两个奶妈讲故事，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丽的故事。

乡村姑娘多在“腊八”（阴历十二月初八）出嫁。而老鼠在除夕嫁丫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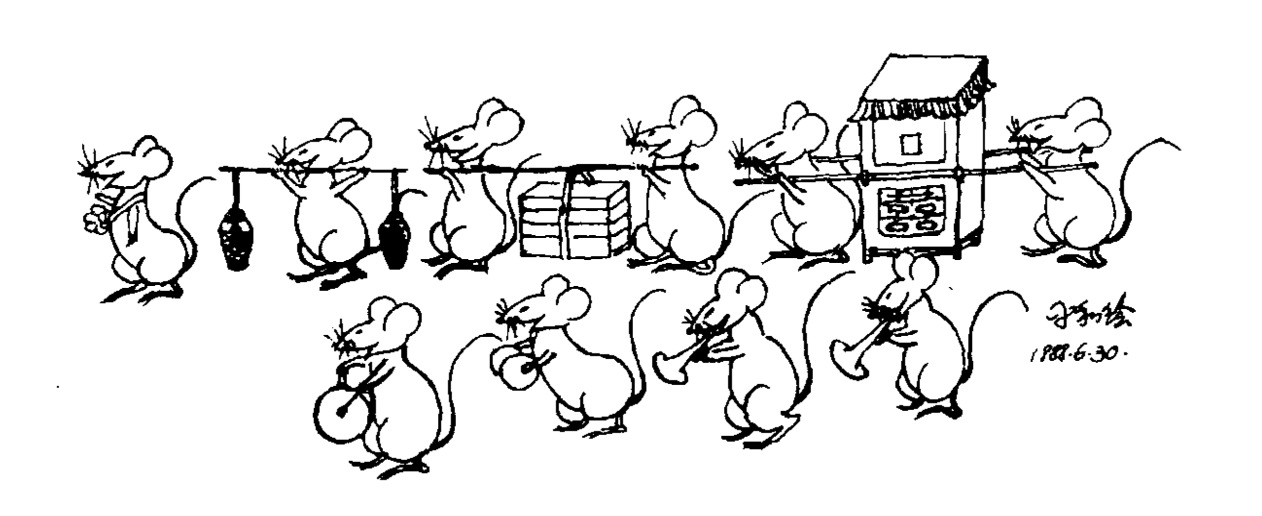
有个小旗小伞的仪仗队、小锣小鼓叮叮咚咚热闹着呢！前面有几十抬箱的嫁妆，比我们小孩子“过家家”的玩具还要小。新郎小老鼠穿着马褂，骑着小白马，马头上还有红绒球，好气派！最后有一顶小花轿，八个穿着红背心的小老鼠抬着，里面坐

着新娘，她头戴小凤冠，穿的是小霞帔，手里拿着盖头的大红绸手巾，美着呢！

我听了着了迷，就问："今天晚上我能看见吗？"我的奶妈神乎其神地说："当然看得见，我们现在应该给小新娘送礼才行，它们会来收礼的！"两个奶妈办来的礼物是：糕饼和瓜子花生，每个糕饼上都插上绒花。最有趣的是一朵红双喜的绒花。我刚在方块子上认识一个"喜"字，这是两个"喜"字并在一起，我爱上了这朵红双喜花。三妹的奶妈胖，她搬了椅子，再加上一个小板凳。我的奶妈爬上凳子，把礼物放在橱顶。这晚上我要看老鼠拜堂，不肯睡觉，奶妈好不容易把我哄睡了。

过年的几天，家里很热闹，亲亲眷眷、老老少少都互相拜年。还有许多好玩意，我把老鼠嫁丫头的事情给忘记了。一天晚上，我快睡觉的时候，忽然想起，那些多情的小老鼠拜堂没有？收了我们的礼物没有？埋怨奶妈那天骗我睡觉，没有看到有趣的场面。奶妈给我闹得没办法，她匆忙把小凳子加到椅子上，爬上去拿礼物，最后她拿到的是一个插红双喜的馒头。奶妈好喜欢，一面笑一面下来。不想凳子没有放好，她跌了下来。这下把腿摔坏了。我当然大哭，直到哭倦才睡着。

第二天，我奶妈回乡养伤去了。从此，我就再没有见到我那好奶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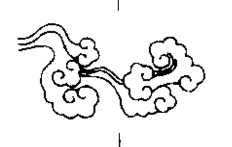


今天，我已经是八十八岁的老太婆了。我的血液里还依稀有她的乳香。我是多么对她不起。没有她的三年多的哺养，我也不能活到今天。

奶妈一走，我不但鸡未叫就哭，半夜惊醒的时候也哭，"无事阑干"[1]也哭。尤其看到红双喜花，更是哭得无了无休。后来红双喜花被带我的窦干干[2]藏过了。

我一生就爱红双喜。会剪纸的时候，剪的是红双喜；后来在北京昆曲研习社演出的时候，如果我演丫头，我必定在鬓边贴一朵红双喜花。

（1997年4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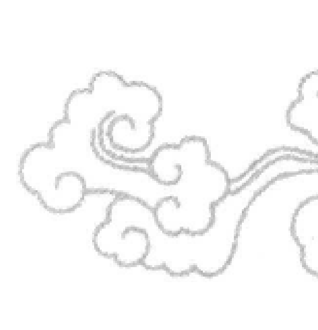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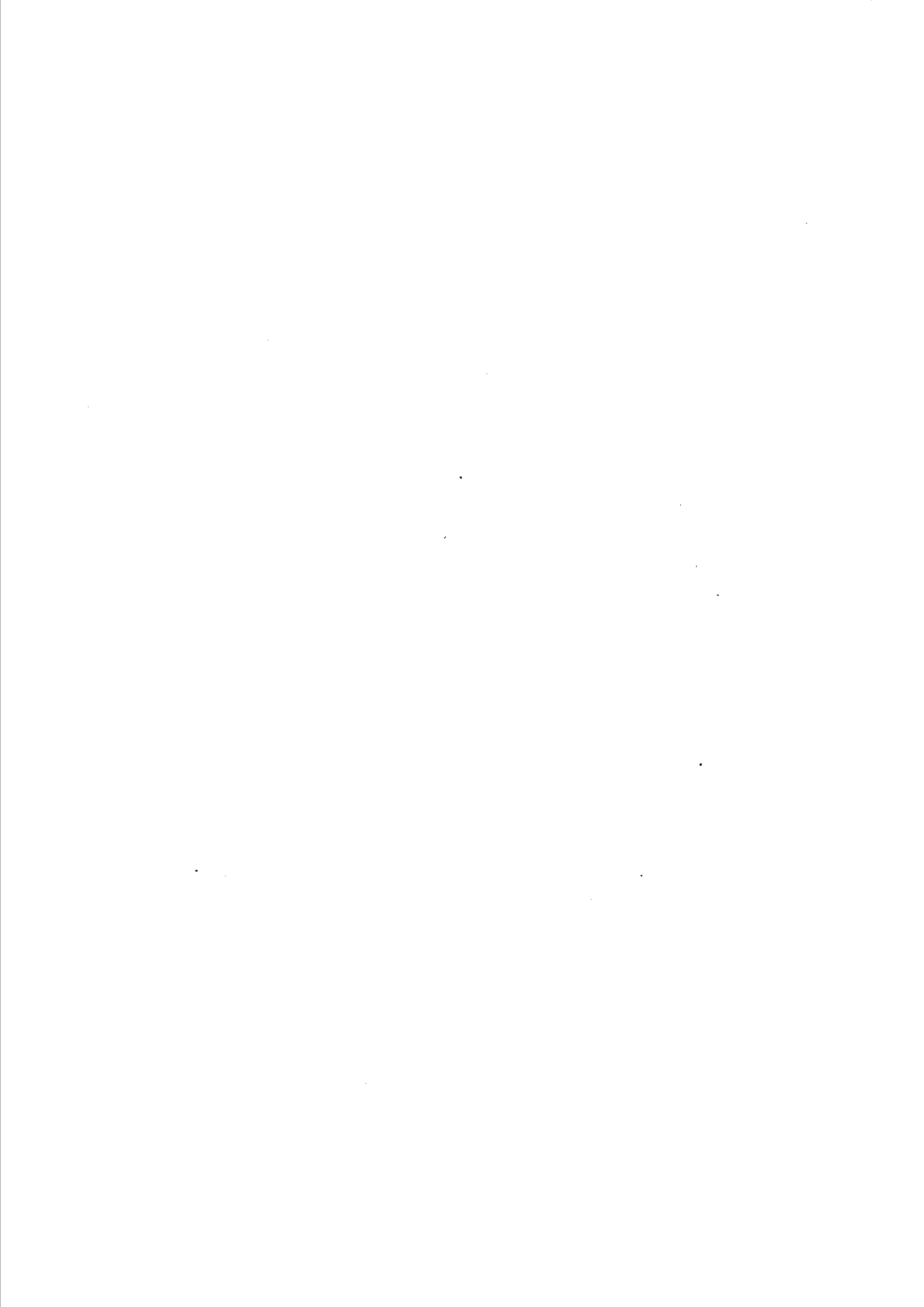
① 无事阑干：合肥土话，无缘无故的意思。

② 干干：保姆。

父母恩



父母教导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一封电报和最后的眼泪

爸爸和大大

一个愁云惨雾的冬天的早晨，我记得很清楚是1938年。耀平和我住在重庆七星岗嘉庐。我那天特别高兴，预备参加枣子岚垭一家曲会。耀平吃过油条豆浆的早饭，他在农本局上班，临走前，他没有往常兴致好，问我："你今天曲会？"我说："怎样？你有事，我就不一定上曲会。""不，我没有事，你……你上曲会吧。"我说："我早点回来。"耀平迟疑一下："不，迟点也不要紧。""往常我一出门，他总叫我早点回来，今天……"我心里想。

午饭后，我在曲会里马马虎虎唱了一支曲子，就坐不住，心里有事，没有等吃晚饭，就回嘉庐了。耀平下班回来。我们默默吃了晚饭。

他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歇一会儿吧！你累不累？"我说："我不累，没有等到散会我就回来了。"耀平低头从口袋里拿出一封电报给我："昨天下午到的。"

"父逝，告弟妹，元。"我脑子里轰了一下。冷，我觉得由心里到全身都冰凉，只有热的眼泪，滚到手上、电报上。

"爸爸，你走了，走得那么遥远，再也追不回来了！"

整整一夜，电报压在枕边，我未曾合眼。在这小小的亭子间里，看不见月亮，更没有星星。夜的沉默，更使我的脑子里波涛起伏。我的慈祥忠厚的双亲——爸爸和大大的音容笑貌，萦绕在我的脑子里。爸爸走了，我不在他身边；记得大大远离我们儿女的



在儿女们的眼里，大大（母亲陆英）是最亲的人，是最美的神。

时候，我跪在她身边。

那是秋天，是 1921 年 10 月 16 日的秋天。在苏州胥门寿宁弄 8 号的家里，大大快要断气的时候，一大群孩子跪在她的床两边，哭着喊叫，我就跪在她的枕右边。大大瘦得很，还是很秀丽。记得姨祖母谈到大大做新娘的时候，盖头一掀，凤冠下的璎珞一挑，那双凤眼一抬，闪闪发光，使每一个宾客大吃一惊，多美多亮的眼睛！可是现在，那双凤眼紧闭了，再也不能睁开眼睛看她的孩子们了。我看见她眼中泪珠滚滚，滚到蓬松的鬓边、耳边。我停止了哭声，仔细瞅着她。大大是听见我们的哭声、呼叫声。她没有死，她还活着。她哭，她知道她快离开人间。我想，我们不能哭，不能使她伤心。

我嚷着:“不要哭,大大还活着,大大在哭。”可是屋子里人们的哭声、叫声更响了。谁也没有听见这十二岁瘦弱小女孩嘶哑的声音。我被人猛地拎了起来,推推搡搡、推到屋子的角落里,推到了爸爸的身上,我一把抱住了爸爸。爸爸浑身在颤抖,爸爸没有眼泪,只是眼睛直瞪瞪的。

是一个多么惨凄凄的秋天下午,一直到半夜,到处是孩子、大人的哭声。我哭倦了,蜷伏在最小的五弟的摇篮里睡着了。

(1954年)



看不见的背影

1995年4月16日,早上6点28分,我醒了。我的心口有点痛,眼睛湿湿的。我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一个伟大场面的梦。

一个丧礼的行列。我和大弟走在队伍的前面。我按住胸前一个桑皮纸的大信封,说这里面包的是我爸爸的骨灰。我和大弟走到一个平台上,大弟说要去换衣服,只有我一人站在平台上,双手紧紧抱着桑皮包。这时我就醒了。爸爸是1938年去世的,到今天已经五十七年了。就是在梦里,我也见不到爸爸的背影,更没有看见爸爸慈爱的面貌。梦啊,你太无情了。

我爸爸有十个儿女,四女六男。我是他的第二个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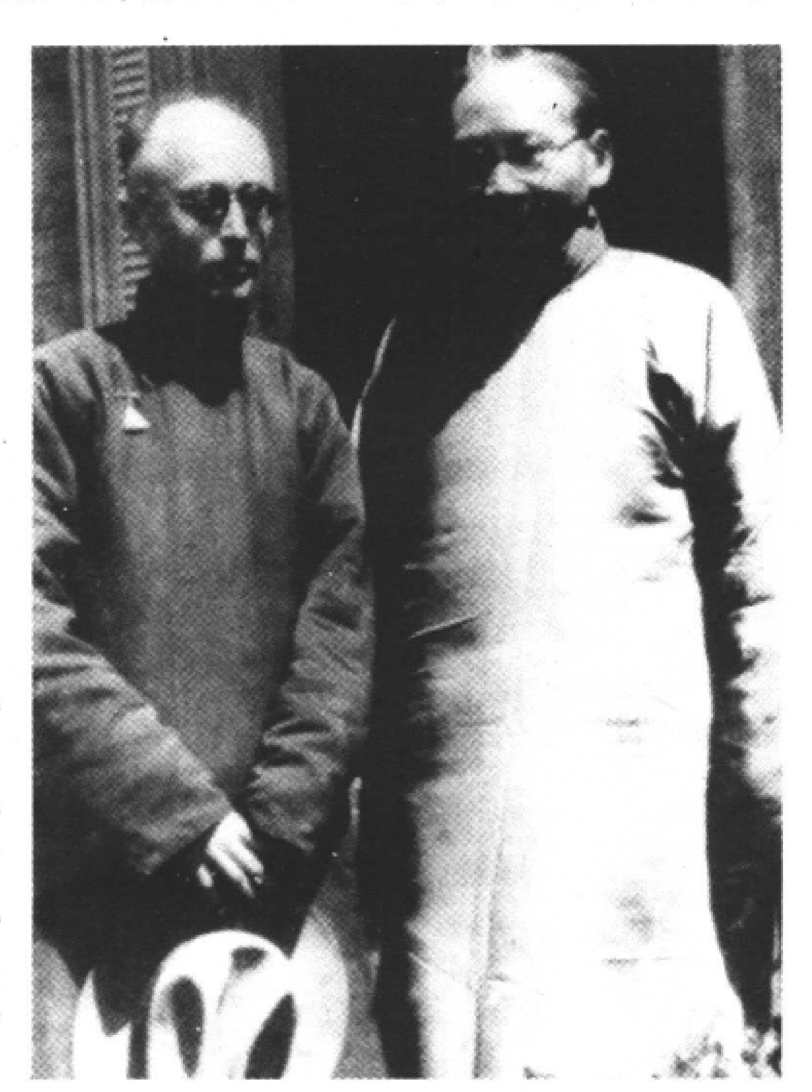
1931年,我在光华大学念书。我爸爸住在上海,儿女们多数住在苏州。1932年,是放寒假的时候,我也在苏州。我的大弟宗和、二弟寅和,一位堂房弟弟蕴和(小名大黑子),还有一位堂房小叔,他们四个男孩子,都只有十六七岁。要我陪他们到上海去考光华大学。我们是1932年1月24日坐火车由苏州去上海的。我陪他们到大西路光华大学考试。最后一天考试,正是1月28日,晚上就发生日本对上海的战争。

29日的早上,这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上海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十分惊慌,等到我们定下心来,我马上去买火车票。上海开往苏州的火车,已经不通了。我爸爸非常着急,到处找人到十六铺买轮船票,好不容易才买到两张通铺。我们五个人,四个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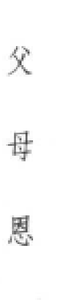
和我一个女孩,已经很挤了。我爸爸很不放心,请男工黄四送我们。黄四是厨子黄二大师傅的弟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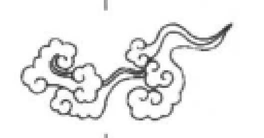
1月30日的早上,我们一行六个人,去十六铺码头。码头上人山人海。找到了船。船上已经有很多人。我们总算找到了我们的铺位,因为这两个铺位靠近窗口。可是这两个铺位上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只得请人家挤挤,才让出位子。从早上8点到我们六个人找到铺位,定下心来,已经快12点钟了。我们都没有带行李,更没有带吃的,大家都觉得肚子饿了,才想到要吃东西。这时候,船舱里还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行。我们请黄四上岸去买吃的。

时间过得很慢,人越来越多,船上小过道也挤得水泄不通。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也不见黄四回来。我坐在大弟、二弟



五四运动两年后,张冀牖创办苏州乐益女中(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培育学生三千余人,身体力行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救国"思想。图为张冀牖(左)与蔡元培先生合影。





的中间，他们把我围在当中。多亏弟弟的保护，否则我这七十二磅的人骨头都会挤断的。我的肚子很饿，可是这四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更饿，肚子咕咕叫。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还不见黄四这大男子汉回来。人越来越多，挤得严丝密缝的，简直是无缝可以插针。我们等呀等，瞅着黄四去的方向，心里十分着急。一心只希望黄四回来就好，忘记了肚子饿了。这样挤，黄四能挤得进来吗！我们都绝望地低下了头。

午饭没有吃到，晚饭也没有吃。忽然听见有人嚷嚷"你这人真野蛮，怎么踩我的肩膀，又踢我的头！"我们五个人抬头一看，黄四像踩高跷似的、摇摇晃晃的，朝我们这个方向踩来。他手里高举着面包，头几乎顶到船的顶板，面红耳赤、一头大汗。我们五个人惊喜欲狂。我们伸出了手，脚并脚，挤得更紧一些，让黄四有一个插脚的地方。他七扭八扭的，终于插到我们中间，赶紧把面包递给了我们。他呀，连擦汗的工夫都没有。我们大口大口地吞吃面包："真好吃，饿死了！"

黄四忽然想起，说："二小姐，你们的爸爸现在还在码头上。早上我们前脚走他老人家后脚就到码头。我中午在岸上见到他，他说：'快让孩子们上岸，这样挤不行。'我说：'我去买了面包再说。'可是码头上到处买不到，我只好跑了许多地方，才买到这两个面包。等我回到十六铺，天都快黑了，码头上人少了些。我刚踏上跳板时，有人叫我，我一回头，是你们的爸爸。我的妈呀，这样晚他老人家还在码头上。他拉住我的胳膊：'快……快叫他们上岸！'我说：'上不了岸了！'你爸爸急忙掏出一叠钞票，塞在我手里。"黄四在口袋里掏出钱给了我。我收到一叠钞票。我的心直打颤，我的头脑轰了一下。我的嘴里啃着面包，我的眼泪也啃着面包。

六年后，1938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的爸爸张冀牖去世了。爸爸是由合肥、六安逃难到霍丘去的。后来听人

说，我爸爸是吃了日本人放了毒的井水，患痢疾去世的。那时候我爸爸才四十九岁，他在苏州办的苏州乐益女子中学已经有十七年的历史。

梦啊，请你再给我一个有情有意的梦，哪怕是只见到爸爸那瘦削的身体，和那微微弯曲的背影！

（1995年4月20日）



洒到人间都是爱

我们的爸爸张冀牖在1938年10月13日离开了他爱的十个儿女，离开了他爱的世界走了，走得那么远，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元姐的一封"父逝，告弟妹"的电报，让逃难在各地的九个儿女失去了人间最伟大的爱。从大姐元和到五弟寰和都不在爸爸的身边，他的身边只有最小的弟弟宁和。那时七弟只有十二岁，在爸爸身边尽了孝道，做了灵前的孝子。七弟在一封给我们的堂妹旭和的信上说："我有九个极好的姐姐哥哥。"我们九个姐姐哥哥要感谢他——我们极好的最小的小七弟，为我们尽了孝道；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继母韦均一给了爸爸临终的安慰！

爸爸不但爱我们十个子女和家人，他也爱他人、爱世界。他办过幼儿园，办过专收男生的平林中学，最后全力办乐益女中。那时他不过三十二岁。要不是卢沟桥事变，还会一直办下去。从1921年开始到1937年办了整整十七年。

我总是想爸爸最喜欢我，从几件事上可以看到。我是快嘴李翠莲，爸爸出问题、出谜语，不管猜得对不对，我总是抢先第一个回答。爸爸讲苏东坡的故事最多，我记忆中就有四个，下面举两个例子。

苏东坡有一位和尚朋友叫佛印，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这和尚可不吃素，最喜欢闯席，不请自去。东坡先生有一次瞒了佛印邀请几位朋友，坐了小船在月夜里大摆筵席，朋友们都是作

家文人。吃饭时都吟诗作赋，饮酒时必须行酒令。苏东坡第一个行令，他的令是“浮云散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第二位说的是“浮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第三个人的酒令，我忘记了。第三个人的话音未落，船舱板被掀开，光头佛印伸出头来，哈哈大笑着说：“船板顶开，佛印出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佛印一次也没有失去喝酒的机会。

还有一个故事是文字游戏。苏东坡姓苏，那时苏是繁体字：“蘇”。有一次苏东坡烧了鱼，正准备吃的时候，馋嘴佛印又来了，老苏慌忙把鱼盘放在草垫上盖起来。佛印坐下来就问：“老苏，你这个姓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把草字头下的鱼写在左边，一种是把草字头下的鱼写在右边。苏东坡说：“这两种写法都可以。”佛印又问：“现在有人把鱼字写在上面也可以吗！”苏东坡回答：“那不可以，不成一个字了。”佛印说：“既然不可以，那就把鱼从草垫上拿下来吧，让我们大家吃！”

关于四书五经中的故事爸爸讲的很多，我们那时年纪小，不一定理解。以下的故事谈的是《诗经》，爸爸把诗祖宗《诗经》请出来了。

爸爸说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字康成，127—204）的故事。他说，郑康成对四书五经滚瓜烂熟，不但注解《诗经》，还注解过《论语》、《尚书》等书。他家的丫头也能用《诗经》上的词语对话。有一个丫头做错了事，主人罚她跪在院子里，另一个丫头问她：“胡为乎泥中？”跪在地上的丫头回答说：“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七七事变，我家避难在成都，我在街上看见一家招牌“诗婢家”，是一家裱褙店。我恍然大悟，记起了这个故事。

我爸爸的书真多，旧书、新书、杂志、大报、小报，还有唱片，不仅书橱、书架上有，地板上也都是书。孩子们可以自由地翻看，我们姐妹都喜欢乱翻书。我家有四个书房，我们三姐妹有冬、夏两个书房，爸爸和大大有芭蕉院内外两个书房。爸爸的小

书房也是我们学昆曲的地方。

我喜欢乱翻诗词一类的书，十一岁时，有一天爸爸问我："小二毛，你喜欢诗词，你对古人的诗词，喜欢哪一个?"我知道他问的是李白、杜甫，我回答："我喜欢纳兰性德（1655—1685)"。这个回答大大出乎爸爸的意料。爸爸好高兴，马上就把《饮水》、《侧帽》词的小本子给我。他说："性德是性情中人，很可惜三十一岁就死了。这样的才子历史上也少见。"

我总觉得爸爸在儿女中最喜欢我，可是当我十三四岁时，很不喜欢爸爸，为什么呢?我的人很瘦小，当时苏州只有一人坐的人力车，不是可以坐两人的三轮车。爸爸一出门，喜欢捎带着我，他一上车，交起腿来向后坐，留下前面的地方说："小二毛，来!"我八岁从上海到苏州，一直到十三四岁，都是这样跟爸爸坐一部车子出门的，可是十二岁以后，还是这样，我就不高兴。



有一天，爸爸躺在躺椅上，要我替他篦头，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我不耐烦，我要气气他。我拿篦子轻轻打他的头，他醒了："小二毛，为什么打我?"我说："我不跟你出门，我不跟你坐一部车子!我要打你!"爸爸抓抓头："小二毛，好厉害。我不打你，你倒打我。"我说："就打你，就要打你!"爸爸说："好好好，以后让你一个人坐一部车子，好不好!"父女两个哈哈大笑。

爸爸过世已经六十年了。我再也听不见"小二毛，来!"这样慈爱的声音。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日子。

（1998年12月10日）

棠棣花

十姐弟的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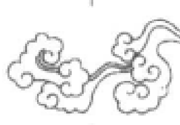
创造了张家的世界





张家四位小姐，个个才貌出众，术有专攻，都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两张照片相距已是四十年（1946—1985年）。左图，前排左起张允和、张元和；后排左起张充和、张兆和。下图，前排张充和，后排左起张允和、张兆和、张元和。





王觉悟闹学

1920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年，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又甜又嫩的童年。那年我十一岁，我们有姐妹兄弟九人，父母双全。第二年，我们的母亲就去世了。

很奇怪，前面四个都是女孩，后面五个都是男孩。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一岁。孩子们都在双亲的爱护下、教导下，健康地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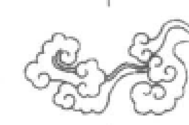
我们四姐妹，大姐元和、我允和、三妹兆和、小四妹充和。前



张家姐妹们下棋娱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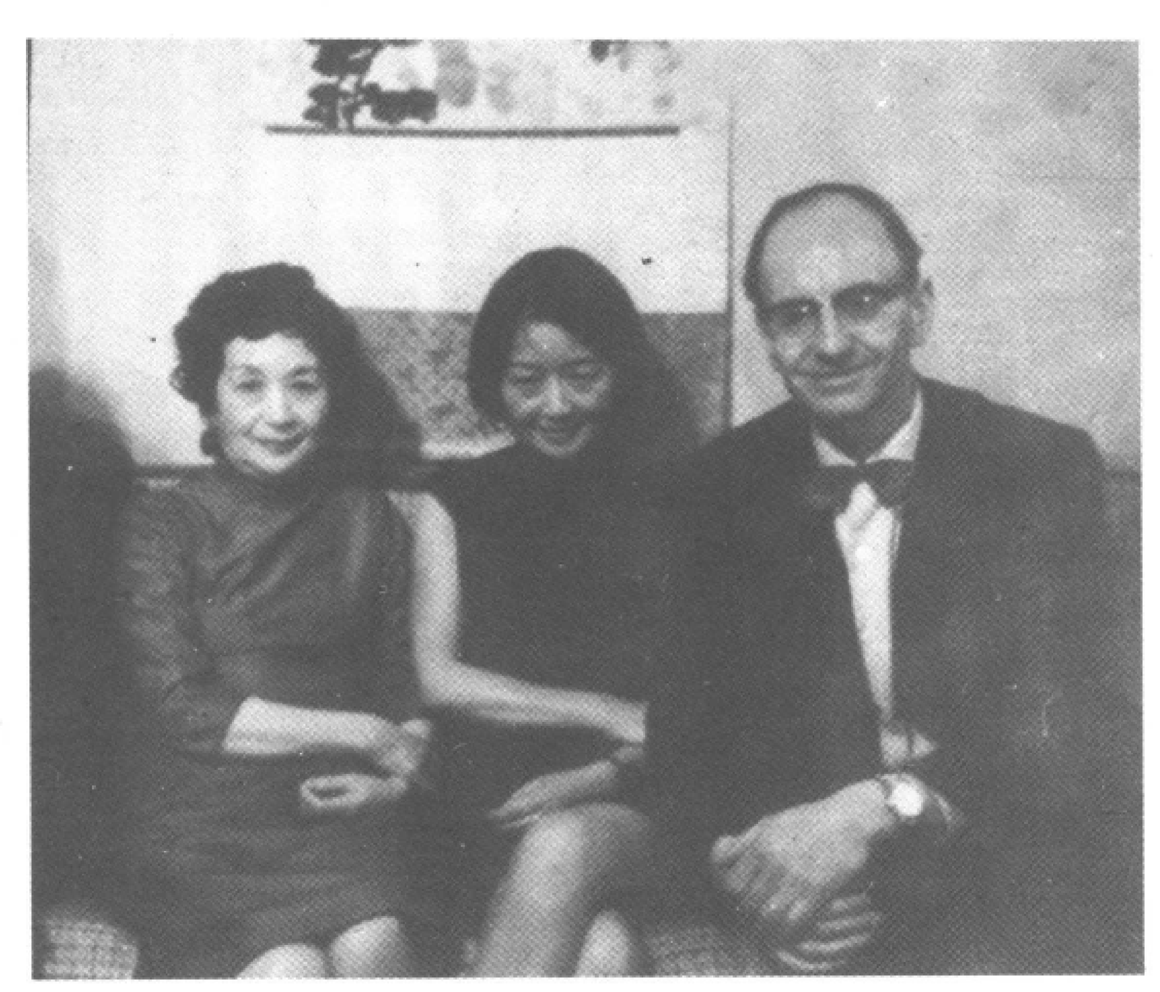
1945年张允和和四妹充和在四川华西坝上。小老师和“王觉悟”成了可以互相切磋学问的对手。



三名没有进过小学，就是四妹后来也不过进了一年象征性的小学。小四妹，这生下的第四个女孩，一断奶就送给合肥二房亲奶奶做孙女了。这1920年的春天，小四妹才七岁，回到了苏州，她的亲姐妹的家里。我们三个大姐姐欢喜得要命。小四妹神得很，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我们三个大姐姐都不及她。虽然我们也在书房里念了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我们不但念司马迁的《史记》，还念王孟鸾老师教的白话文。

我们三名女学生，就有三位男女老师教学，还有两位刻蜡版、抄讲义的先生。我们私塾里的老师多于学生。

我们的妈妈名字叫陆英，拥有自己一个小书房。我记得书房墙上，有一个精致的横匾，四个字我只记得两个，一个“兰”字，一个“室”字。书桌前是一排大玻璃窗子。窗子外面有一个小小院子，院子里有假山，假山上有芭蕉。院子对面就是我爸爸张冀



从左至右：元和、充和、傅汉思。

牖个人的书房，只有爸爸的书房有门通这个小院子。爸爸书房前面是一排落地的大玻璃窗子，可是妈妈的书房没有门通这个小院子。爸爸妈妈可以隔窗相望。

就在1920年，我们家掀起一个教保姆认字的高潮。最聪明而又用功的是三妹的保姆朱干干。她每天早上为妈妈梳头、篦头的时候，要念十个到二十个方块字。我的保姆窦干干是我的学生，成绩最差。人家问她认识多少字，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认识一大担。"我这位小先生很丢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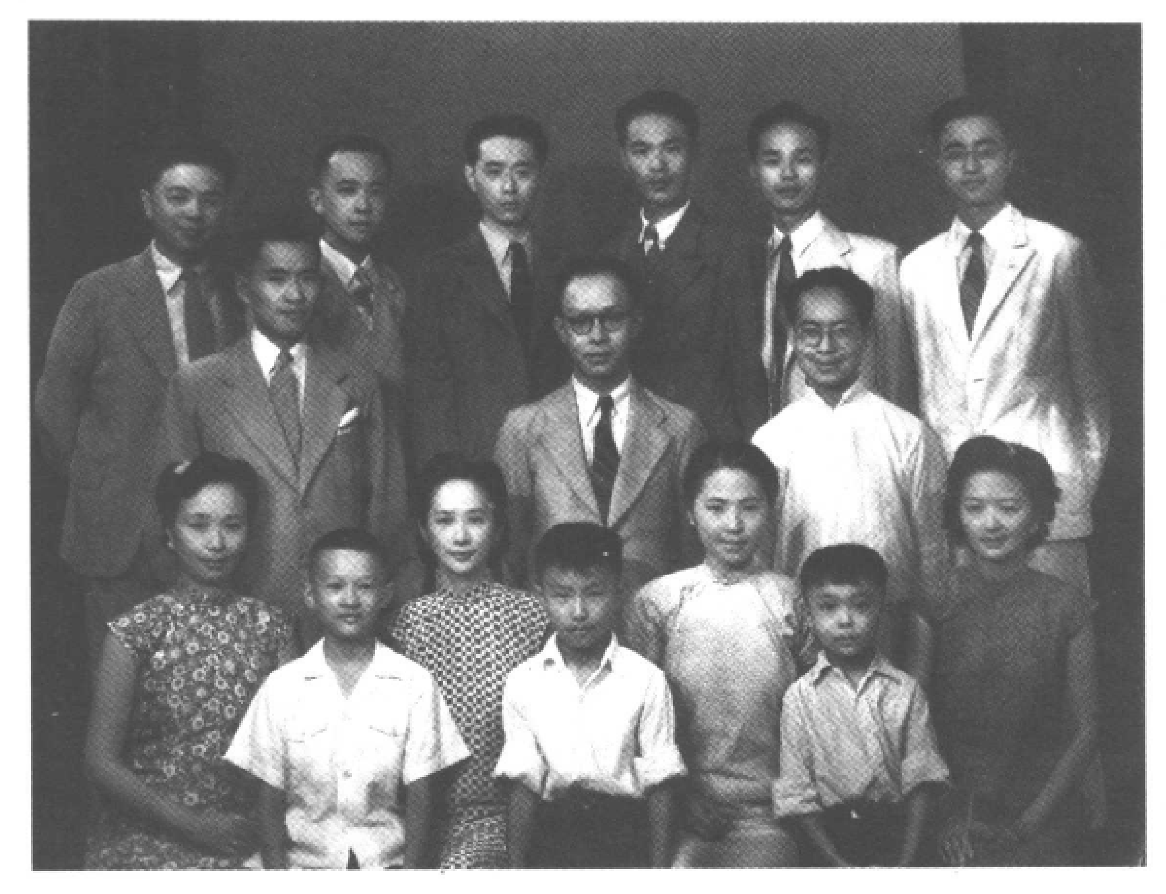
小四妹回来了，妈妈就派我当她的小先生，因为我比她大四岁。大姐教大弟宗和，三妹教二弟寅和。三位小先生很来劲。妈妈买了蓝布，教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做一个书包。书包做好后，三位小先生都认为得替学生起个学名。每位小先生都对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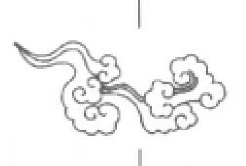
学生特别巴结。尤其是我,我认为我的学生最难对付。她虽然只有七岁,可是她在合肥有两位老学究教她念古文。古文的底子比姐姐们强。但是姐姐们知道胡适之,她就不知道。我们的新文学水平比她高。我左思右想,要替小四妹改上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了名字,连姓也改了。我在四妹书包上用粉红丝线,小心地绣上了"王觉悟"三个字,我好得意。大姐规规矩矩绣了"宗和"两个字,三妹不会绣,只好作罢。小四妹不及大弟二弟乖,看来她对我这样的老师不敬重,不怎么佩服。有一天,小四妹忽然问我:"我为什么要改名叫觉悟?"我说:"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问:"明白了什么?"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所以然,便煞有介事地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她摇摇头说:"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你为什么改我的姓。我姓张,为什么要姓王?大王、皇帝也要觉悟,老百姓可不是要吃苦。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她撇撇嘴:"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得不通,哈哈!"这一笑可把我气坏了。我不能打她、骂她。我说:"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我拿了一把小剪刀,一面哭、一面拆书包上"王觉悟"三个字。"王"字好拆,"悟"字也不难拆,就是"觉"字不好拆,是有二十笔划的繁体字。

1978年,小四妹带了洋女婿 Hans H. Frankel(傅汉思)回来。我们谈到五十八年前的往事,哈哈大笑。我说:"王觉悟呀,王觉悟!你到现在'觉悟'了没有?"

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就是1995年10月了。我们四姐妹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了。小四妹真正觉悟了,她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旧诗词做不过她,我做的歪诗都要请她大笔斧正。过去十一岁的"拆字先生"的伤心往事,现在成了姐妹间最甜嫩和最美好的回忆。

(1979年11月初稿,1995年10月修改。)





张家十姐弟，男的名字都带“宝盖儿”，表示儿子要留在家里；女的名字都含“儿”(两条腿)，表示都要嫁人走出去。结果，姐弟们都走了出去，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亲情带到哪里。走遍海角天涯，也走不出他们心中的“张家”。

图为抗战胜利后1946年十姐弟及配偶、子女在上海团聚：

前排左起：张元和、周晓平、张允和、沈龙朱、张兆和、沈虎雏、张充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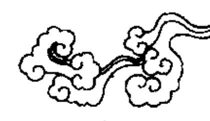
中排左起：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

后排左起：张宗和、张寅和、张定和、张宇和、张寰和、张宁和。

大弟新娘俏

我十岁时，我们三个大的女孩子（元和、允和、兆和）都住在苏州寿宁弄，四妹（充和）在合肥。苏州的三姊妹最喜欢玩洋娃娃，替娃娃做帽子、小鞋和衣服，绣上花还加上花边。

头一天，在亲戚家吃了喜酒回家，三姊妹便商量着如果能找一对真娃娃做新郎新娘，该多么有趣。大弟宗和那时五岁，小圆脸、小高鼻，虽然有点“坎脑袋”，可是一对甜甜的小酒窝最讨人喜欢。因为我们父母有了四个女儿后，才有了第一个儿子，拘管得紧，所以大弟十分腼腆，羞答答的像个女孩子。二弟寅和四岁，生得胖乎乎的，一双大而圆的乌黑的眼睛，有时会有一股蛮劲，倒真有大男子气概。



第二天，我们三姊妹把两个真娃娃——大弟和二弟——领到母亲的后屋。说服大弟做新娘，大弟拗不过，乖乖地答应了。大姐是化妆能手，好在这屋子有的是母亲的胭脂、花粉、梳子、刨花。搽粉点胭脂后，就开始梳妆。男孩子头发短，任你刷多少刨花水，用多少大红丝线也揪不了一根朝天的辫子。刨花水都流到大弟眼睛上了，他眼睛挤呀挤呀的，拿小手要揩眼睛。我赶忙说：“不要动”，用小手帕轻轻拭去他眼睛上的刨花水。大姐急得一头汗，我和三妹干着急。幸亏母亲扯了几条大红头绳，大姐才梳成了几条朝天辫子，戴上了绢花和福字绒花。一条红兜巾是早就预备好了，大弟穿上了我过十岁生日时穿的粉红上衣。可是没有裙子，哪像新娘？三妹去央求母亲给了条花绸大手帕，

她出名的粗手粗脚，姊姊们老是嘲笑她绣花时，把线疙瘩打在面子上。三妹逞能把花手帕塞在大弟裤带上。这是一条稀奇古怪的裙子，只有前幅，没有后身。小新郎只在旁边捣乱，闹着也要穿花衣服。我们哄他，男人是不穿红着绿的，他也就算了。

二弟有个"干干"郭大姐最会凑趣，她嘴打锣舌打鼓把这对小夫妇送到了后堂。大红地毯已铺在地上，家里人闹闹嚷嚷地都来了。拜了天地后，郭大姐嘴里唱着："小小秤杆红溜溜，我替新人挑盖头。"大家嚷着看新娘子，新娘子笑了。

大姐说："该向爹妈行礼啦！"新娘子已经伶俐地跪下了，小胖新郎却被人闹呆了，三妹莽撞地推新郎一下，新郎这才跪下，还压住了新娘的裙子。新娘一站起来，低头一看，美美的裙子没有了，这算什么新娘，当堂出丑。新娘急得要哭，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大姐急忙搂着大弟："好弟，不哭！一哭脸上的花粉就糟了。"我又用小手帕替大弟揩眼泪。我们三姊妹都说二弟太粗鲁，真是个傻女婿。我和大姐也埋怨三妹，没有替新娘系好裙子。三妹鼓着嘴生气，小新郎看闯了祸，一溜烟跑到花园去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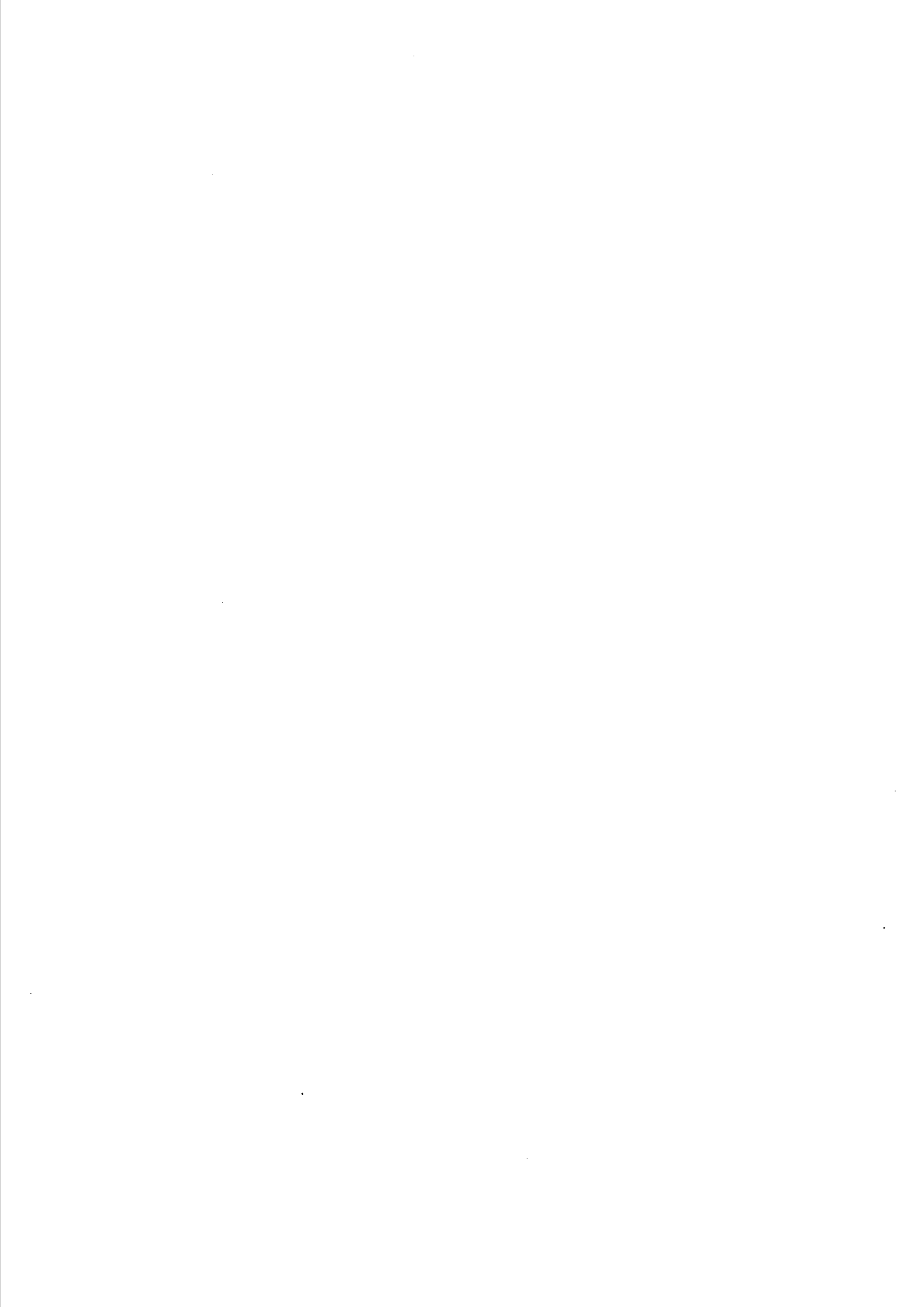
哭二弟

死别十五日，生离已二春。鹡鸰惊飞散，雁行悲失群。
前年度春节，欢聚在沪滨。病榻迎姐到，絮絮话昔今。
寿宁旧家宅，二弟锡名寅。啼声颇宏大，歌喉惊客宾。
满堂小儿女，椿萱乐晨昏。大弟新娘俏，二弟美郎君，
踏落凤罗裙，痴憨笑语频。张家五子戏，苏城尽知闻：
诸葛空城计，七岁学抚琴。纶巾大姐制，鹤氅二姐针。
人小城围大，闻声不见人。今朝喜相见，肺疾苦深沉，
揾泪难分手："床前氧气存，见瓶如见姐，再见更精神。"
临别致姐词："明年再来申？春暖花开日，襄园柳色新。"
可怜此诀别，相见渺无因。春雪间春雨，点滴总伤心。



此二弟寅和亡后十五日作。是夜雨雪交加，竟夜未眠，晨起书此，纸湿笔干，悲伤无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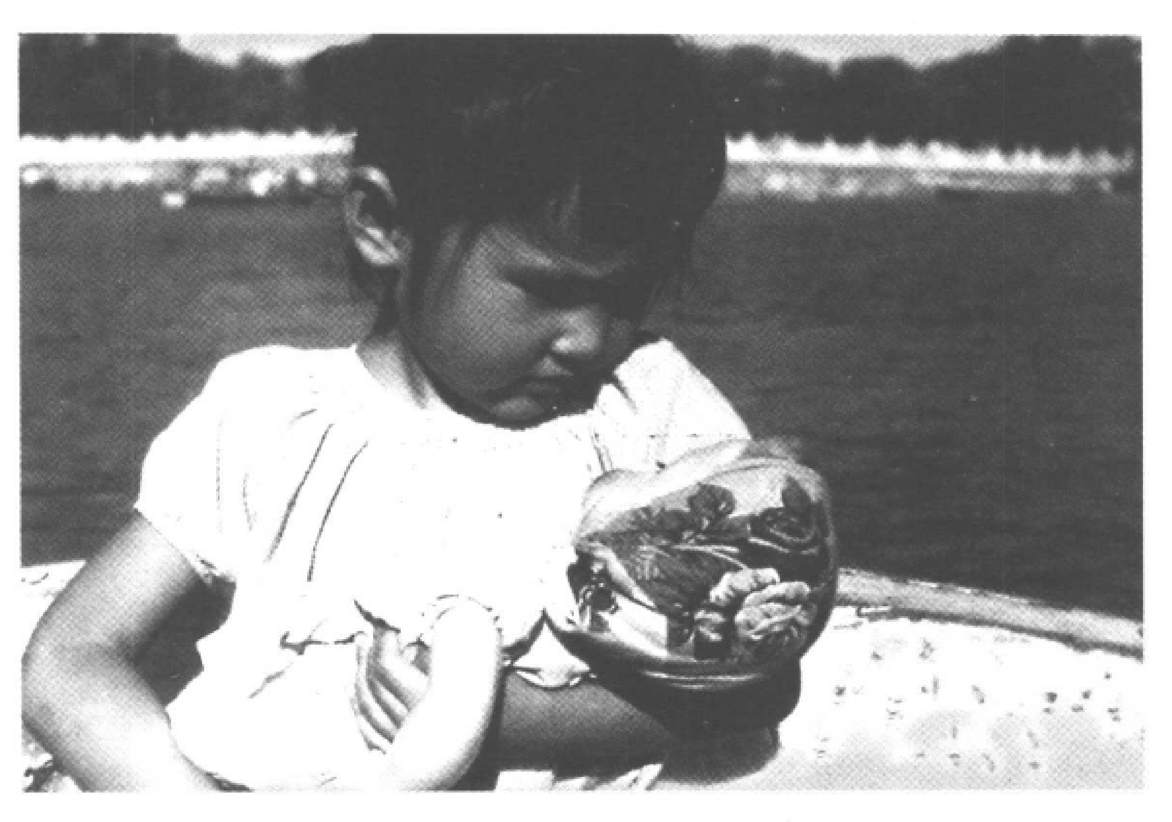
（1973年3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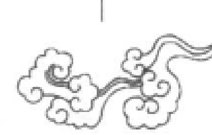
儿孙福

孙女、重孙子
他们是未来的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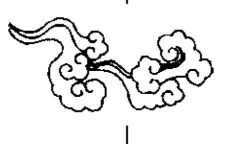


“苏菲”是个蓝眼睛、长睫毛、金头发的洋娃娃。“苏菲”病了，急煞“妈妈”。（1964年庆庆在颐和园）





永远是纯真无邪的笑容，奶奶和庆庆，哈哈，原是一个模样！



庆庆的一天

(这是一封周和庆在一岁九个月时写给她爸爸周晓平的信,写庆庆一天的事情,由她的奶奶张允和代笔。)

亲爱的爸爸:

早晨快6点了,我醒了(可是如果有人问我几点钟,我,宝贝,总是说“8点”,因为我有一个玩具手表,老是指在8点上)。阿白、阿黑,自然也醒了(这是爸爸养的两只鸡,我每天要和它们消磨一两个钟头,现在又有了两个小阿白了)。你看我屋子上的窗子都亮透了。我在小床上伸手抓隔壁床上阿姨的头说:“宝贝起来”。我以前要吃了牛奶才起床,现在听奶奶说,隔夜牛奶不能吃,所以我10点钟才吃牛奶。7点钟先喝粥。我起床的时候,如果妈妈在家,我就腻住了妈妈,爷爷怎样叫我,我都不理他。如果妈妈不在家,我就找爷爷了。爷爷总是懒,不起床。我叫“爷爷起来!”(“来”的音不大正确,大概我和奶奶、妈妈说话一样,l和n搞不清楚,这要等爷爷、爸爸来纠正了)。我拿袜袜、褂褂、裤裤给爷爷,爷爷没办法,就只好起来了。所以爷爷受了我的早起的教育,现在也起得很早。

我吃东西的时候,常常想起我在莫斯科的爸爸。爸爸在爷爷书橱玻璃窗子上的照片里。我说:“爸爸吃”,爸爸笑笑不说话。爸爸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上车站接你!不像你出国的时候,我才三个月,不能送你。还有那本照片簿子,我也叫他爸爸,因为里面有爸爸的照片。

今天早上我很高兴，腻住了妈妈，因为妈妈出差了二十天才回来。阿姨我也不要了。我今天也不说："我想妈妈。"以前有人问我哪儿想，我就皱皱眉、拍拍胸口："想得很！"可是今天我还是想爸爸。因为妈妈去了二十天就回来了，我爸爸去了二十个二十天，怎么还不回来。我是很爱爸爸和妈妈的，我常常把他们两位老人家放在脑子里的同一个地方，简直不是联想，而是纠缠在一起。

今天妈妈带我上景山公园。上了山，到了最高的亭子上，抬头一看，妈妈告诉我："这是菩萨，不吃、不睡觉。"我想："什么是菩萨，我不懂，是大娃娃，很大很大的娃娃，他怎么不动？"我有许多小娃娃。第一个是爷爷送我的，那时我才四个月，不会玩。现在我又有了三个娃娃。一个叫苏菲，是爸爸送我的；一个叫钟兰；一个叫苗苗。她们坐在爷爷的沙发上面。我会把娃娃撒尿、包娃娃、拍娃娃。我吃的东西，给娃娃吃，也给宝塔吃，也给"吾戈、吾戈"(无线电)，我的东西大家吃。总之，我不吝啬，对人和东西我都一律平等。

隔壁叶家爷爷和奶奶，我喜欢他们，他们给我糖糖吃。叶家有个电话，我一听电话铃响，我就叫"喂、喂！"就有人来听电话。叶家的大娘，我不大喜欢她。可是当她的面，我总是说："大娘好！"大娘不在的时候，我就说："大娘骂！"我自己也不好，喜欢拿大娘的铲子、火钩玩。

我们院子里，有好多好多哥哥、姐姐，他们都喜欢我。我也学他们的玩意儿。譬如："打弹子"、"打纸片"、"跳房子"等等。还有坐在阶沿石头上往下溜，奶奶不让我溜，说我光屁股要弄脏的。我最爱在院子里玩，常常玩得不想回家。

已经有一年半了，我中午吃一个蒸蛋蛋才睡觉，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你要是不给我那块小毛巾，我是不睡觉的，小毛巾是我的催眠药。

午睡起来，我一定要出去玩，玩够了再回来。家里的人怕我饿，总是让我吃一顿点心再出去。平时爷爷中午爱吃面食，我也跟他吃面食。今天妈妈在家，妈妈爱吃米饭，所以奶奶做米饭，我就吃了一顿泡饭，也很好吃。饭里有菜、肉圆。

下午5点(我的手表还是8点)，我回家了。吃过晚饭，我总是在爷爷屋子里听“吾戈吾戈”。我跳舞、唱歌、做体操，还有傻笑，笑到没气力了，我就要阿姨为我洗屁屁、脚脚睡觉了。

这就是我在妈妈回家那一天（1961年5月27日）的生活，我向爸爸汇报。

我要奶奶写小庆庆、写鸭嘎嘎、写花花(下面是庆庆画的鸭子、花和圈圈，是用红笔写的)。那些红的东西，全是我写的。还有用蓝笔写的“小庆庆”(奶奶把笔)，也算是我的签字。爸爸你看，我画的圈圈圆不圆。这是我第一次给爸爸写信的笔迹。

小庆写

1961年6月2日

爷爷说，有两个庆庆的故事，一定得告诉她爸爸，就是指鹿为马、狗作鸡鸣。有一天，我(周和庆)指着茶叶罐上的有角的鹿，说是“马”。爷爷大笑。爷爷说，秦二世就这样叫的。爷爷又问我狗怎样叫的，我就叫“咯咯咯！”阿白、阿黑是这样叫的。我没有听见过真正的狗叫。我的玩具中虽然有狗，可是它不会叫。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动物园呢！

爷爷换了一身漂亮的西装，我就指指点点地说：“美呀、美呀！”爷爷穿了一双空花皮鞋，我又说：“美呀！”我把“呀”字拖得很长、很好听。爷爷说我有审美观念，大为赞赏。爷爷见到亲戚朋友，往往拿“指鹿为马、狗作鸡鸣”作标题，拉开了话头。

庆庆又写

1961年6月2日

附：给庆庆的两封信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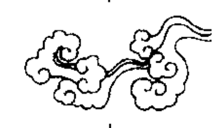
亲爱的小庆庆：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你近来身体怎样？一个人在外国，一定很寂寞。想来你的工作很紧张。不要说你好想安安，就是太爷爷和太奶奶我，虽然住在一个北京城里，一星期见不到小安安，也是怪想他的。

安安太有趣了，说不完他的故事。最近，他给我打电话，背了一首儿歌《买韭菜》。一气呵成，像数快板似的。就是口齿不大清楚，有点大舌头。

太爷爷说，安安是我们四代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可是小家伙脾气很倔强，要好好地教育他。

“人之初，性本善”，安安的天性是非常善良的。例如，他看见阿婆向热水瓶里灌开水，他就嚷嚷：“阿婆，当心不要烫着。”有一天，一大清早起来的时候，他从小床上，一脚跨到阿公的大床上，阿公假装睡着，他拍拍阿公的脑袋说：“乖，乖！”看来，他对阿公阿婆十分爱护。就是还不认识字母和汉字。记得小元元两岁多就会在冬天的窗子上画字母。我想，安安也可以学得好的。最麻烦的事，恐怕就是尿布的问题。春天是来了，可是“乍暖还寒”，一时还寒冷，无法从尿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你的来信，我已经见到，你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真是叫我高兴。你要知道爷爷勉励我，你爸爸笑话我，他说我的老头子是汉语拼音缔造者之一，你妈妈、老奶奶却对汉语拼音一窍不通。我的普通话也说得不好，还有 l 和 n，in 和 ing 都分不清楚。可是，你爸爸叫我不要太兴奋，身体要紧。十二岁的小玲玲，来我家就考考我。他们对我的关心和鼓励，都让我特别高兴。

我的二十本日记，已经按照我的昆曲索引，抄了六本，另外

十四本,你爸爸按照我的索引,也找人为我复印了。我删改整理后,就请人打印。

我也想自己打印。你奶奶的劲头可不小。好在把打电脑当是玩儿,也就不会累,累了就休息。我从2月21日开始摸索,到现在快两个月了。打了六封信,一篇《曲谜传友情》的文章。打信容易,打文章多是古文,比较困难,爷爷可帮了我的大忙,一有问题,我就叫他过来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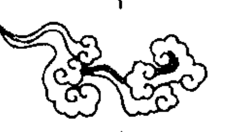
你给爷爷的咖啡,一时都吃不完。你给我的假糖,还有两包。你给我搽脸的Jergens,爷爷用它擦皮肤,还说"好极了!"这是安安的口头禅。

这封信是第七封信。我要去看电视了,不和你多讲了。

祝你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奶奶允和

1995年4月17日



二

亲爱的庆庆:

我在前天寄给你的信,想你已经收到。今天我又给你用打字机再写这封信。以后,我将用这种方式经常和你通信,也就是等于写日记。你看好不好?

4月20日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发生两件事,一件叫人欢喜,一件使人烦恼。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1)你爸爸在19日和20日两天,连续开会。20日晚上,有一个宴会。你爸爸和妈妈把小安安带了去。本来你妈妈不让安安去,后来,你爸爸的同事们来到你爸爸的家。他们拆了安安的高脚椅子带去,然后,簇拥着小安安而去。小安安坐在他的椅子上,规规矩矩很像位小客人,很有礼貌地回答大人的话。指指点点要这样那样东西吃。人家给他吃的,他就说"谢谢!"他最欢喜的是椰

子汁。他阿公说，小家伙很“出傥”，将来是个交际家。

(2) 也是安安赴宴的同一个时间，4月20日的下午不到6点钟。快要吃饭的时候，我在吃饭间倒茶，忽然听见厨房里有人跌倒的声音。我连忙跑到厨房去，看见小蒋倒在地上。我叫她几声，她闭着眼不答应，我就叫爷爷快来：“小蒋晕倒了！”爷爷一看情况不妙，连忙下楼去找钱大夫。我又去叫小蒋，她昏迷不醒，我心里很急，就用手指掐她的人中，掐了三下，不醒。掐到第五下，她才睁开眼，这下我才放了心。这时候，钱大夫来了，爷爷和楼上的贾承民先生也来了。我又按了姚奶奶家的门铃，姚奶奶一家三口人(姚奶奶、思纯和她的丈夫孙汝山)都来了。两位大男人把小蒋抱到床上。小蒋就呜呜地哭起来，也不说话。钱大夫做了检查，瞳孔好，心脏好，可是血压太低。给她吃了药，她又吐了。都是钱大夫收拾的，钱大夫真好。当天晚上，我们都很紧张。你爷爷不让我给你爸爸打电话。21日早上，不到7点钟，我偷偷地给你爸爸打了电话。我让他不要来，可是，9点15分你爸爸晓平来了。下午，晓平陪小蒋去公安医院去看病，仅仅有点感冒。约好三天后，再去做脑电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毛病。爷爷去找了小蒋的姐姐，这晚上就让大蒋陪着。这两天大蒋都在我家住。第二天，晓平回来和大蒋一同陪小蒋到公安医院看病，医生说是感冒，还有肾脏发炎，给了药，吃了以后，现在基本恢复了。这两天，小明来帮忙买菜、烧开水、灌开水。我很高兴，我们处理这件事很及时。

今天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的时候，晓平打来电话。小安安背了一首儿歌，又背了两首唐诗。第一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背到“鸟”字，安安加了一个“叫”字，又说是“鸟叫”。第二首是“红豆生南国”。又背：“床前明月光，低头思奶奶……”这小家伙蛮有意思。愿小安安的妈妈　平安有庆！

奶奶允和

1995年4月23日

安安的一天

(这是一封周安迪两岁三个月时写给他妈妈周和庆的信,写安安一天的事情,由他的太奶奶张允和代笔。)

亲爱的妈妈:

我,小安安,今天是两岁三个月多十九天(1995年5月21日)。太爷爷、太奶奶,阿公、阿婆,爸爸和我,都在北京,就是妈妈你一个人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多么想你啊!你一定也想我们、狠狠地想我们、更狠狠地想我这个小淘气吧!

这里,我告诉你1995年4月30日我的一天。这天,有四个喜事。一是太爷爷、太奶奶结婚六十二年的纪念日(1933年4月30日)。二是阿公的生日(1934年4月30日)。三是"五一"劳动节的前夜。四是我小安安两周岁三个月。四个纪念日在一天过,真好玩。

1995年4月30日,一大早,阿公阿婆催我起来吃早饭。穿上一套男孩子的绿色衣裤,加上一件白外套,还有一顶白帽子,好漂亮!太奶奶8点钟打电话到中关村,我们已经"打的"走了。我最爱"打的",坐在上面飞快、太有趣。8点28分,就到了朝内后拐棒甲2号。上了三楼,到太爷爷的书房,阿公放下了我。我亲了太爷爷、太奶奶的腮帮子,他们的脸上可能还沾上了一点儿我的口水。我连忙跑到你从前住的屋子里,让太奶奶开了大书橱,拿出我的玩具:大老虎、打鼓人、大象和一对会亲嘴的小情人。我玩了一会儿,又到太爷爷的书房去玩电脑。可是电

脑已经被收拾起来了。

阿公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记下我能背的十二首诗。我一口气背了八首唐诗，还有《诗经》的“关关雎鸠”。大家拍手，我也拍手。阿公夸我只要听两三遍就背得一字不差。太奶奶对我说：“你的妈妈两岁半也会背唐诗，而且特别欢喜唐诗，见人就说，唐诗是甜的。那时候我们叫她小庆庆，她背‘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候，问我：什么叫做‘断魂’？搞得我很尴尬，不好回答，勉强解释说：‘断魂’就是‘不舒服了，要想喝酒’。”我呢，只管背，不管什么断魂不断魂的。

太爷爷用两个手指头合在一起，飞呀飞的骗我玩，我不理他。他过去是这样骗我阿公和我妈妈的，现在又用来骗我，我可不受骗，我是第四代人了，爱用手指打电脑。可是今天因为我要来，太爷爷、太奶奶都向电脑请假，不让我玩电脑。

太爷爷的书桌上有钢笔、铅笔、圆珠笔、小刀、剪子，这些玩意儿我都不爱，我爱玩太爷爷小玻璃杯中的牙签，两头尖尖的小木棍，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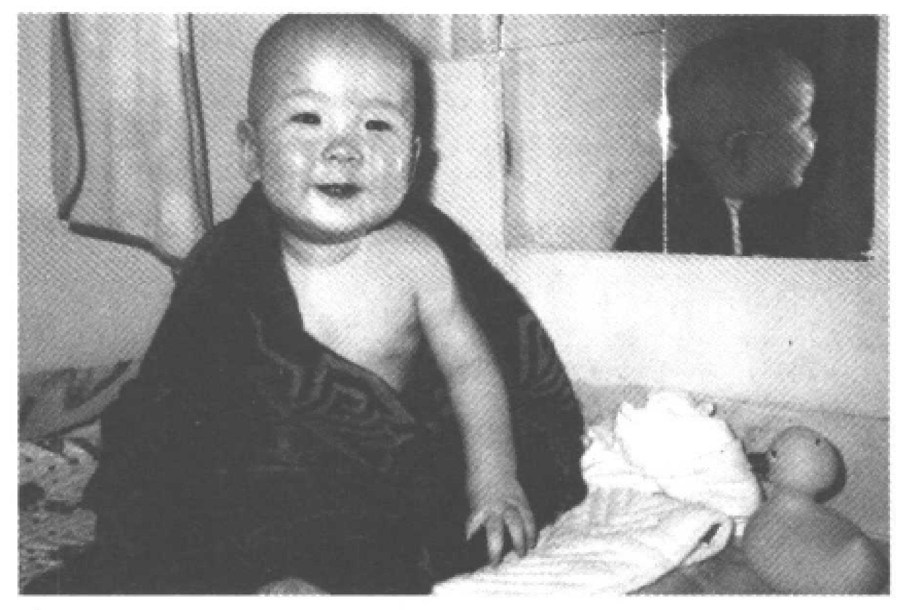
我到饭厅里，把日本小橱里的瓶瓶罐罐，一个个地搬出又搬进，这是每一次我到太奶奶家最爱做的劳动。太奶奶帮我数一个两个，一共有二十多个瓶瓶罐罐，可是我还不识数，数不过来。

我到小蒋阿姨屋子里，爬到窗台上，看窗外的汽车。这儿不临马路，没有汽车。我爬下来想玩放鸡蛋的菜篮子，阿婆说“阿姨骂”，我才不动手。我对小蒋阿姨是又欢喜她、又怕她。她抱我，抱得很舒服；她骂我，骂的对，我就怕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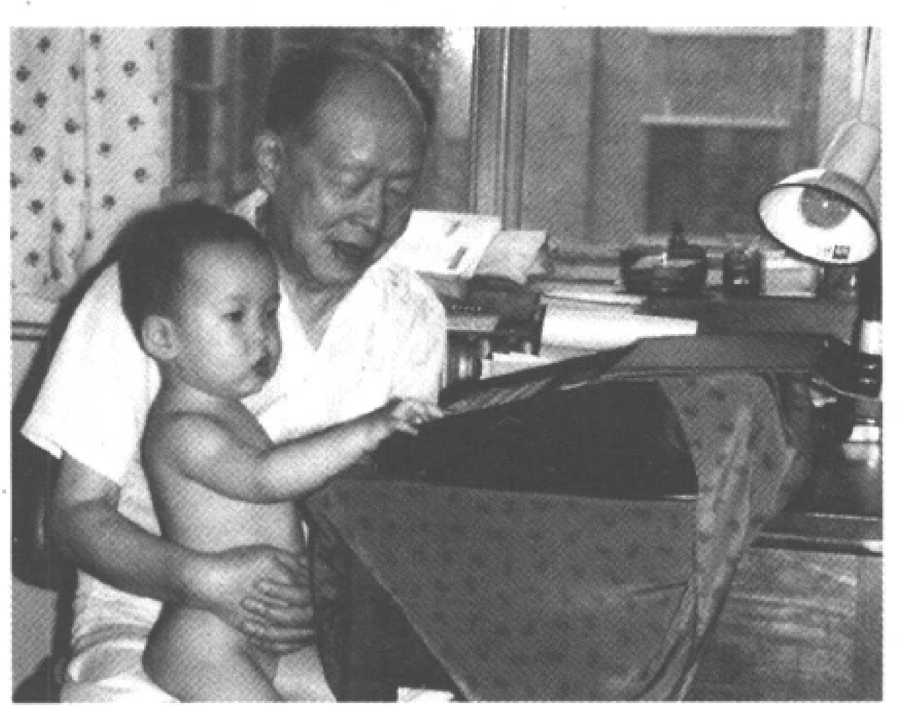
我在一个个房间里来回乱跑，又上凉台去找扫帚扫地，太奶奶说，太脏。阿婆把扫帚放得高高的，我只好罢休。

我要太奶奶抱。太奶奶说：“你妈妈像你一样大的时候，出门从来不要人抱。你妈妈很乖，她说：奶奶不抱，抱了我心要碎





庆庆长大了，找到好夫婿，还生了一个“鲁智深二世”！



安安第一次来到太爷爷、太奶奶家，就用上了太爷爷的打字机，神情专注，旁若无人，一丝不挂也毫不介意，大有“魏晋风度”！

的。”

吃中饭的时候，饭桌上没有我的位子。我坐在太爷爷书房里的一个小椅子上。椅子是钢管做的，有个活动的靠背，我一面玩一面吃。吃的东西有：米饭、黄瓜、肉丁、白菜，还有大对虾。大对虾是阿婆买的，我只吃了当中的一块，好鲜！

忽然来了一位大姐姐，送来三十四个鸡蛋。好奇怪，她呀，十四岁，也是今天生日，和我阿公是同一天。更奇怪的是她属鸡、太奶奶（八十六岁）也属鸡。她是小母鸡，太奶奶是老母鸡。我是小公鸡，哈哈！太有趣了，这叫做鸡尾酒会。

吃过中饭，我就睡觉，大家都睡觉。我梦见你，妈妈大庆庆回来了，亲亲我，叫我小安迪、小乖乖、小心肝、小宝贝！我醒了，坐在床上喝牛奶。不，我用奶瓶喝豆奶，也很好吃。太奶奶来了，摸摸我的头，说："小家伙，什么时候才不用奶瓶喝奶！"对呀，我要快快长大，不用奶瓶，也不带尿布。

好妈妈，我要告诉你，这4月30日是最好玩的日子。有蜡烛，有蛋糕。别人家过生日都是点一个人的生日蜡烛，我们可点了三份红蜡烛。一对矮胖的大蜡烛是庆贺太爷爷、太奶奶的结婚六十二年。两支不大不小的是我——小安安的。六支最小的是庆贺我阿公的六十一岁生日。太奶奶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小小的。我的不大不小的蜡烛插在蛋糕的中间，阿公的六支蜡烛插在蛋糕的边上，好像拥抱着我、我真快乐；那两支红红的大蜡烛，站在几本厚厚的书上，照着我们。

太奶奶今年八十六岁，是我们家第一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她把一条辫子梳在前头。她一出门，人家就注意她的头发，问她怎样梳的。她是一个很风趣的老太太。我那太爷爷也怪，头发白的不多，可是前额光光的，一根头发也没有，哈哈，是个光瓢！有人问他，为什么这里没有头发？太爷爷说，这里的头发还没有生出来呢！我的阿公和阿婆头上也有了几根白头



发。这十个月来，他们带着我这个小淘气，所以添了几丝白发。我要好好地谢谢他们。妈妈，我两个月长了两公斤，可是阿婆轻了两公斤，她带我带得好辛苦。我的好阿公，他教我唱歌、念唐诗、学礼貌，整天“劳驾、谢谢”不绝口。

我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太奶奶问，你这个小“君子”，你的“淑女”在哪里呀？我不懂什么“淑女”不“淑女”，我只知道背完诗吃蛋糕。我们切蛋糕、分蛋糕、吃蛋糕，大家高兴极了。太奶奶对阿公说：“Happy birthday to 阿公！”我大笑，大家都笑了。

这一天，下午 4 点多钟，太奶奶说：“六十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安安的阿公还没有出世。”阿公是晚上 9 点多出生的，第二天就是“五一”劳动节。也是太奶奶说的，阿公二十岁生日的时候，写信给太奶奶说：“感谢妈妈，把我在劳动节前一天生了出来。”这话真有趣！

吃完蛋糕，我又到太爷爷的书房里捣乱了。太奶奶用阿公买来的拆信封的小机器，一条一条把信封切下来，十分好玩。切一条我就大笑一次。这小机器到我的手里就不听我使唤，切不下来，我想我长大了就会用它。

阿婆给我吃苹果，我坐在有活动椅背的凳子上大口大口地吃。太奶奶就唱：“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大家吃得笑呵呵。”她唱了两遍，我就唱：“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大家吃得笑哈哈！”我把“呵呵”改为“哈哈”，因为电视上有“娃哈哈”。太奶奶说我改的不押韵，我就重新唱“笑呵呵”。你瞧我多听话。

我又到凉台上去踢大葱。太奶奶说，大葱是小蒋阿姨的，动了小蒋阿姨要骂的。我只好玩捆大葱的草绳。踢呀、抛呀，一直抛到太爷爷的书桌上。我很得意，哈哈大笑。太爷爷把草绳放到字纸篓里，我要去拣它出来，太奶奶说：“太脏了，不要

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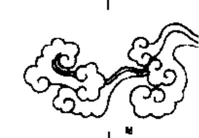
我在两个凉台之间的四间屋子里跑来跑去，又笑又叫，玩得开心,也很累。阿婆叫我吃长寿面,吃完了面,我和阿公阿婆就回中关村了。最可惜的是妈妈你不在我们身边,爸爸也不在我们身边,他在四川巴县我爷爷和奶奶家里。他是5月6日凌晨12点15分才到北京后拐棒家中的。

我得悄悄地告诉你,我的好妈妈。这是一个臭消息,我在太奶奶家,早上和下午,拉了两泡屎。我吃了太爷爷家的饭和面,也还了情,哈哈!

不说了,不然,太奶奶要累坏了。因为这封信是八十六岁太奶奶代我写的。

祝妈妈好!祝妈妈工作愉快!

小安迪 1995年4月30日　北京



附:给安安的两封信

一、给安安的第二封信

亲爱的小安安:

今天是1995年8月6日,你已经离开我们三十七天了。我是多么想你!7月里你们来了三个电话和一个Fax。我们的生活都很好,你们三代人不要挂念我们。

请你告诉阿公,包海燕来了两个电话,说中关村的房子,9月可以成交,工作年龄可以从1956年提前到1952年。

五太舅公和五太舅婆,还有他们的小外孙女蒋小倩,已来了二十天了。大家玩得很高兴,五太舅婆的鸡汤鲜得要命,只有太奶奶小时候的窦干干比得上。

三太姨奶奶家的小红要在8月里宣布结婚,她的丈夫叫潘大为,是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小红前天才由云南回来,是做扶贫工作去的。

太爷爷7月里的收入很不错，请你加一下有多少？

(1)薪金1148,(2)《语文闲谈》稿费7860,(3)函大顾问500,(4)代人写序300,(5)《上海拼音小报》150,(6)张宇和送周有光九十寿礼400,(7)陈政恩、许宜春送寿礼500,(8)《群言》60,(以上人民币);(9)孔宪中序言1000(港币)。

7月里太奶奶做了三个生日：第一次是7月6日，也就是阴历六月初九。中午我们吃了面，并没有人来。太爷爷也没有说"Happy birthday to 太奶奶。"第二次是7月23日，这一天并不是我的生日，因为7月25日是我的生日，但是小蒋妈妈要动左眼手术，所以提前两天过生日。三和(允、兆、寰)三家会，三家做菜，十人聚会(允和、有光，兆和、小虎、之佩、大为、帆帆，寰和、孝华、小倩)。有大拼盆、鸡、牛肉、猪肉、冬菇及各种蔬菜，饮料是可口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家玩得特别高兴。第三次是7月25日，我本不准备过生日，上午11时突然来了远客陈政恩，陈政恩带他的女儿慕溪和小玲玲来。由慕溪姐妹出去买了烤鸡、鱼、泡菜等，因此又过了一次生日。

小蒋妈妈7月25日做左眼手术，到27日重见光明，已经可以看见猪皮上的细毛。但是右眼白内障太老，没有办法动手术。预定8月12日回四川梁平，她在我们这儿整整住了两个月。我们相处得很不错。

太爷爷生日的三个录音带和一个录像带，已经请你妈的哥儿们送到SRT公司，转送给你妈妈。你们可以看到、听到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容貌和声音。

《语文闲谈》有上下两册，印了1万本。在上册第51页上有：

60年代后期，北京中关村某小学一位老师在讲历史故事时候，问学生："你们知道中国的朝代吗？"一个名叫庆庆的一年级女孩回答："知道"。老师说："你讲讲看"。

女孩背了一首"朝代三字经"："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

明清。”

老师问:“谁教你的?”女孩说:“我爷爷。”

这两本书,有便人就可以带给你们看,很有趣,也很有道理。祝

你们身体健康!

太奶奶允和

1995年8月6日

二、给安安第八封信

亲爱的小安安:

我和太爷爷时时刻刻想念你,你知道吗?我们一进太爷爷的书房,看到那个有活动靠背的小椅子,就想起你一面吃饭、一面玩活动靠背的样子;我们一清早起来,就想到你的那么好听、那么娇嫩的 Morning;太爷爷说“脏死了”,太奶奶说“我的妈呀”的时候,就想起你学得很快、正确又好听;当太奶奶整理那个日本小橱里的坛坛罐罐的时候,太奶奶就想起什么时候,你来我们家,搬出搬进那些坛坛罐罐呢?我想你再来我们家的时候,一定会数到一百、一千了。小家伙,你还记得太爷爷、太奶奶吗?

你那许多位动物小朋友,它们也很想你。大象爷爷还是守在你的那张歪脖子的照片旁边,它的大鼻子吻着你的臭脚板心;大老虎不声不响,住在大书橱最上一层楼,它想你来捏它,它就大叫几声,发发虎威;打鼓人闷声大发财,他想你回来,他就打鼓欢迎你;那一对小情人,要等待你回来,他们才高兴亲嘴。你也想他们吧!

1995年10月8日,上午孙伟先生来。带来了你阿公、你妈妈的信和杂志,要寄出的六封信,还有要打电话请黎薇来拿信、杨子坚来拿盒带。太爷爷马上就打电话给他们。下午他们就把信和盒带拿走了。



阿公信上说，10月9日是闰八月的中秋，你们要来电话。可是我们9、10两天都没有得到你们的电话。

你阿公两次去美国开会，成绩如何？我们很想知道。阿公又说，你们大家都好，只是阿公有时要感冒。你让你阿公要当心身体，常常要揉揉鼻子。你妈妈小时候，一打喷嚏，太奶奶就让她揉鼻子。太奶奶现在还常常揉鼻子，对感冒很有用。你们不妨试试看。

前天，包海燕来电话，她说，中关村的房子已经交了一千五百元的定钱，第一次交钱要到明年三、四月。今年7月，晓平薪金没有扣，可是8月以后，每月晓平只有七百元。

还有一件事是你妈妈在SRT公司的一年合同已经到期，是否延长？请你妈妈来信或者来电话告诉我们，让我们放心。

三舅太公、太婆已经从美国回到北京。从我的大姐那儿复印了八张照片，从我八岁到三十七岁的照片。非常有趣。

我们的老年维生素已经吃完了。太奶奶的假糖也快完了。假糖的名字是NECTA SWEET，是粒状，不要粉状。

小蒋谢谢你们的问候。她要我也向你们三代问好，她特别想小安安。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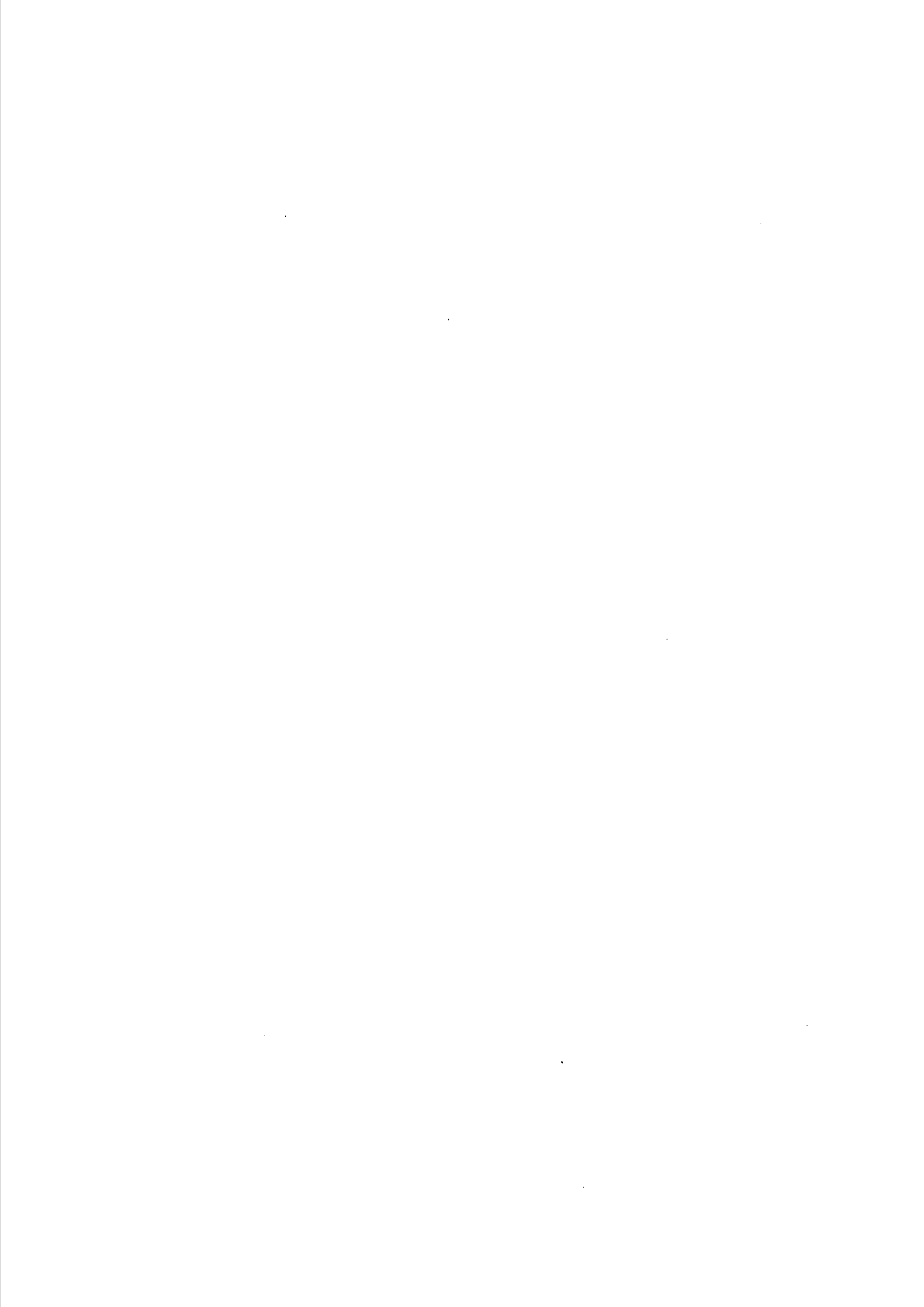
你们好！

太奶奶允和

1995年10月12日

沈二哥

老是叫我媒婆



半个字的电报

（这篇关于沈从文的短文，写在1988年5月9日。本来是准备给沈从文看了逗他取乐的。想不到沈从文在第二天就去世，没有能看到。现在沈从文去世已经四个年头了。我把这篇短文找出来，略作修改，予以发表。这样，一篇取乐的短文，竟变成了悼念的祭文。）

1988年4月6日上午10点多钟，我陪同台湾的青年作家张大春，到北京崇文门东大街22号，访问我的三妹夫沈从文。虽然大门上贴着“免进牌”，我们还是破门而入。



我向沈从文和三妹兆和介绍了张大春。三妹沏上一壶湖南绿茶。咱们坐下聊天，聊上一大堆旧事和笑话。前三朝，后五代，谈文章，扯家常。不知为什么，一扯就扯到了我那“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笑了，指着我轻轻地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我提出抗议：“你说什么？”他用浓重的湖南腔重说一遍：“媒婆！”我说，“我做了你们的大媒，不感谢我，反而说我是媒婆？”话未落音，三妹抢着说：“你不仅做过媒婆，还做过收生婆呢！”

三妹说得没错。我自幼好管闲事。抗战时期，逃难到四川乡下，到处缺医少药。我凭一点卫生常识，常常施医给药、替孩子种牛痘、开刀挤疖子、给人打针，什么都干，像一个免费的“赤脚医生”。我又在江安，给戏剧家蔡松龄的夫人接生，难产变成顺产，生下一个大胖儿子，我给起名“安安”，做了我的干儿子。直到一

个做护士的表妹骂我："瞧你不要命！你又不是医生或护士，一针把人戳死了怎么办？"这才洗手不干这些三姑六婆的营生。

为什么说到"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就要说我是"媒婆"呢？这件事，四妹充和在她写的《三姐夫沈二哥》文章里首先提到。后来凌宇先生在他的《都市中的乡下人》一书里也谈到，可是都谈得太简单，看来我不得不再给他们二人做个注解。下面我把可笑的历史往事从头说起。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10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家看门的吉老头儿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个客人一听，不但不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面发愣。吉老头儿抱歉地说："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

我家有个大小姐，常常不在家。我这二小姐成了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三个字："我走吧！"他这话好像对我说，又好像对他自己说。我很快把话儿转个弯："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巍然不动。我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他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三妹回来吃午饭。我怪她："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三妹不服气："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我说："别说了，吃完饭，马上去。他是老师

么!”我告诉她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三妹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三妹是他的学生。

“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我说。

三妹只是摇头。

我为她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好办法。就说:“还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究竟是远道来的老师呀!”

三妹不得不同意。她问我:“怎样开口呢?”我说:“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说:“好,听你的。”她终于去了。

去了不到一小时,三妹同沈从文来到我家。三妹让五个弟弟轮流陪伴沈先生。沈从文善于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听得最起劲的是最小的小五弟。故事一直讲到小主人们被叫去睡觉为止。我呢,不做臭萝卜干,早托词走开了。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在我家作客。几天后,回到他当时教书的青岛大学。次年,由于沈从文的介绍,三妹也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了。

那年在苏州的旅馆,他们俩见面时候是怎样开腔谈话的呢?几十年后,我才知道。

1969 年 9 月,沈从文和三妹已经结婚三十六年,住在北京。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三妹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俩先后下放湖北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三妹先走,沈从文晚了好几个月才去。沈从文下放前一天,我去送行。闲谈中,他告诉我三十六年前的情景:

“那年我从苏州九如巷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下躺倒在床上,也无心吃中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我请她进来,她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



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把我教她讲的话，一字不差，背了出来！

1933年初春，我和三妹一同住在苏州。一天，三妹给我看沈从文给她的信。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我准备了一番话给报务员做解释。想不到报务员匆匆一看，就收下了电报稿，没有问什么。我得意洋洋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一人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报务员看了电报稿，觉得很奇怪！密码？不收！报务员要三妹改写文言，三妹不肯。三妹涨红了脸，说这是喜事电报，说了半天，报务员才勉强收下。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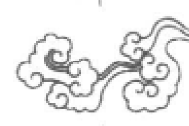
天长地久有时尽。这“半个字”的电报，以及这个白话文的“蜜”电，在三妹和沈从文的心中将是天长地久永无尽的甜蜜记忆。

（原载1992年7月《群言》杂志）





1934年，沈从文、张兆和在北京西郊达园。



一封快信和一页日记

一封快信

大春：

5月9日晚上，我把《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的初稿写好。松了口气，晚上睡得很沉。

10日晚7时多，得三妹电话，说沈二哥不好，我就揪心了。9时多得我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电话，说沈二哥在8点35分去世。这一夜我和有光都觉得心绞痛。虽然是意料中的事，可是怎样也拨不开沈二哥的身影。这时候距离我的《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脱稿只有二十四小时。我准备等我的文章

发表后要宣读给沈二哥听,让他再笑我、骂我。这下再不能听到沈二哥骂我的声音了。他骂我“媒婆”的笑语声还在我耳边回荡。

你可能是最后一位由台湾来见到沈从文的人。你见到他三十四天后,他就离开了他爱的人、他爱的世界。

附日记一页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一文,没有心情修润改错,望你为我修理修理。

一页日记

1988年5月11日,下午2时35分,我们到沈从文家。进门,家里比平时更安静。客堂里,沈二哥的一张照片被披上了黑纱,照片前的茶几上有一篮绚丽多彩的鲜花,这是小龙朱的花场的花,是二哥的大儿子小龙朱亲手栽培的花。我们只默默地注视着沈二哥的照片,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孩子们说,三妹在休息。我轻轻推开沈二哥和三妹卧室的门,三妹站在床前,并没有睡。我轻轻抚摸着三妹的手,我们在书桌边坐下。三妹很平静安详。我默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倒是三妹先开了口,像叙述一件别人的事。她说:“二哥昨天下午4点多钟时,还扶着四妹充和送他的助行器笑着走路。5点多钟二哥感觉气闷和心绞痛,我扶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他不让我离开他,但又说要送他上医院。”当时家里只有三妹一个人和一位刚请来不久的男保姆。三妹安慰了他,匆忙打了几个电话。三妹又说:“过去在他五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

“先是20号楼(三妹家住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我们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来了,摸摸脉、听听心脏,不言语。随后救护车和医生来了,历史所里的王序、王亚蓉来了,家里人也陆续回来

了。进行抢救，打了三针强心针，几位医生护士轮流进行人工呼吸和按摩心脏，一直到晚上 8 点 35 分……”

三妹回头问她的小儿媳张之佩说：“给二姨倒茶没有？”我说：“已经有了。你这五年也太累了。除了照应沈二哥，你什么也做不了。”

三妹还是那样镇定、安详。这安详内含着一颗哀沉的心。

三妹低沉的声音：“是的，我很佩服冰心，她的身体比我坏得多，可是她还在写。我要学她，这以后，我空了，我要写二哥，写他最后的五年，写……”

写吧，这是最大的安慰，对过去的人、对现在的人、对未来的人！

（1988 年 5 月 12 日）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上海有一条最早修筑的小铁路，叫淞沪铁路，从上海向北到炮台湾。

英国怡和洋行在同治年间（1862—1874）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自行开始修筑这条铁路。到光绪二年（1876）完工。从上海到吴淞镇，路长只有十四公里。第二年（1877），清政府认为外国人居然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这条铁路就破坏了风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跟怡和洋行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涉，出钱把铁路买到中国手中后，在愤怒之下，下令拆毁。把机件等物储存在炮台湾。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新拨官款在原地修复通行。因为机件在炮台湾，淞沪铁路由吴淞镇延长两公里，全长为十六公里。

中国公学就在吴淞镇和炮台湾之间，它们三个所在地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公学的同学都以学校在中国第一条铁路所在地为荣。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 1927 年，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的。这时候三妹十七岁、我十八岁，第一条铁路整整三十岁（如果不算前二十年的账）。

我和三妹不但同时进中国公学，还在她三岁我四岁同时（1913）在上海同一天开蒙认方块字，念“人之初”。四年后（1917）搬家去苏州，同在家塾里，同在一个桌子上念《孟子》、《史记》、《文选》和杂七八拉的五四运动的白话文。我们三个女

学生（大姐元和、我、三妹兆和）很阔气，有三位老师：一位道貌岸然于先生专教古文，另一位王孟鸾老师教白话文，这是两位男老师。有一位吴天然女教师，是教我们英文、数学、跳舞、唱歌的。在《三叶集》(叶圣陶的子女写的集子)好像提到过她，吴天然老师是教过我们A、B、C、D的。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时进入苏州女子职业学校，读了一年，我们又同时留级，因为除中文课程外，其他课程都不及格。我们两姐妹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患难姐妹。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我却先后读了三个大学。在中国公学两年，一年预科，一年“新鲜生”。就转学光华大学，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学。“一·二八”战争，苏州到上海火车不通，我坐轮船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了一学期。最后，又回到光华大学戴方帽子的。

大学里收女生是新鲜事，男生对我们女生既爱护又促狭。他们对女生的特点很清楚，挨个儿为我们起绰号。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名字我疑心是沈从文起的。原来男生替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鹦哥”，因为我爱穿绿；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可这个绰号见过报的。你如不信，可在1928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新闻，《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平时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五个姓张的是：张兆和、张允和、张萍、张依娜、张××。队长是三妹。我对运动外行，身体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欢滥竽充数，当一个候补队员也好。

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参加的五十米短跑是最后一名。

中国公学的老校长何鲁，忽然下了台，到现在我还不知道

是什么缘故。接任校长是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他早年曾在中国公学念过书,他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三妹选了他的课，三妹下了第一堂沈从文先生的课,回到女生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别瞧三妹年纪小,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这些“纸短情长”的信,一律保存,还编上号。这些编号的信,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处,家延死后,下落何处,不得而知。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这封信可没有编号,如果编号也许是十三号。当然,三妹没



1982年,沈从文、张兆和在北京家中。(李又宁摄)。

有复信。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据三妹说，原封不动退回。第四封以后的信，没听见三妹说什么，我们也不便过问，但是知道三妹没有复信，可能保存得相当周密。

我转学到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1929），这以后，沈从文究竟给三妹多少封信，我当姐姐的不好过问。是不是三妹专为沈从文编过特殊的号，这也是秘密。

大概信写得太多、太长、太那个。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发疯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对我说："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我问她："去做什么？"她说："我跟校长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校长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三妹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三妹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以上是三妹亲口跟我讲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们两姐妹都有了孙女时，偶尔谈到"顽固地""爱他"和"不爱他"时，三妹矢口否认跟我说过这些话。

光阴如箭，这箭是火箭，人过了二十五岁后，觉得日子过得比过去快上一倍。一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这半个世纪中，我和三妹同年（1933）结婚，我嫁周耀平（现名周有光），她嫁沈从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儿子，我的儿子叫晓平，她的儿子叫龙朱。卢沟桥事变，我们两家分开。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贡，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从成都到重庆，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后搬家三十次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年，张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会，照了十家欢。这以后又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一直到1956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三弟定和跟我三家。算是欢欢喜喜、常来常往过日子。十年后（1966），猛不丁

的来了个“文化大革命”，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离子散。两年后，北京三家人家只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张家的张以连、我家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连连十二岁独立生活，我的孙女小庆庆九岁。三妹下放湖北咸宁挑粪种田，听说还和冰心结成“一对红”。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儿子晓平、媳妇何诗秀先后下放湖北潜江插秧、种菜。我家爷爷(周有光)下放宁夏贺兰山阙的平罗。捡种子、编筛子、捡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认罪会。大会多在广场上开。有时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编队飞行，雁儿集体大便，弄得开会的人满头满身都是粘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难洗干净。我家有光幸亏戴顶大帽子，总算头上没有“鸟便”。有光跟我谈起这件事，认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来大雁比人的纪律性还强，所谓“人不如禽兽”。

本来也要我带庆庆跟着爷爷下放平罗的。我思想搞不通，不去，就不去，动员我也不去，也无可奈何我。我是娇小姐，受不了那塞外风沙，也吃不下为三个人打井水、洗衣服、生炉子烧饭的苦。我一把锁锁上了城里沙滩后街55号大杂院里我住的房子的大门(原有五间半房子，上缴了四间)住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里儿子家，看孙女烧饭。靠丈夫、媳妇三人给我的微薄津贴打发日子。真正不够用时，我有好亲戚好朋友处可借。虽然他们生活也不好，可他们总会竭力为我张罗。我一辈子怕开口问人借钱，这下子完了，只好厚着脸皮乞讨，这也是人生应有的履历。

过年过节，我把十二岁的小连连接到中关村住几天，庆庆就不肯叫他“叔叔”，瞧不起他。庆庆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叔叔，他只比我大三岁，他没羞没臊，还抢我糖吃。我不但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连连’，我叫他‘小连’。”我骂庆庆，太没有礼貌。实在那时候，孙子骂爷爷，儿子逼死妈妈的事多着呢，还讲

什么礼貌。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1988年5月9日晚初稿
成于沈从文二哥逝世前24小时)





两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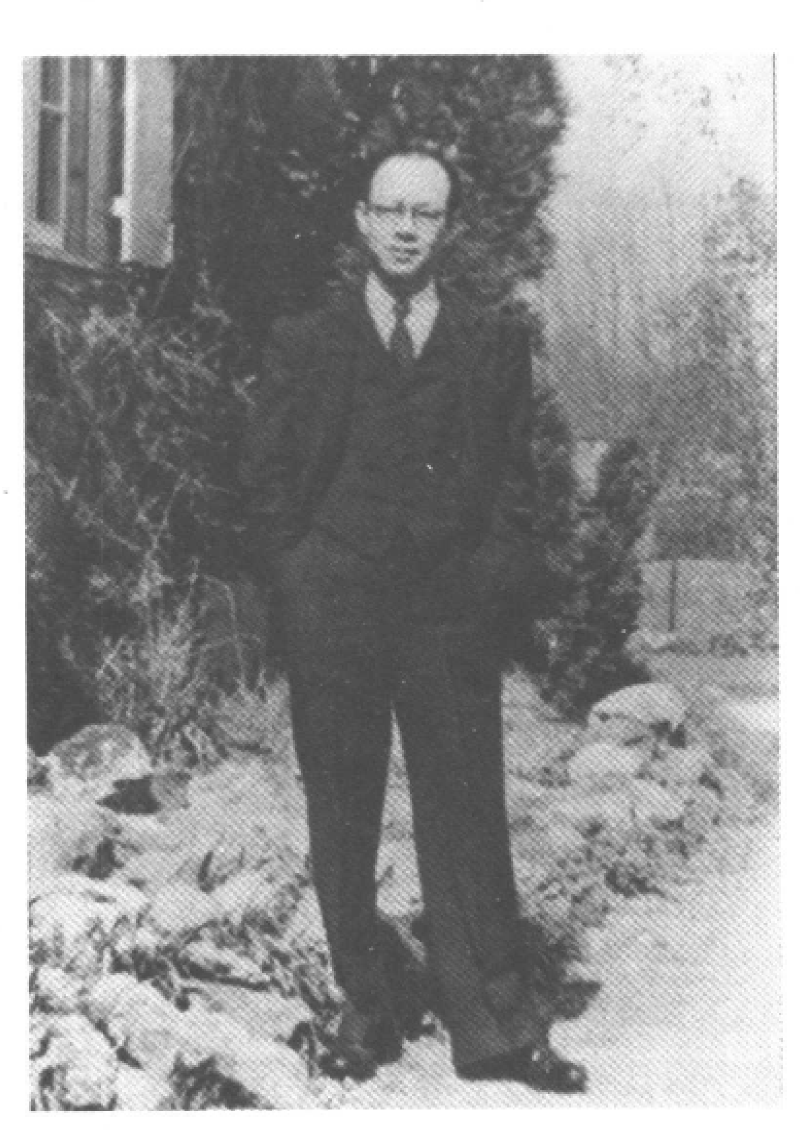
欢欢乐乐在一起
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



温柔的防浪石堤

那是秋天，不是春天；那是黄昏，不是清晨；倒是个 1928 年的星期天。

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他们没有手挽手，而是距离约有一尺，并排走在江边海口。他和她互相矜持地微笑着。他和她彼此没有说话，走过小路，穿过小红桥，经过农舍前的草堆。脚步声有节奏地弹奏着和谐的乐曲。



四十年代的周有光

吴淞江边的草地，早已没有露水。太阳还没有到海里躲藏。海鸥有



四十年代的张允和

情有义地在水面上飞翔。海浪不时轻柔地拍击着由江口伸入海中的防浪石堤。这石堤被年深日久的江水和海浪冲击得成了一条长长的乱石堆，但是还勉强地伸入海中。没有一块平坦石头可

以安安稳稳地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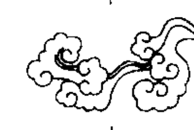
周围是那么宁静,天空是那么蔚蓝。只有突突的心跳、淡淡的脸红在支配宇宙。

走啊走,走上了石堤。她勇往向前。他跟在后面。谁也不敢搀谁的手。长长的石堤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才找到一块比较平坦而稍稍倾斜的石头。他放下一块洁白的大手帕,风吹得手帕飘舞起来,两个人用手按住手帕的四角,坐了下来。因为石头倾斜,不得已挨着坐稳当些。她坐在他的左边。

这里是天涯海角,只有两个人。是有风,风吹动长发和短发纠缠在一起;是有云,云飘忽在青天上偷偷地窥视着他们。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米欧与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大意)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着她的左手。她不理会他,可是她的手直出汗。在这深秋的海边,坐在清凉的大石头上,怎么会出汗?他笑了,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的小手帕,塞在两个手的中间。她想,手帕真多!

半晌,静悄悄地,其实并不静悄悄,两个人的心跳,只有两个人听得见。他两人听不见海涛拍打石堤有节奏的声音,也听不见吴淞江水滔滔东去的声音。他放开她的左手,用小手帕擦着她的有汗的手。然后他擦擦自己的鼻子,把小手帕放回口袋里。换一个手吧,他小心握她的左手,希望她和他面对面,可是她却把脸更扭向左边,硬是别过头去不理他。他只好和她说悄悄话,可是没有声音,只觉得似春风触动她的头发,触动她的耳朵,和她灼热的左边面颊。可是再也达不到他希望的部位。

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可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



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以后，不是一个人寂寞地走路，而是两个人共同去探索行程。不管是欢乐，还是悲愁，两人一同负担；不管是骇浪险波，不管是风吹雨打，都要一同接受人间的苦难，更愿享受人间的和谐的幸福生活！

这一刻，是人生的开始，是人类的开始，是世界的开始，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刻。

这一刻，是两个人携手跨入了人生旅途。不管风风雨雨，波波浪浪；不管路远滩险、关山万重，也难不了两个人的意志。仰望着蓝天，蔚蓝的天空，有多少人生事业的问题要探索；面对着大海，无边的大海，有多少海程要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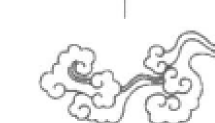
这一刻，天和海都似乎看不见了，只有石头既轻软又温柔。不是没有风，但是没有风；不是没有云，但是没有云。风云不在这两颗心上。

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

（1988 年）



张家的家庭杂志《水》复刊后，周有光是主编张允和的“临时工”，又是她电脑打字的老师，张允和最先学会的词组是“亲爱的”。



八十六岁学电脑

1988 年 4 月 26 日，日本夏普公司送来一部 WL－1000C 中西文电子打字机，给我的老伴周有光。有光用它写文章、写信，工作效率提高了五倍。

1995 年初，我们的儿子晓平给我们又买了一部 GMS－2000 的中西文文字处理机。有光就用这部新的，我把旧的包好，放在大衣橱里。

1995 年 2 月 21 日，是一个好日子。我忽然异想天开，试试

用打字机写信。可是我一不会汉语拼音，二不会普通话，三不会打字。但是我有一位好老师，是我的老伴周有光，又有一部文字处理机放着不用太可惜。我不当它是工作，当它是娱乐。这样，我就发现了我的新大陆。

我是用双打全拼的汉语拼音转变汉字的。双打全拼也就是所谓声韵双拼。一个字有声有韵，例如：Zh 加 ong 就转变为“中”字。我很喜欢这个办法。打起来比较省力。因为我会做旧诗。

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输入，而是多数场合用汉语拼音的语词和词组转变汉字的。我打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我又打我家的地址和亲友的地址和姓名。这样，我足足打了一个星期。到了 2 月 28 日，我才写第一封信。我很笨，打到第五封信的时候，我还是先写好汉字后打字。到打第六封信的时候，我才由看打改为想打。两个月来，我打了九封信，四篇文章。实际上我在电脑上只花了六十小时左右。《新华字典》和《汉语拼音词汇》是我的工具书。

我初步的学习是这样的：

(1)最好一开始就多多用语词输入，而不是一个一个字输入。我们的语言很多都是双音节的，许多成语是四个字的。我第一个打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给了我最大的兴趣。

(2)其次，我对拼音不熟悉，我就用机上的“常用字”。这四十八个“常用字”对我非常有用。

(3) 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的时候，我得耐心寻找我需要的字。这是很好的机会让我学习拼音。

人们说，现代青年应该学电脑。我要说，我们老年人也应该有能力、有志气“玩”电脑。小孩儿玩电子游戏机，老头儿、老奶奶不妨也把电脑打字当做游戏。你看，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八十六岁老太婆，也会这玩意儿了。

(1996 年)

喜的是《水》，忧的也是水

1995年10月，我给十个姐弟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七十年前，我们姐妹兄弟办了一个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议继续办下去。

多少年来我有一个心愿，想写我们的爸爸张冀牖，特别是写他独资办学的经过。校董叶圣陶先生也几次催我写。现在头顶已经光秃秃的"小五弟"也来信要我写。可是我年老多病，提不起笔来。现在，我的白内障做了两次手术，植入人工晶体，眼睛几乎跟正常一样。我想，我可以动手写了。不但要写爸爸的事，还要写我们一家人的真人真事。不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办到的。我要发动我们爸爸的十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一同来写，也要他们的子女共同来写。

首先，大家都来写对我爸爸和大大（母亲）的回忆。可以抄录有关的日记、信件、文件等等。其次，写自己、写配偶、写子女、写孙儿女、重孙儿女都可以。还可以写在我家门里的外人，如教书先生、保姆、门房、厨子等。

我自幼在家塾念古书，最佩服的古人是司马迁。我想学习司马迁的体裁，写一篇叫《保姆列传》。

这封征稿信，果然发生了效果。1996年2月，我们的《水》复刊号问世了。我复印了二十五份，在十家姐弟和极少几位亲友中传看。现在已经出了三期。

我们的《水》，写的都是家庭琐事，不拘一格，有文章、有诗

词、有书法、有图画，还有蜡染。这是家庭里的小玩意儿。想不到被《群言》的名记者叶稚珊女士看到了，大为赞许。这是我的一"喜"。

叶稚珊女士来电话，要我为《群言》"喜与忧"这个专栏写点东西。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家正为没有水烧饭发愁。原来，我们大门外修马路，水管损坏，漏水不止。我们的胡同里尽是水，可是家里反而没有水。

十四年前，我家离开了沙滩后街的清朝老房子，搬来朝内后拐棒的新房子，非常高兴！但是不久，每间屋子都漏水。四楼王家的水漏到我家，我家的水漏到二楼的陈家。今天王家来我家道歉，明天我们到陈家说"对不起"。睡在床上，一睁眼就看到墙上漏水造成的烟波万里图。颇有些"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担忧。这是我的一"忧"。

"水"是无罪的，它的泛滥成灾大都是人的问题。古人说，水可载舟，水可覆舟。《水》使我喜，水使我忧。

（1996年11月16日）

伤痕篇



伤痕不是病 总有一天会痊愈



小 丑

1968年8月13日那天，下午3点钟左右，北京沙滩后街55号的一个大杂院里。我家住了两间屋，外屋东南两边都有碧纱窗子。东窗下我种的马来西亚有棱角的丝瓜，已经长得又长又粗了，它的大叶子的浓荫遮覆了我的屋子。南窗下人家种的玉米也高过了屋子。天气十分闷热。我和十五岁的干女儿小红，躺在里屋的床上休息。



突然传来很急的敲门声，人声嘈杂。小红看了我一眼，我示意她快去开门。小红没有来得及开好门，一群男女就拥了进来，门外还有一群不大不小的孩子被大人们阻止了进来。孩子们就爬在东窗外的丝瓜架子上，站在碧纱窗的窗框上，向屋子里张望。

我从床上一咕噜爬起来，穿好鞋子，从里屋迎了出来。一共进来八个人。

我们里弄的副主委，把两个陌生的小伙子介绍给我说，他们是北京大学来“外调”的。当然没有介绍来客的姓名。其余六位都是里弄干部。

我让两位不速之客，也是当时的英雄人物，坐下来。

我家的一张小小的红木桌子，以前是人家打麻将用的，我得来做了吃饭的桌子。桌子放在两方东窗的当中，一边靠东墙。我坐在南面，脸向北。两个小伙子，一个坐在我对面，一个坐在我的左手，其余六个散坐在床上和凳子上。

我刚坐下，小红给我一个人倒来一杯茶。我们家的规矩，应该先请客人喝茶。可是小红知道这些客人不会喝我们家的茶。他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如果喝了资产阶级人家的茶，那就划不清阶级界限了。

他们来势汹汹，很有气派地坐下来。我对面的小伙子开口讲话了。

“我们是北京大学派来外调张芝联的！”

张芝联？他是过去上海光华附中的校长。我在那儿教过书。他比我小十岁左右。他出了什么事？

他们像连珠炮似地问了我关于张芝联的好几个问题。我都茫然，只得回答：“不知道”。几个“不知道”，就触怒了他们。

左手的小伙子指着我的茶杯说：“拿开，不许喝茶！”

我乖乖地把茶送进里屋，小红接了去。小红有点难过，她巴巴地送上这杯茶，我一口也没有喝。

我匆忙地回到外屋，正准备坐下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吆喝：“不许坐，站起来！”

我还没有坐稳，就扶着桌子边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背后的椅子，挡住了我的腿，所以我的身子紧靠着桌子边。这样的站法似乎有所依靠，让他们看上去很不顺眼。

左手的小伙子又吆喝了一声：“不要靠桌子，退后两步！”我遵命退后两步，把椅子用腿推到后面，靠到椅子上。他们可能想：不叫你靠桌子，你又靠上了椅子！那小伙子又嚷了：“向前走一步！”

我又遵命向前走一步。这样，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没依没靠地站着。他们可能是满意了吧。

我站稳了。我想，我是快满六十岁的老太婆了。这些年轻人，是在导演我唱什么戏呢？他们是十分严格和严厉的导演，而

我是忠实执行导演指挥的好演员。

一抬头，窗子外面都是孩子们可爱的小脸和一双双惊奇的大眼睛。我看不见丝瓜的大叶子。

我等待他的再次吆喝。他在几次大声嚷嚷之后，似乎有些累。不过，年轻人是不会累的，尤其在这种场合。

我对面的小伙子说："你仔细想想，张芝联过去干过什么政治勾当！你又何必包庇他呢？"我很感激这个小伙子对我的温和态度。

我说："我们只同过不到两年的事。他是校长，我是教员。我们仅仅在会议上碰头，讲过很少的话。"我回答的时候，声音轻了一些。也可能是他们大声嚷嚷之后，耳朵有点儿不灵了吧！

左手的小伙子又叫开了："噢！叫你讲话，你说得那么轻。你对外国人讲英语的时候，倒呱啦呱啦的！"我想笑不敢笑。他们几时听见我和外国人讲话？外国人就怕大声嚷嚷。那样对客人、对主人，都是不礼貌的。

对面的小伙子打圆场了："给你五分钟，考虑考虑，张芝联在三十几年前，参加过什么反革命组织。"

给我五分钟，因此全屋子里的人，连我在内，都得到了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布满在屋子外面的瓜架上、窗框子上的孩子们，也似乎安静了些。

给我五分钟，这多么宝贵的五分钟！我应当考虑张芝联的事了。不过，他们问我，张芝联三十几年前的事。那时他不过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会参加什么反革命组织呢？我就更不知道了。

我把两脚放开了些，八字脚站起来更稳当，免得身子晃晃悠悠的。这时候，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坐在我对面的小伙子。

嘿！好漂亮的小伙子！年纪不过二十岁多一点儿，雪白粉嫩的脸，一双黑白分明、很有威严的眼睛，还是双眼皮呢！看上去



只有大学一年级。

我想：他跟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温柔、非常温柔的美男子！

我又想：这个小伙子要是我家里的人该多好。我惟一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这小伙子算是我的儿子，太小了些。我只有一个孙女儿，小名儿叫庆庆，今年才八岁。这小伙子算是我的孙子又太大了些。如果我的儿子和孙子跟我“斗猴”，我生气不生气呢？

我，自己问自己，我，自己回答：“不生气，才不生气呢！只要孩子们觉得有趣，我就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我想举起右手，手托香腮，好帮助我仔细地想。不行，这个姿态可能会引起误会。我依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左手的小伙子咳嗽了一声。

这时候，我忽然产生了危险感。这不一定是有趣的事。斗争是尖锐的，是面对面的。斗争不但伤人的身体，更会伤人的心。也许有一天会斗死！不，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不过那也不要紧。我能活到今天，活了六十年，也就够本了。过去就是有时有病痛以及人世间的许多折磨，也应当算是美好的生活。活着就是美呀！

我这种想法，很有点“阿Q精神”。“阿Q精神”是蛮有道理的。我几乎想长长地舒一口气。

左手的小伙子突然站了起来，伸一伸胳膊。我想：不会要打我吧，打人在今天是家常便饭呀。

哦！他原来是在深呼吸。他轻轻地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又坐了下来。我瞥了他一眼，这个小伙子黑黑地，比较粗犷。我没敢仔细看他。

我想：对面白脸的是常山“赵子龙”，这黑脸的是“猛张

飞”。他们都是好样的英雄！

这五分钟怎么会这样长？我由“赵子龙”、“猛张飞”想到了唱戏。记得我在北京昆曲研习社演过几次小丑。

我现在又在演戏了。戏里总要有一个小丑，戏才更有情趣。我演小丑的时候，沈盘生老师先替我在鼻子上画一块白豆腐干，再勾上几笔黑，勾得很有书卷气。

我演过四出戏的小丑：第一出是《西厢记·寄柬》中的琴童。琴童知道红娘躲在桌子下面。他故意说《西游记》，最后把桌子一拍说：“啪哒一声响，妖精出洞门！”这时候，红娘大吃一惊，急忙钻了出来！真正有趣得很！

第二出是败子回头《金不换·守岁》中的书童。这出戏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败子姚英，另一个就是我扮演的书童。书童引诱败子赌钱，左手拿着一个大青花碗，右手掷骰子，那个样子很滑稽。

第三出是《白兔记·出猎》，我演的是咬脐郎身边的一个旗牌军的小头头，名字叫王旺。有一次，演咬脐郎的胡保棣摔掉了紫金冠。王旺我拱手说：“启衙内，我去取你的金冠来！”我很得意，我在舞台上能随机应变。想到这里，我可能扬一扬我的眉毛。

第四出是《风筝误·后亲》，也就是川剧的所谓《美洞房》。这出戏我们曲社演的次数最多。我演丑丫头，丑丫头有许多有趣的台词。像跪下来发誓说：“我个糟糠阿太，鸭蛋头菩萨，我若个夜头领子韩状元进来末，阿要像今夜头能个，勿肯做亲个哆！”又说：“今夜头是勿困个哉，像走马灯能格走一夜个哉！”最有趣的是三个“岂有此理”。第一个是韩状元骂岳母闺门不谨的“岂有此理”。第二个是事情搞清楚之后，岳母责备女婿也说“岂有此理”。第三个是丑丫头骗状元说“夫人来哉！”状元开了门，丑丫头就学舌说：“岂有此理！”李笠翁的戏，戏剧性是很强的。



我往往在生活的危险关头，想到一些有趣的事，以排遣我的苦闷。我想，他们不会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知道了，那我准得被剋了！

我今天又在扮 演小丑了。是好心肠的小丑，还是坏心肠的小丑？我好像还没有演过坏心肠的小丑。不，不对！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做好人，别人是坏人。自己说自己是好人不能算数。别人说你是坏人，恐怕也不能算数，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当然不会了解你。算了吧，不要把自己当做好人，就算自己扮演的小丑是个坏人也罢。

我瞧了瞧对面的“赵子龙”，他是我一抬头就能看见的人。我不大敢看“猛张飞”，我转头斜眼对他是不恭敬的。“赵子龙”不是小丑。不，小丑脸上不一定有块白豆腐干。他们是小丑？我是小丑？我有点糊涂了。

这时忽然想起他们问张芝联反革命的事，这才“思”归正传。张芝联现在北京大学教西洋史，从前我在光华附中教过中国史。“教历史”，这就是二人的共同之处。

由此我想到了历史。历史上我是好人也罢，坏人也罢，那是后人评价的事。历史是悠久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宇宙更是无限大的。像我这样的人是很渺小、很渺小的。但是我这个很渺小、很渺小的人，曾经绕地球一周。那时候绕地球一周不像现在这样容易。我要是给这两个小伙子斗倒了，也还是十分丢脸的事。

我想：在整个世界上，我是一粒小灰尘，一阵风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了。不，还有“物质不灭”定理哩！我现在是一个实实在在活着的人，虽然非常非常渺小！

我反反复复地想：“他们是小丑？我是小丑？”这出戏也许双方都是小丑。有这样一出戏吗？我倒一时想不起！我们这出戏，屋子里的大人，窗子外面的孩子们，都看得很来劲。

好不容易过了五分钟。我想这是足足的五分钟，不然时间怎会这样长？

“赵子龙”看了一下表：“交代吧！该想起了吧！你过去难道不曾打听他干过什么事？”

我脑子里这才又想到张芝联反革命的问题，把小丑暂时搁置一边。如果再给我五分钟，我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

“交代，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我不敢说得太轻，也不敢放大喉咙。我把声音调整到恰到好处，慢慢地说：“他是校长，我是教员。我没有到过他的家，他也没有来过我的家。我从来没有想到去打听他过去的事，那时候好像不作兴去问人家的履历，他过去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左手那位“猛张飞”生气了，大声说“不知道？岂有此理！”

好一个“岂有此理”！这是第四个“岂有此理”！戏剧性强极了！

他接着说：“你不坦白交代？你包庇他，刘、邓包庇你！你们一伙都不是好东西！”他算替我下了很客气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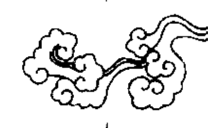
屋子里的人七嘴八舌地都来劝我。什么坦白从宽啦，抗拒从严啦！要我好好地交代，否则就要吃苦啦！

我有什么好说的？这时候，我失去了涵养。我气愤地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能造谣说谎。我不能向群众脸上抹黑。我不能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

一屋子的人听了我这个断然的回答，大为愕然！大家沉默了一会。那位“赵子龙”站起来说：“好吧，用笔写你的交代吧，过三天我们来拿！”

他们一哄而散地开门走了。

门打开了，走的走了，可是另一批人涌了进来，是一大群原来趴在窗子外面的不大不小的孩子们。他们直奔里屋我孙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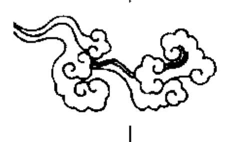


庆庆的玩具橱，翻腾了一遍，跳跳蹦蹦地各人拿了一些玩具走了。

孩子们在窗外的时候，已经把碧纱窗子踩坏了，也把我小心经营的瓜架子踩倒了。我从此再也不种瓜,更不栽花!

我和小红又躺到床上。我对十五岁的小红说:“幸亏今天庆庆不在我的身边!”

（1979年6月1日儿童节改写,12月8日复写。）



小白兔

1959 年,我家有了一个孙女儿庆庆。当庆庆还不会叫爷爷奶奶的时候,家里的人和亲戚就叫我们爷爷奶奶了。

庆庆有好多玩意儿。这些玩意儿不但来自中国各地，还来自世界各国。

当她四五岁的时候，单是玩具中的娃娃就有十多个，奶奶正式起名的就有五个。

第一个身材高大,排队排在第一名,是个中国娃娃,名字叫钟兰。两条乌黑的小辫子,黑眼珠子,穿着一身朴素的中国式衣服,是右大襟的。冬天庆庆穿上了毛绒衣,庆庆也要求奶奶给钟兰编织一身毛绒衣。奶奶编织的是一身蓝色红边的。奶奶说,钟兰是最听话的娃娃。钟兰常常和庆庆在一起睡午觉。庆庆不肯睡觉,奶奶就说:“你瞧,钟兰真听话,她一倒下来,就闭着眼睛睡着了。”庆庆也就闭上了眼睛。

第二个是洋娃娃,是她在苏联留学的爸爸(晓平)从苏联带回来,送给庆庆的周岁礼物。一头金黄色卷曲的头发,蓝眼睛会动,长睫毛,精神得很。奶奶给她起名叫苏菲,也是个高个子,排队是第二名。

第三个是少数民族姑娘，她梳了好多条小辫子，头上歪戴着一顶有珍珠璎珞的帽子。腰上系一条绣花围裙，跳起舞来爱煞人,辫子和珍珠璎珞相互摇晃着。奶奶叫她苗苗。苗苗生得苗条，是一位苗族姑娘。娃娃们表演节目的时候，总是她出来跳



舞、唱苗歌。表演的时候,还有乐队伴奏呢!乐队是庆庆自己创造的。她用各种颜色的胶泥,捏成各色各样的小人儿:打鼓的、敲锣的、吹笛子的、弹琵琶的。还给娃娃们做了一个“麦克风”。麦克风的后面拖着一条细而长的电线尾巴。

第四个叫小红,她穿一身红绒衣服,戴一顶有白羊毛边的红风帽,很像外国童话里的“红帽儿”。但是小红没有“红帽儿”那样勇敢,她是不敢跟狼外婆斗争的。小红缩手缩脚,怕冷,是个娇生惯养的娃娃。小红很漂亮,有一对小酒窝,总是对人笑。还不大会讲话,最多只有一岁吧。小红很乖,出门不要人抱。穿上雨衣,就让庆庆背在肩膀上了。

最小的一个叫咪咪,只有三四个月,还包在“蜡烛包”里。咪咪身高只有一寸。四个姐姐都抢着抱她,尤其是大姐姐钟兰最爱她。出门的时候,庆庆抱钟兰,钟兰抱咪咪,再背上小红。我说:“庆庆,你太累了,别带咪咪了,万一钟兰抱不住咪咪,咪咪会跌坏的。”庆庆说:“是呀,外边风大,她要伤风的。”后来庆庆出门就不带咪咪了。

还有苏联的“七姊妹”,大大小小一共七个,一个套一个,都是空心的,最小的一个才是实心的。七姊妹都包上红红绿绿的头巾。庆庆有时让她们排队,有时把糖果、炒米塞到她们的肚子里。这也是庆庆的爸爸带回来的。我们都不把她们看做娃娃,没人抱她们。她爸爸说:“你们不要瞧不起她们,有人收集全世界的娃娃,就缺少苏联的这种娃娃,最后花了很大气力才找到了她们。”

院子里许多跟庆庆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平时常常来我家和庆庆一起“过家家”。孩子们个个都喜欢娃娃,你抱一个,我抱一个,这个给娃娃喂奶,那个给娃娃做饭。孩子们羡慕地说:“庆庆真幸福,庆庆有十几个娃娃。”

庆庆喜欢上北京动物园。每次去都要换一身她认为最漂亮

的衣服,奶奶说她太爱打扮。庆庆说:"我穿花衣服,是请孔雀开屏。奶奶,你也穿花衣服。"

她喜欢动物园里第一胎生的熊猫姑娘,叫"明明"。明明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去看她。动物园的阿姨正在用奶瓶给明明喂奶。明明顽皮,吐出了奶头,溅了自己一身的奶。阿姨一面擦明明身上的奶,一面说:"真顽皮!"庆庆哈哈大笑!

庆庆不喜欢看老虎和笨狗熊,更不喜欢河马。那个也是第一胎生在北京动物园的小河马,是个男孩,也叫"庆庆"。小河马和我家庆庆都是1959年"国庆"生的,我们说,小河马是庆庆的哥哥。庆庆说:"我才不要河马做哥哥呢!大嘴巴,丑八怪!"庆庆还喜欢一大一小的长颈鹿。可是庆庆最喜欢的是猴子,在猴子笼边一看就是两个钟头。

有一次,笼子外边的人们都走完了。爷爷和奶奶拉着庆庆准备回家。庆庆一面走,一面回头看猴子。有一只小猴子忽然高兴起来,骨碌骨碌一连翻了七八个跟头。庆庆拉我们回到笼子边:"奶奶,猴子给我们表演翻跟头呢!"那小猴子望着她。庆庆指着小猴子说:"你真好!给你一块糖!"她把自己留下的一块最心爱的糖,给了小猴子。

有一天,庆庆又嚷着要去动物园,找那个为她翻跟头的小猴子。我被她闹得没办法,我说:"我们在家里搭一个'动物园',好不好?"庆庆把她的两盒积木都倒在她"过家家"的长方矮桌子上。这个矮桌子原来是一张钢琴凳子,钢琴没有了,只剩下这张凳子,放在我的床头边。我跟庆庆合作,先搭围墙,再搭屋子,每一个动物都有一个住的地方。当中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到每一个动物的家。

我叫庆庆把她玩具中的所有的动物都安排在里面。她按照北京动物园的格式:熊猫一进大门就能看见,长颈鹿住在西北角。她对动物一律平等,凡是动物都进动物园,跟凡是小孩都进



幼儿园一样。人家为她用尼龙线编的蝴蝶、龙虾，也进了动物园，占的地方比老虎的屋子还大。

只有一个小动物，奶奶不让她进动物园，就是小白兔。

小白兔出生在美国。我的四妹（充和）在美国，她的女儿叫爱谟。小白兔是爱谟送给庆庆的。爱谟也是1959年生的，跟庆庆同年，大庆庆不到两个月。

小白兔是爱谟玩具中的珍品，是她最亲密的小伴侣。当爱谟四岁那年，她的妈妈，我的四妹，在寄包裹给我的时候，跟女儿商量，说："把这个可爱的小白兔送给在中国的小庆庆，好不好？"爱谟心里舍不得。可是她想，自己是长辈，又大两个月，思想斗争了老半天。最后，小白兔进了包裹。爱谟哭了，说："啊，真舍不得你呀！小白兔！祝你一路平安！"

小白兔来到了中国，庆庆看见了喜欢得直跳，伸手就来抓。我说："你手脏，不要碰小白兔。"庆庆洗了手。我又说："你手潮，不要碰小白兔。"庆庆翘起嘴说："奶奶，你手也没有洗呀！我说："对！"我洗了手，也擦干了手。找到一块最干净的小手帕，请小白兔坐上。我用左手掌托起了小白兔，给庆庆看，仍旧不让庆庆抚摸她。我对庆庆说："你如果摆弄小白兔，她会生气的；如果弄脏了她的漂亮的白绒衣，她要哭的！"庆庆看了又看，看了多少次，还是说："我再看一次小白兔，好不好？"奶奶用一方粉红色的手帕松松地包起小白兔的时候，庆庆无可奈何地说："啊，小白兔被我看累了。好吧！让她睡觉吧！奶奶，等我长大了，小白兔就跟我玩儿了！"我把小白兔收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庆庆根据凡是动物都进动物园的原则，向奶奶提出要求：请小白兔进她的"动物园"。奶奶拒绝了她的合理要求。奶奶说："小白兔怕脏，我也怕其他动物欺负她。"庆庆说："让小白兔坐在长颈鹿的背上，多好！长颈鹿顶好的，他常常眯着眼睛向我们

笑呢！”我说：“小白兔喜欢跳，会跳跌下来的。这样吧，咪咪和小白兔一样大，让咪咪进‘动物园’，好不好？”

庆庆生气了：“奶奶，你真是，咪咪再小也是‘人’呀，又不是动物！怎么能把‘人’关在笼子里呢？”奶奶认了错。奶奶舍不得小白兔，庆庆舍不得小咪咪。她们俩都不进“动物园”。

我说：“小白兔是爱谟姑姑送给你的。写封信谢谢她吧。”庆庆说：“我不会写信，也不叫她姑姑。爱谟么，只比我大两个月！”

我说：“不行！你不懂礼貌！你要叫她姑姑，她是你爸爸一辈的人！”她说：“噢！听奶奶的话，就叫她爱谟姑姑吧！姑姑在哪儿，怎么不来跟我玩儿？”

我说：“姑姑在地球的那一边，在我们脚底下，穿过地球，就是她的家。”

庆庆说：“妈妈告诉我，地球是圆的。”她拿起小地球仪说，“我现在站在这里，爱谟……啊，姑姑，她不是颠倒站着吗？姑姑不会跌倒吗？”

我说：“对，地球是圆的，绕太阳转。有时候姑姑好好地站着。我们却是颠倒站着。我们颠倒站着的时候，我们怎么不跌倒呢？这叫做地心引力。”

庆庆摇摇头，“什么地心引力，等我大了，我就懂了。奶奶，地球怎么会动的？是谁去上地球的发条的？”庆庆玩具中有一辆装牛奶罐儿的大型卡车，是她上足了发条才会走的。她的一连串的问题，奶奶回答不了。她怕奶奶下不了台，就说：“噢！我大了，我就懂了。”

1966年6月中，“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我们老两口怕打砸抄抢的浪潮袭来我家，波及庆庆，就把庆庆送到中关村她爸爸妈妈的家去。她爸爸妈妈都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工作。

我们住北京城中心，沙滩后街55号，旧称马神庙，这里住

了一百多户人家，是原先的北京大学理学院。我家原来有五间屋子，到 1968 年，部分屋子被人抢了去，只剩下两间。抢屋子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正当行为。1968 年 8 月 13 日那天，北京大学的两个学生来我家“外调”，在“外调”中把我当做阶级敌人斗争过。“外调”的人走了之后，院子里的几十个孩子，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涌进了我们的外屋，打开我们惟一剩下的书橱。那些书，孩子们不感兴趣。他们又直奔里屋，以庆庆的玩具柜为目标。这原来是我们的床头柜，我把杂物收拾起来，给庆庆放玩具。柜子放在我的小书架旁边，上面整整齐齐地堆着的是娃娃书和几盒积木。抽屉里放小玩具，大一点的玩具，如娃娃、汽车之类，放在下层。庆庆玩具中没有大炮和手枪，女孩子不喜欢杀人的玩意儿。

男孩子抢汽车、飞机；女孩子抢娃娃和小锅小灶。柜子倒了，玩具遍地皆是。

我们屋子外面的过道里，堆了许多烧饭用的蜂窝煤。孩子们一涌而进，又一涌而出，把蜂窝煤推倒了。这样，从里屋、外屋，经过过道，到里院、外院，到处都可以拣到庆庆的玩具。有些玩具不知去向，有些玩具找回来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残缺不全了。庆庆的“玩具之家”被抄家了。从此，院子里的孩子们再也不来“过家家”了。

东窗前的丝瓜架被踩倒了，丝瓜藤子被连根拔掉了。窗子前面变成光秃秃的了。幸亏庆庆先一步去了中关村。

庆庆不在我身边已经两年了。剩下的玩具也在一个多月前送去中关村，都离开我了。可是，她爷爷这两年总在我的身边。

1968 年 9 月 13 日晚上，爷爷没有回来吃晚饭。我等呀等，一直等到夜里 11 点。

北京的秋夜，天气很好，没有一点风，窗外静悄悄地没有人声。我多么希望那个熟悉的咳嗽声和脚步声，来冲破这可怕的

宁静。听,什么声音也没有。

家家窗户都没有了灯光,我也只好关上了灯。

“爷爷为什么不回来?”我躺在床上想呀想。想了两三个钟头,想的事堆成了山,悬崖绝壁的山!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平常总是睡在靠窗的那边床头,我想,换一头睡吧。这头是庆庆的“动物园”和“过家家”的地方。那张小矮桌子紧靠着床一头,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把枕头抱到这头来。

不要想爷爷为什么不回来,想想孙女儿庆庆吧!又想到庆庆的好朋友“小白兔”。

小白兔可能还在我身边,上哪儿去找?也没法开灯去找,开灯会影响对面人家睡眠。

小白兔真可爱,也真小,只有一寸大,一身又软又细的白绒毛,一双小红眼睛出神地望着你,好像红血丝在长长的小耳朵里流动,真像个活的。小白兔不会跳到长颈鹿的背上吧?我伸手到小矮桌子上长颈鹿住的地方。

我困极了!

我仿佛看见小白兔跳到我的手掌心里。小白兔眨了一下眼睛,小长耳朵动了动,跟我讲了许多许多的话。小白兔说:

——奶奶,我,小白兔,会跳、会蹦。不然,我怎么从美国的纽黑文,绕地球半个圈子,来到中国呢?只要我不偷懒睡觉,我比乌龟跑得快多了,快一千倍、一万倍。我的老朋友爱谟送我走的时候,还哭了一场,我很对不起她。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到中国的北京,来看我的新朋友小庆庆。

——老奶奶,你不让我和小庆庆接近,把我藏在花篮里。我呀,耳朵灵,什么都听得见。我又会跳、会跑。我常常夜里跳出来找小庆庆玩。不信,你问庆庆。有一次,她揪着我的耳朵,我叫痛,她才放手。庆庆没有告诉奶奶吗?

——我已经来了四年,可是,这两年见不到小庆庆了。



——老奶奶，上个月13号的晚上，我又跳了出来找庆庆，还是没有找到。我听见门外有个孩子呜呜在哭。我想是小庆庆吧？我从扯破了的碧纱窗子跳了出去。

——我看见钟兰抱着蜡烛包里的咪咪，坐在蜂窝煤堆上哭。她看见我，像见到了亲人，哭得更伤心了。

——钟兰说："白天斗奶奶的事，你一定听见了。这一次，庆庆的规规矩矩的小朋友们，都遭了殃。咪咪还是几个月的奶娃娃，她有什么罪？她被人丢在蜂窝煤堆上，煤倒下来，把咪咪闷死了！"

——我，小白兔，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可怜的咪咪，可怜的小妹妹！钟兰，苗苗呢？

——苗苗是个苗族姑娘，最爱打扮了，头上梳了十几条小辫子。她现在躺在外院子的草地上伤心呢！她的漂亮的有璎珞的帽子没有了，小辫子也被人揪断了，绣花围裙也被人抢走了。他们说：苗苗"奇装异服"！苗苗从此再也不能跳舞了。

——我，小白兔，问："小红呢？"

——钟兰叹口气："小红帽儿，她最怕风风雨雨的。奶奶总是给她裹上一件塑料雨衣。现在躺在里院的水池子旁边。雨衣破了，一身湿淋淋地，她要冻死的！"钟兰又想哭 了。

——我说："钟兰，别哭呀，苏菲呢？"

——钟兰说："苏菲同小庆庆一同到了中关村。还有苏联七姊妹，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我真想她们！"钟兰又哭了。

——我说："别哭呀！再哭就把奶奶哭醒了。奶奶折腾了大半夜，现在刚睡着。你是大姐姐么！"

——钟兰说："还说什么大姐姐，连小妹妹咪咪都保护不了。咪咪——咪咪！"钟兰紧紧地搂着咪咪。

——我，小白兔，安慰钟兰说："放下咪咪吧，让咪咪安息吧！阿门！"

——钟兰轻轻地放下咪咪，脱下了奶奶替她织的蓝色红边毛线衣，盖在咪咪身上。

——我叫钟兰回家，钟兰说："不，我要去找苗苗、小红。你先回家。轻一点，别乱跳，不要惊醒了奶奶！"

——"奶奶，我回来了！"小白兔一跳跳进了"动物园"。"奶奶，你不让我进'动物园'，今天晚上我自己进来了。我和我的动物大家庭见了面。我见到了熊猫姐姐小明明，对她说：'您好！'我跳到蝴蝶的家，抓抓蝴蝶，把大蝴蝶吓飞了。我见到了老虎，我怕！最后，我一下就跳上了长颈鹿的背上。长颈鹿爷爷，眯着眼回头望我笑。"

——"奶奶，奶奶，我在这儿，我在'动物园'里！"

奶奶说："小白兔，'动物园'里很脏，你回来！"

奶奶伸手抓小白兔，一抓一个空！眼睛一睁，小白兔和动物园都不见了。奶奶，我，缩回了我的空手！

天快亮了，屋子里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了。小白兔是来向我汇报的。小白兔是来找奶奶了。我马上去找小白兔。找呀找，找到一个小皮箱，里面有一个小花篮。啊！这就是小白兔的家！

奶奶，我，揭开花篮盖子，小心地解开粉红色的小手帕，小白兔又回到我的手掌上了！

我把小白兔温暖的身体，依偎在我的冰冷的嘴唇边！

我说："小白兔，你平安无事！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还在我的身边！"

爷爷就在这天晚上，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资格，进了"牛棚"。

小白兔想念庆庆，又想进动物园。我把小花篮放进了我的手提包。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庆庆跟妈妈从西郊中关村坐 32 路公共汽车到动物园。我从城里沙滩乘 11 路无轨电车到动物



园。我们祖孙三代，三个女的，在动物园门口，好不容易见了面。前一年，1967年，也是这样和庆庆见面的。

那时候，庆庆在动物园一进门的墙上，看见大字报上有爷爷的名字：周有光。名字上面打了三个红××。庆庆懂得打红××的就是那时的坏人。她问我："奶奶，爷爷怎么是坏人？爷爷是最好的人！"我说："爷爷喜欢说外国的东西好。"

庆庆说："奶奶，您回去告诉爷爷，以后不要讲外国东西好了。爷爷为什么不来动物园？我想爷爷！"

她妈妈连忙说："爷爷工作忙！"

其实，爷爷这两年，除了"学习"，没有工作。爷爷原来研究"汉语拼音"。所以大字报上先称他洋翰林、洋秀才，最后骂他是洋奴。

这天一进动物园的门，我就把小花篮放在庆庆的小书包里，告诉庆庆：我带小白兔进动物园，你带小白兔回中关村的家！

庆庆又问："苗苗和小红呢？"她妈妈赶快说："奶奶带不动许多人！"

我们到处找明明，哪有明明？屋里屋外连一只熊猫的影子也没有。熊猫喜欢吃的竹子也枯死了。

我们到了假山洞的猛兽室，大老虎躺在笼子里，舔舔刚生下来不久的小老虎。小老虎跟小猫一样大。庆庆说："老虎爱他的娃娃！"她妈妈说："虎毒不食子，我们四川有一出戏叫《一只鞋》，说的是老虎生孩子和对人报恩的故事，妈妈回家讲给你听噢！"

到了笨狗熊的地方，有个小狗熊正在表演。游客叫它拜拜，小狗熊就站起来拜拜。庆庆说："这小狗熊倒聪明，听人话！"旁边一位游客悄悄地说："这个小狗熊是马戏团的。马戏团的正副团长是一对夫妇，他们先把一些小动物毒死了，夫妇双双自杀

了。这个小狗熊才进了动物园。”

我想到“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伊克贤和苏锡龄两位女曲友，她们淹死了心爱的猫以后，一同上吊死了。

我拉庆庆去看长颈鹿。本来一大一小的长颈鹿，现在只剩下一个，颈子似乎更长了。树顶上的叶子完全没有了。难道那一只是饿死的？

动物园里本来有个“牡丹亭”，是喝茶的地方，现在茶座也没有了。

我们经过牡丹亭到猴子笼边，只见三五个大猴子蹒跚地走着，警惕地望着游客，当然找不到那个顽皮的翻跟头的小猴子。庆庆很失望。我们绕到猴子住的地方。看见一只猴妈妈的身上，趴着一个小极了的小猴子，像蝎虎一样吸在妈妈身上。庆庆高兴地叫：“小小猴儿！”猴妈妈吓了一跳，转身逃下屋顶，向屋子里跑。猴子现在也怕人了。

我们最后到了孔雀的笼子边。白孔雀浑身是灰土，蓝孔雀呆呆地站在横木上不动。我们三个人站了半天，孔雀再也不开屏。

我埋怨庆庆说：“庆庆，你为什么不穿花衣服？”

庆庆说：“我大了，进了小学。穿花衣服，人家就骂我‘臭美’！”这一天，庆庆穿一件蓝印花布的衣服，深蓝色卡其布的裤子。八九岁的女孩，再不穿颜色娇艳的花裙子了。

这天下午天气本来阴沉。怕下雨，我们三人就分道回家了。

半路上下了雨，我透了一口气。小白兔平安地转移了！

我，奶奶，冷冷清清地一个人回到沙滩的家。

（1979年）

小蜻蜓

北京有三个圈儿——也就是三个城的城门洞，名字有二十多个，再加上老名称、新名称、雅名称、俗名称，包管你查北京旅游图也搞不清楚。譬如现在的“崇文门”，过去叫“哈德门”，过去的“哈德门”香烟还风行全国呢！沙滩后街过去名称也很多，沈二哥（从文）写信给我管它叫“马神庙”（也许最早是宫外供奉马神的地方），这是最早的名字。到我住家的时候，先叫景山东街，后叫沙滩后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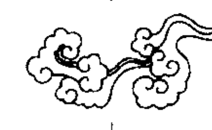
沙滩后街55号，有三座大红门，气派十足，加上一对石狮，更增加了雄伟。进了大门是宽道。有个大大的园子，园子中心有个荷花池塘，池里有金鱼。夏天更风光，池里种了两种荷花。一种是地道的中国荷花，另一种是异国荷花叫“睡莲”。中国荷花白天开，异国荷花晚上开。她们有白的、红的、粉红的、还有浅黄的，又香又好看。池中央有一个大石晷，据说是过去北京大学李四光教授设计的。绕池一圈圆路，路边有供人休息的长椅子。还有丁香树和龙爪槐。

园子有过去的课堂楼（现在是办公楼）和大礼堂，还有许多小院落。西边第二个小门，就是我家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里弄”的人共同“深挖”的防空洞，这洞挖好以后，也没有下去躲过警报，日久年深，成了耗子、蜈蚣的高级住宅区。防空洞插上几根木头，拉上几根绳子就能晒衣裳，下面种上一些花儿果儿。洗好的衣服不必扭干，让水淌下来好浇花。防空洞南边有一

棵高高的松树，四季常青。

许多许多小院落，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近百户人家。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1968)的9月里，天气还很热，气压低，每次我们里弄(我是个家庭妇女)开会，我总得经过防空洞绕荷花池到那边大礼堂开会。蜻蜓飞得很低，几乎飞到我的脸上，我对蜻蜓有好感，我没有抓蜻蜓。

我小的时候，如果碰到这样天气，会跑到我家(苏州胥门寿宁弄8号)花园里，抓上一个红肚子绿翅膀的小蜻蜓，轻轻捏住一对绿纱翅膀，我怕蜻蜓饿了，从我牙缝里剔点东西喂它，我笑蜻蜓"食人牙惠"。(其实这句成语是"拾人牙慧"因为是同音词，我把这句成语用错了。)可是小蜻蜓并不领我的情，不接受我的恩赐，它六根小细腿颤巍巍地乱动，看来它很不高兴。我想到唐诗中杜甫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句子，我为什么捉住它，不让它"款款飞"呢！我心一软，手一松，它就飞了——飞了。我心里十分快乐，这晚上会做上一个满园子里轻歌曼舞的蜜蜂、蝴蝶、蜻蜓在姹紫嫣红的百花丛里乱飞的美妙香甜的梦。



我由小蜻蜓又想到小庆庆，我们的孙女1959年降临到人间，她给一家四代人带来了欢乐，尤其是奶奶——我，除了为北京昆曲研习社做点什么外，几乎全部身心都投到小家伙的身上。这七年中(1959—1966)，她在我身边，几乎是奶奶青春焕发的时代，比和爷爷谈恋爱时还要甜，还要有滋味。人总是这样，有了第二代并不怎样在乎，有了第三代更加快乐，因为她是我们生命的继续。普天下祖父母的心，更比父母的心更慈爱、更柔和。

我曾经有个小女儿叫"小和"，不幸在六岁时生盲肠炎夭折，这都怪我没有照应好。我就在庆庆身上补过、赎罪。我们把

“庆庆”的大名叫“和庆”，纪念她的姑姑。可是庆庆如果犯了我的王法，我要管她、罚她。

夏天，满院子的孩子都在一起疯，女孩子“过家家”，男孩子打弹弓，用长竹竿粘树上的蜻蜓。小男孩会粘到很多很多的蜻蜓。为了表示对小女孩儿的亲善、友好，送了几只给小庆庆。庆庆把蜻蜓放在手绢里松松包起拎着，得意洋洋告诉奶奶：“蜻蜓，蜻蜓。”我冒火了，我叫：“快放，快放！”我夺过来手绢，抖开了手绢，让蜻蜓们飞了。庆庆很不高兴，她叫着：“奶奶，奶奶，我的蜻蜓，大哥哥送我的！”她小心里已经有了资产阶级意识，有“所有权”了！我说：“你不是怕蚊子、小咬咬你吗？蜻蜓会捉住它们这班害虫。我们做人要仁爱，爱自己也要爱人，好的动物也要爱，千万不要伤害有益的动物。也不要拿哥哥们的东西！”庆庆不做声，从此也不接受男孩子的礼物了。

后来，我从小蜻蜓开始，告诉了许多这大门子里的故事，虽然有些故事庆庆还听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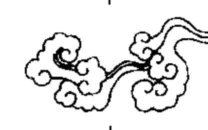
在庆庆不到两岁时候，我们就教她念唐诗，从“床前明月光”教起。她告诉小朋友说：“奶奶教我念‘糖’诗，‘糖’诗是甜的。”唐诗中除了“点水蜻蜓款款飞”，还有刘禹锡的“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的诗句。我告诉庆庆“玉搔头”就是能搔头皮痒痒的玉簪子。这大门里有公主的梳妆楼，在教室楼的东面。公主发髻上就有“玉搔头”。

第一个故事，是说二百多年前乾隆皇帝，有一位乾嘉公主，长得很漂亮，跟白雪公主一样雪白粉嫩，可惜有一只手有六个手指，所以人称“佛手公主”。公主出嫁了，就嫁在我们现在的大门里，那时叫“公主第”又叫“驸马府”。婚礼十分热闹。佛手公主满月回到皇宫向皇帝爸爸请安。皇帝爸爸问公主女儿：“我为你找的驸马很不错吧！”公主撅起了小嘴：“我可不认得驸马。虽然我们交拜成亲，到洞房他掀开我的盖头，我只在璎珞下偷偷瞧

他一眼，也没有看清楚他是长脸还是圆脸，眼睛、鼻子长相就更不清楚了！”乾隆皇帝一听，很觉奇怪。

原来并不奇怪。据说历史上公主下嫁，多半不会有亲生儿女，其中有个原故。是太监、宫娥等人巧立名目，向公主驸马多方索取金银财宝，他们的欲望达不到，你们夫妻公主驸马休想见面，更说不上驸马会到公主屋子里“同床共枕”。他们只是一对名义上的夫妻。倒不如小户人家小夫妻相亲相爱、和和气气过日子。佛手公主的话，经乾隆一查，原来是这些王八羔子干的事，把为首的太监、宫娥斩了几个。这一来，乾嘉公主才有了真正自己生的孩子。

这个故事是沙滩后街55号我们大门边住的一位老太监告诉我的，乾嘉公主的名字是俞平伯先生给我的一首诗的注解里的：“原为乾嘉公主第”。可你不必考证，故事也不必是真的。但是有个画栋雕梁的公主梳妆楼为证。



第二个故事是京师大学堂，庆庆将来长大了，也要进大学，虽然现在幼儿园。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光绪时代戊戌变法没有变成功，可是产生了中国这第一个京师大学堂。成立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公主楼前的教学楼，四面都是九开间的二层楼房，楼上楼下三面有走廊。都是水磨砖砌的。有人告诉我，是砖对砖交叉砌的，没有抹水泥，我可不相信，这楼房快有百年历史了。1976年7月28日北京大地震，这楼房门前大面积的水门汀地上，我们坐在小板凳上。水门汀一鼓一动的，像大海的波浪，这可是我一生见到的奇观。的确，这大楼纹丝儿不动。（大楼有个照片，在日本人写的《东洋文化史大系》第六卷一八六页《东亚之现势》）我离开沙滩后街时（1985），大楼还巍然不动站立在那儿。

第三个故事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名扬四海。1912年成立，当时第一任校长是严复，1917年校长是蔡元培，1946年校长是

胡适。这三位校长都是我钦佩的长辈。严复当校长的时候我才三岁。蔡元培当校长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我们在私塾里的小姐们也有影响，读过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那时我十岁。我的父亲张吉友（冀牖）生平最佩服蔡元培，蔡到苏州续弦时，跟我父亲有来往。我父亲办过幼儿园、小学、男女中学，最后在 1921 年办乐益女中，请的教员各党各派、各种奇特人物都有。父亲和我，还有父亲的三舅母都去参加蔡元培跟苏州省立医院周院长的妹妹，在苏州留园结婚的大典。我记得我的三舅奶奶很神气坐在大厅的第一排，洋鼓洋号吹吹打打的正在她的旁边。年岁已高的三舅奶奶突然发心脏病，抬到省立医院，人就过去了。为了把遗体抬到城里朱家园，还费了许多周折，这是苏州那时的大新闻。

至于胡适之校长，他早在 1928 年就是我和三妹兆和念书的中国公学的校长，我听过他的报告和《中国哲学史》，可我从来没有跟校长讲过话。三妹兆和跟沈从文结婚，四妹充和跟洋人傅汉思结婚，适之校长都曾参加。

沙滩后街 55 号大门里，大礼堂还在，并不大，也不辉煌。可是五四运动就在这地方发生，1966 年文化大革命也是我们里弄学习和交代历史问题的地方。

这些大人物和小蜻蜓好像还蛮有关系。小蜻蜓曾飞上公主的玉搔头，成为公主发髻上的妆饰品。京师大学堂的师生们不会有人注意小蜻蜓。倒是北京大学李四光教授为蜻蜓创造一个有日晷的池塘，让小蜻蜓有一个自由的天池，让蜻蜓有个“点水”运动的场所。小蜻蜓对我对我孙女都是有交情的小虫儿。

我们的家就住在防空洞的后面。东南面有碧纱窗，两边隔断了的是西斋，是过去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一排一排整齐的屋子，不属于我们人教社、文改会的范围，那时住了好多人家。我们住的屋子是原来北京大学的“注册处”。屋子有地板，南方

人住着不错，虽然那地板常常摇动，有的地方还凹下去。我不让庆庆在地板上跳。

1959 年 9 月 12 日我从骑河楼妇产医院抱回了庆庆三个月后，她爸爸周晓平去了苏联。

庆庆最早是陆春兰阿姨带，八个月后是谢玉田阿姨带，四岁时找来的阿金阿姨庆庆不要，没办法只好把小床搬到我们二老的大床头。半夜爷爷起来把尿。后来觉得太麻烦，索性赶走了爷爷，让庆庆跟奶奶睡大床，靠南窗替爷爷搭个单人床，这一睡睡到“文化大革命”庆庆七岁的时候。

晚上祖母、孙女一睡上床，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候，起码讲两个故事、做三个节目(game)才睡。有两个中西合璧的故事，庆庆最爱听，奶奶会添油加糖，讲得十分动人，就是《红帽儿》和《狼孩》的故事。

庆庆后来有个戴小红帽的娃娃，是勤勤姑姑送的。庆庆把这个真实的小红帽和故事中的“红帽儿”联系上了。奶奶在故事的最后一段加了些惊险镜头。我说：“红帽儿一进门，见到了‘外婆’蒙着头睡在床上。小红帽放下手里的篮子，里面有小红帽一路采集的花和果子，还有妈妈让她带的点心。高兴地叫着：‘外婆！外婆！您的宝贝小红帽来了。’‘外婆’露出了眼睛不做声。‘唉唷，外婆外婆，您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外婆’哑着小嗓子说：‘我睁大了眼睛好看你，我的外孙女。’红帽儿看见了那对大耳朵问：‘外婆、外婆，您的耳朵怎么长得又长又尖？’‘拉长了尖耳朵好听宝贝甜蜜的声音。’红帽走近了床前，‘外婆’突然从被窝里伸出手来。红帽儿看见那双毛茸茸的大手，向后退了一步：‘外婆、外婆，您的手又长又大，还长了许多毛呀？’‘大毛手抱我的乖乖更温暖舒服呀！’外婆用手拉下脸上的被子，露出了鼻子，红帽儿叫起来：‘大鼻子’！‘哈哈，大鼻子好闻闻宝贝身上的香香。’接着大鼻子下的尖嘴也露出来了，红帽儿才恍然大悟，



这不是她嫡嫡亲亲的好外婆，回身就跑：‘大尖嘴！’狼外婆哈哈大笑，掀了被子跳下了床，扑向红帽儿：‘大尖嘴就是要吃你！’”故事到了顶峰，小庆庆突然由床上坐了起来说：“我怕！小红帽快跑，狼外婆要吃你了！”然后祖孙二人大笑一阵。

另一个故事，并不是故事，是真的事。报上说的一个印度狼孩的事，报上报导很简单。奶奶又加了许多形容词，说这个小男孩怎样活泼可爱、大眼睛、卷头发、有非常强壮的身体。很小很小的时候被狼叼了去，当做自己的孩子养活。像意大利的开国皇帝双胞胎狼孩一样。狼妈妈丧失了自己的孩子，奶水涨痛得厉害，所以抱一个儿子来喂养，照它的方法来教养。狼孩只会用两手两脚走路，不会直立，不会用手。等到人们找到这个小男孩时，他已经七八岁了。给他吃红烧肉他不吃，要吃生的肉。让他睡在床上，他却蜷伏在床下。给他穿好的衣服他撕咬得粉碎。给他穿好鞋他踢得多高多远，奶奶坐在床上学狼孩把拖鞋也踢得多高多远，于是祖孙二人又捧腹大笑。庆庆笑够了就睡着了。

有时在床上还要玩套 game。经常玩的一是拔萝卜，两个人各自捏着拳头伸出大拇哥，你拔我的我拔你的大拇哥，交叉着拔萝卜，拔得要快，拔错了或脱空了都算输。二是“金锁银锁，喀啦啦一锁。”一人手掌伸平朝下，另一人把二拇哥顶在另一人手掌心里。当唱到“喀啦啦一锁”时，一人很快把手一抓，另一人得把二拇哥很快地缩回，没抓到就输了，抓到就赢了。第三个是“抓耗子尾巴”，我们的床单都是有条纹或格纹的，那就是各自的界限。庆庆用小二拇哥侵犯我的界，我捉到她的小二拇哥，我就赢了。如果很快进了她的界内，我就是捉到她我还是输，何况我还捉不到她的小二拇哥。我还常常被她抓到我的老二拇哥，奶奶总是输的时候多。奶奶嚷：“放手，老耗子要进洞睡觉了。”庆庆大笑。我说：“背对背，卖青菜。”庆庆乖乖地背个身，我替她塞好小被窝，自己也背过身，睡不着也装睡着了。半夜醒来，我

总翻过身摸摸庆庆的头，老是怕她发烧。从她四岁到七岁，祖母和孙女就是这样平平安安过夜的，我没有生过大病，她也没有发过高烧。

号炮一声，轰出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革命火烧天，也烧人，我怕来“破四旧”（抄家的美名），惊了小孩儿家，把庆庆送到中关村。那晚上，我脱下鞋子放好位置，摸清了床头电灯开关在哪儿。这样，红卫兵来我可以不慌不忙，拉开灯穿鞋子。爷爷还习惯睡在单人床上。睡到半夜，西窗外忽然马嘶人叫，把刚睡着的我惊醒了。我一翻身，习惯地摸一下庆庆的额头，一摸一个空，我心慌得很。我叫：“有光，来，睡到我身边来，庆庆走了，我怕。”我们老两口屏住气听着西斋的乱哄哄的动静。红卫兵走了。空气一下沉淀、凝固下去。西斋里没有人声。不，有声音，我们似乎听见低哑的哭泣声，凄惨的叹气声。又似乎见到那些老老少少抱在一起没有表情的脸。

有光进牛棚，孙女儿、小白兔都走了，孤孤单单家里只剩我一个人，过着惊魂不定的日日夜夜。可是这大门里倒是热热闹闹火红燎原的日子。1968年9月里，运动到了第二个高潮，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一天下午，在那个五四运动和胡适之讲学的大礼堂，里弄里又开会了。小板凳围了个大圆圈。里弄的副主任，是一位老红军的夫人，她背毛主席语录滚瓜烂熟。当主席都是站在圆中心，怪神气的。这天是我重点交代历史的日子。当然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可不是地主阶级成分，这里大有区别），我的“爱人”当过新华银行经理，说起来是封建主义的地主和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的“勾结”婚姻。况且咱夫妻俩又曾经绕地球转了一周，也有特务的嫌疑，岂能逃过劫数。

他们倒也很客气，叫我站在圆中心，主席站过的地方。圈子里坐的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家属和退休的职工。我交代了，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旁听的一些小孩也瞧



着我。我说:“1952年,三反五反的时候,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在运动中我有两万多字的书面交代,当时交代了四个小时。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在我们同一个大门里。请你们向他们人事部门调出我的交代,请组织上审查。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听我啰哩啰唆地讲话。”我的话最多四分钟,讲完了我就回到圆圈的小板凳上。

群众一时摸不着边,也许很失望,没有听到精彩的表演,他们知道我能唱昆曲的。主席又站到圆中心,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子,突然跑到圆中心站住。也用手里拿着的武器,一根粘蜻蜓的长竹竿向我脸上画圆圈,我用手一拔,长竹竿梢上的小竹片掉下来了。他冲着我说:“你,敢吗!”我一看,他就是送过庆庆几个蜻蜓的小男孩。

我好笑又好气,我变成大蜻蜓了,变了个粘不住的“大蜻蜓”了!

现在沙滩后街55号的三座大红门没有了,改了大铁栅门。一对大石狮被“老吊”搬上了大卡车,送到陶然亭公园。据说,石狮子在那儿集中学习。荷花塘早已夷为平地,建造了办公大楼,小蜻蜓也遭殃,没有自由点水的地方。可是我这个爱绿色的“大蜻蜓”快到八十岁了,还活在人世间。

(1988年6月24日初稿
1988年9月6日二次稿)

扑 满

我的好奶奶，她有一个女儿叫二丫头，是我的妈妈，她们都是安徽合肥撮镇人。我妈妈十岁就到张家当童养媳。她到婆家的时候，脑后一条大辫子上有两根红头绳，长的扎在辫子上面，短的扎在辫梢上。一件花洋布小褂儿，一条毛蓝布裤子，光着脚穿着绣蝴蝶的青布鞋。我的好奶奶送二丫头的嫁妆，是一个黄泥烧的"扑满"，上面只有不到一寸的小裂口，最底下放了十个铜钱。好奶奶对二丫头说："嫁到婆家扑扑满，到满得放不下的时候，再打碎它！"



我小名儿叫"红红"，我是好奶奶的外孙女，我总是跟好奶奶睡。我四岁的那年，好奶奶让我妈把这个传家宝"扑满"传给了我。

好奶奶说："小红红这扑满还差一点才能装满，等到装满的时候再打碎它。里面有铜钱、铜板，还有小银角子、大银角子，一层一层地加高，步步高升嘛！不要摇动它，怕把扑满碰碎，也打乱了各种钱堆聚的次序。有一天，会有金角子出来，你再放，放满了打碎它。"

有的小朋友也有"扑满"，是假铜皮做的。上面也有口子，可是下面有底，一抽底钱就出来了，全是"钢镚儿"。我等了好久，也没有"金角子"。

好奶奶告诉我，她放的铜钱、铜板、银角子，都是一个一个选的。每个钱都用肥皂、牙刷洗过、刷过，弄不干净还用绣花针

挑出污迹，再用围裙擦得亮晶晶，才放进去。

我每次捧到扑满的时候，真想打碎它，看那些亮得耀眼的钱。每次我朝小洞里张望，里面都是黑黝黝的，不敢摇动、也不敢把它翻过来，怕乱了套。有时候真想用夹子把钱夹出来，可是怕好奶奶、妈妈和扑满生我的气；有时候又想抓一把钢镚儿塞进去，满了，好打碎它。没有金角子放进去，怎么能打碎它。不好，不听好奶奶的话，不是好孩子。

我六岁那年，好奶奶死了，我是一直跟着好奶奶睡的，我哭得叫大人心酸。从此以后，我把扑满放在抽屉的最里面，再也不捧它了。

八岁了，我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小朋友的铜扑满倒出一分、两分、五分的时候，我不屑一顾。我人虽小，有志气，再不谈我那"泥扑满"了。

我进的学校，也就是我爸爸工作的学校。我爸爸念书不多，在学校当一名校工。校长姓张，我家也姓张。我家穷，我妈二丫头当保姆。我的学费蒙校长允许可以不交。我爸爸经常叨咕校长好，肯帮助穷人。

不知为什么，1966年，"文化大革命"，校长有了罪，抄了他的家，没有抄出值钱的东西和罪证。我爸爸没有骂校长、斗校长。他们说，校长的金银财宝都藏在我家。半夜11点，来了十几个大伙子、小伙子抄我们穷人的家。他们翻箱倒笼、爬柜顶，到处翻腾。妈妈搂着我，我在床上发呆。他们翻腾我做功课用的惟一有抽屉的桌子，三个抽屉，一个一个地被抽出来，翻个身倒在地上。我憋住气，那泥扑满该碎了！有一个大个儿用脚踢抽屉里出来的东西，碰到了我那个扑满。他低下头、双手抱起了扑满，哈哈大笑，笑得怕死人！他叫："找到了，这里面有东西！"我几乎要叫，我的心几乎快蹦出来了。妈妈抱着我的头，我不眨眼地瞅着那大个儿。哗啦一声，震天动地。我忽地跳下床，想冲向前

去。妈妈抓住了我。

在我的作业本子和黄泥碎片里，扑满里的宝贝出现了。他们看见了钱，拨拉拨拉，你拣一个，他拣一个，眉开眼笑地走了。

我直奔过去，只拣到五个铜钱和两个小银角子。黄泥罐子碎成片片了，只有一块厚沉沉的扑满底朝了天。我小心翻开底：有！金钱，大红丝线上有十个一串小铜钱，是外圆内方的小铜钱！

我哭了，扑向妈妈怀里："妈妈，好奶奶……"

（1997年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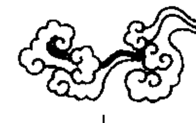




忆恩师

老师教我放眼世界





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五四运动(1919)时候,我才十岁。我姐妹三人(张元和、允和、兆和)是在家塾里念书的。还有一个四妹,抱给本家,不同我们三人在一起。我们有三位家庭老师,教不同的课程,基本上都用文言文,只偶尔用一些白话文。我们没有上过小学,后来直接上了初中。

1921年,父亲张冀牖(吉友)创办苏州乐益女中。1923年,我姐妹三人进乐益念初中。课程在当时算是现代化和多样化了,可是国文课多半还是念古文。

1924年,先后来了几位新教员,都是新任教务主任侯绍裘先生介绍来的。其中有叶天底先生教图画,画素描写生。有侯绍伦先生(绍裘先生的弟弟)教英文,选的课本是《莎氏乐府本事》。还有张闻天先生教国文。他的教材与众不同,国文课上教的不是中国古代文言文,也不是近代白话文,而是世界名著的白话翻译本。有三篇文章我在七十年后的今天还记得很清楚。它们是:《齿痛》、《鼻子》和《最后一课》。

《齿痛》是法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忘了作者的姓名。文章叙述一个人站在楼上窗口,向楼下沸腾的人群瞭望,这时候正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刻。文章用大量的笔墨描写楼上的人牙齿疼痛的情况。楼下的悲壮场面,使得他心烦意乱,因而牙齿更痛了,痛得无法忍受。当时我不懂这篇文章的意思。张闻天老师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夸大自己的小痛苦,而不关心人民大众的大

痛苦。”又说：“我们要关心人类，要救受难的人类，要做世界上真正的人，不要老在自己的小痛苦上浪费精力。”

《鼻子》是日本芥川龙之介写的短篇小说。内中说，有一个和尚，生了一个奇大的鼻子，大家都拿他取笑。和尚心里很不受用，想方设法到处找寻神方，一定要把这个大鼻子治成和平常人的鼻子一模一样。他用了许多可笑而奇怪的办法，甚至让人用脚踩他的鼻子。他受了不知多少痛苦。后来，居然找到一种办法，把他的鼻子改造得和平常人一样。他想，这下可好了。人们再也不会笑我的鼻子了。想不到，和尚一走出去，群众哗然！大家说：“瞧这和尚的鼻子怎么变了？”又说：“瞧，这和尚哪来这个奇怪的鼻子？”更多的人指指戳戳、比比划划。和尚更苦恼了！要想恢复原来的大鼻子已是不可能了。课堂上同学们哄堂大笑！文章的深奥真意，我们当时是不会懂得的。

法国文学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写的是 1870 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法国，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小学校上最后一课法文，一个小学生懊悔过去没有认真学习祖国的法文。这是大家知道的爱国主义好文章。当时给我们女孩子很大的震动，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

由此，在 1925 年“五卅惨案”之后的爱国运动中，乐益女中的同学跑遍苏州的八个城门去募捐。特别是火车站，我们的竹筒总是满载而归。统计苏州各界的募捐，乐益女中占第一位。后来苏州公园和公共体育场之间的“五卅路”就是用这笔捐款开辟建成的。

乐益女中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多少次到乐益来找麻烦。那时，我的爸爸是校主，我的继母韦均一是校长。当局提出，这帮“反动”的教员一定要辞退。我爸爸多少次恳求把这些人留下，都无结果。最后当局下哀的美敦书（编者注：

少女时代的张允和





Ultimatum,最后通牒。):“一定要辞退,否则就不客气了,封闭乐益女中,逮捕他们!”我爸爸既要维持苦心创办的乐益女中,又要保护老师们免于坐牢。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忍痛辞退了这几位可敬的老师,请他们避避风头。有困难的老师,给了额外的费用。乐益女中也因此停办了高中部。我们三姐妹于是转学到南京读高中。

张闻天老师不久到苏联去了。侯绍裘、叶天底二位老师在1926年后,先后遇害。

我爸爸最佩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乐益女中的创办是得到蔡先生指点的。爸爸聘请的教员中,各党各派的人都有,这就是蔡先生的主张。老师给学生的不但是崭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张闻天老师,他把我们引入一个广阔的

世界。

在张闻天老师的教导下，我对文学的兴趣，从中国文学转向世界文学。我开始读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对他站在十字路口观察行人的举动，感到兴趣，认为文学描写就应当有这样的真实性。后来看短篇小说觉得不过瘾，又啃长篇小说。我读俄国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

1956年后，我参加俞平伯先生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我用比较戏剧的眼光研究昆曲。例如把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和中国李玉的《占花魁》对比；把英国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和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对比。这都是受了张闻天老师的影响。

张闻天老师只教了我半年国文，可是给了我以后一辈子做人的长远影响。这是真正的思想教育。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的谆谆叮嘱：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做事要做对世界有益的事，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

六十多年了，张闻天老师说的这些话，仍旧天天在我的耳鼓里响着。

（1991年11月20日）

落花时节

六十四年前，我二十岁，在上海吴淞江边的中国公学念大学一年级。校长胡适请来一位扬州的老先生做我们的国文老师。有一次，他出的作文题目是《落花时节》。等到发回卷子的时候，惟独没有我的卷子。我想，我的作文可能出了毛病，也许遗失了。在课堂上，我不敢问老师。下课铃一响，我一个箭步上前："老师，我的卷子呢，怎么没有？"老师对我摇摇头："莫慌！莫慌！跟我来！"我不知道老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邀了一位女同学一同到老师的屋子里去。老师不慌不忙地从长袍口袋里掏出一把古老的钥匙，打开了他那古老的皮箱，小心翼翼地拿出我的卷子，说："我怕男同学抢你的卷子，所以锁在箱子里"。那时候，男同学很淘气，常常开玩笑抢女同学的卷子。我急忙先看后面的批语："能作豪语，殊不多觏。"再看卷子中间，有密密麻麻的红圈儿。这才放下了心，拿着卷子回身就跑。老师叫我回来："莫慌！莫慌！不要跑！"我停了步子。老师对我说："你的作文跟别人很不一样，有女中丈夫的气概，女孩子要都能像你这样，男女就能真正平等了。"



那是怎样一篇作文呢？我把落花时节的秋天写得很美，胜似姹紫嫣红的春天。秋天，遍地金黄色的庄稼，农民们欢天喜地，庆祝丰收。果实累累，生活富裕。秋高气爽，精神焕发。这样的美好季节，不值得欢欣吗？为什么文人学士要呻吟"秋雨秋风愁煞人"？为什么闺中士女要悲叹"凄凄冷冷、闷怀无绪"呢？秋



光华大学时的张允和

天是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努力学习的最好时光。

我是一个瘦小的人,真是有点弱不禁风。我生于宣统元年,生下来没有气,不会哭,经过千方百计的抢救才开始呼吸,哭出声音来。十二岁前,我不仅身体十分虚弱,意志也非常脆弱。我爱哭,遇到一丁点儿不顺心的小事就哭。人家骂我:“看你瘦得像条韭菜”,我听了就哭。人家讥讽我:“你苗条得像林黛玉”,我听了又哭。十二岁时,母亲去世,撇下了九个儿女,这给我极大的震动。我的大姐不在家住。我这个“二姐”成了一群小弟小妹的头头,感到责任重大。有一次,人家劝我:“哭,哭有什么用?”这句话提醒了我:哭真的是没有用处的。我要坚强起来,担负起做“二姐”的责任!从此,人家骂我,笑我,我沉住气,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下,眨一眨眼:不哭!我立志要彻底改变我的脆弱性格。由于经过这样一次性格的自我改变,我才能用积极的笔墨写出歌颂“落花时节”的文章。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在女孩子上大学还十分稀罕的年代,对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来说,是脱胎换骨的性格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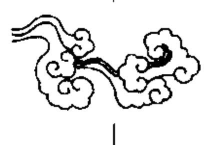
1936—1937年间,我为两张报纸编辑妇女专栏。一张是《中央日报》的“妇女与家庭”栏,另一张是《苏州明报》的“苏州妇女”栏。那时候妇女解放的思想在中国开始萌芽。我在“妇女与家庭”栏中写过一篇文章:《女人不是花》。我反对人家说机关里的女职员、学校里的女教师都是瓶中花朵。我还写了其他一些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是在当时我可尽了鼓吹女权思想的绵薄力量。

我是不是对花完全不爱好呢?不是的。我也爱好花。没有春天的花,哪有秋天的果实。但是,我爱春花,更爱秋实。我反对“黛玉葬花”、“宋玉悲秋”。那样哭哭啼啼、苦苦恼恼过日子,不是新时代青年的正常生活,更不是健康女性的形象。那时,我家后院瓦杂堆上长出了一株无花果,它不占好的土地,不需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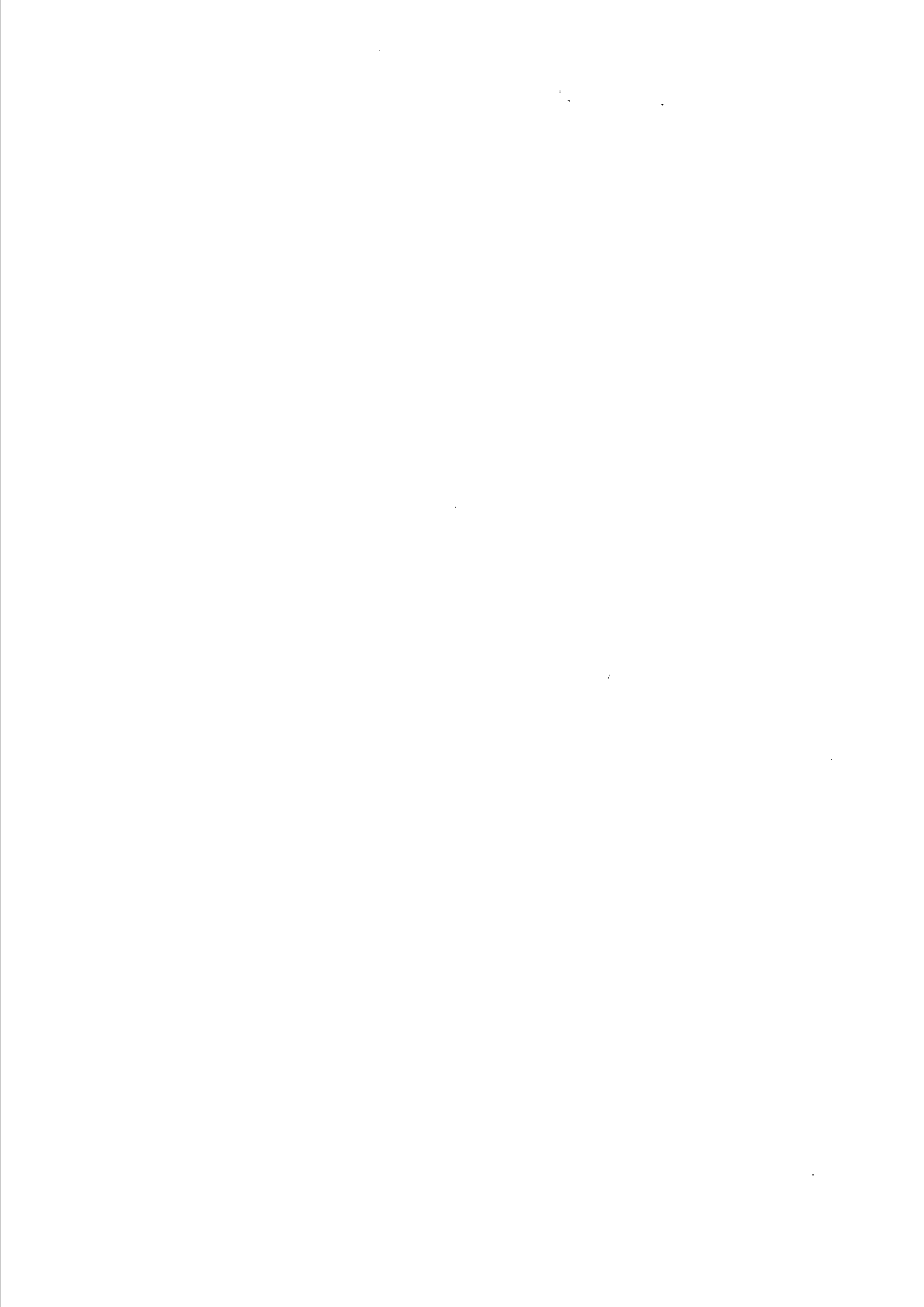
精心栽培，自然枝叶繁茂。它实际不是没有花，只不过她美丽的花隐藏在果子里面，不在人们面前花枝招展罢了。我爱无花果的性格。

（1993年）



爱昆曲

爸爸张冀牖说：看了《红楼梦》才知道什么是昆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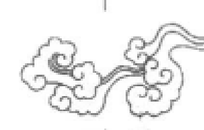
七十年看戏记

如果说做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那么我已经做了七十年的傻子了。

辛亥革命那年（1911），我由故乡合肥跟父母到上海，我仅仅是二十二个月的怀抱中的幼儿。我母亲陆英是个戏迷，她生长在“二分明月、三月烟花”的扬州。童年乘凉的时候，她为孩子们低低地唱过《林黛玉悲秋》、《杨八姐游春》的歌词。她到上海后在戏院里包了包厢，每季算账。她是一家之主，当然不能天天晚上去看戏，她认为是好戏才去看。常常就让保姆带孩子们去



张允和饰演《牡丹亭》中的石道姑





张允和饰演《牡丹亭·游园》中的春香

看。大姐元和住在祖母后房，去的不多；跟着保姆看戏最多的就是我——二姐允和，三妹兆和有时也去。我是这样坐在或是跪在保姆腿上看了六七年的戏，主要是京戏。1918年我不到八岁就搬家到苏州了。

起初看戏时，保姆专心看戏，我则专心睡在她怀里，不管锣鼓打“急急风”，我也睡得安静香甜，什么好戏我都莫名其妙。在锣鼓喧天中睡觉，使我练就了一种本事，能在人声鼎沸中安然入睡。

到四五岁时，在保姆的训练下，我能够不睡觉看戏了。这可给她们带来许多麻烦，我打破沙锅问到底，提出了许多可笑的问题：譬如说台上的老头儿胡子怎么长得那样长，除了黑、白、灰胡子外，还有红胡子。当任何一个角色出场时，他还没走到九龙口，我就问：“是好人还是坏人?”保姆回答的是，生旦多是好人，小丑和花脸多半是坏人。戏完时她们的预言往往不符合事实，我就和她们斗嘴了。

我最不喜欢看武打戏，打得满台灰土。我们的包厢离台又近；武士们在台上连翻十七八个跟头，也使我心烦，现在想想很对不起这些武功结实的演员。这也许是小女孩对打架没有兴趣的缘故。

我喜欢小生、小旦，扭扭捏捏、哭哭笑笑的表演，对剧情并不十分了解。可是“后花园私订终身，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戏，深刻印在我的小小的脑子中，和我长大了选择丈夫要一个知识分子有关。

我很喜欢小丑的戏。那鼻子上一块白豆腐，勾上几笔又像字又像画的黑线条，很逗人喜爱。在加上一副滴溜溜的黑眼睛在白豆腐上更有味。对于小丑说白介绍他自己和别人，我听得懂，因此也渐渐了解整出戏的故事。尤其对演跟我差不多大小的琴童、书童感兴趣，因为他们都是孩子，都是淘气的孩子。我





张允和饰演《断桥》中的小青

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后，曾自告奋勇演过几次《寄柬》中的琴童、《守岁》中的书童、《出猎》中的咬脐郎小军和《后亲》中的丑丫头。这与童年的爱好是有渊源的。

老生的戏那时注重唱，可我不懂词儿。名角上台时，台下掌声雷动，我也跟着拍手。但是我却很佩服麒麟童，他的《徐策跑城》中"……我的耳又聋眼又花，耳聋眼花、眼花耳聋观不清城下儿郎那一个……"和《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我和你一见如故三生有幸"……我都摇头摆尾会唱几句。

我最喜欢大花脸的气派。那么奇特的勾脸、洪钟般的唱腔，都使孩子振奋。我最熟悉猛张飞和美髯公关羽，他们一出场我就认识他们。张飞的天真、妩媚，莽撞、粗野都使人好笑而又爱煞人。大花脸中最使人钦佩的是关公，我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关公对于刘备和刘备一家，甚至于对他的敌人曹操都那么义气，都叫人钦佩。他的丹凤眼、卧蚕眉、大红脸，那一副威严、庄重，正义凛然的样子，实在令人肃然起敬。记得有那么一个晚上看戏，一进戏院就闻见清甜的松香味。一进包厢，后台更浓馥的香烟缭绕到前台来。原来那天演的《麦城升天》。关公死了，成了神。的确，舞台上的关公，是我心目中的活偶像，引起我小时看《三国演义》的兴趣。戏剧常常是小孩子们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

烧香拜神固然是一种迷信，可是它让观众没有入座时就已经"入戏"了。现代的戏大可借鉴这种渲染气氛，使观众和演员拉近距离，息息相通。



稍稍大一些看懂了几出戏，我们三姊妹就在家演戏了，《三娘教子》、《探亲相骂》、《小上坟》、《小放牛》是我们经常演的戏，我们的戏是没有观众的。大姐、三妹有戏剧天才，演戏是主角，我则永远当配角。《三娘教子》中，大姐是三娘，三妹是老薛保，我是小东人，跪在地上顶了家法（家法往往是一枝筷子），说："娘啊，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娘啊！望母亲一下也不要打了。"我还是挺有感情地说这句白。《探亲相骂》中大姐是城里亲家母，三妹是乡下亲家母，我又当儿子又当媳妇。"亲家母来您请坐，细听我来说"，我仍历历在耳。《小上坟》中大姐是白素贞，三妹是刘禄金，我则是鸣锣开道人。我大声嚷着："开道呀！"三出戏我都配合得极好，我也很得意，虽然我不是主角。

我认为配角很重要，现在不是有配角奖吗？我的童年如有

配角奖，我可以受之无愧。以后，我在学校里，曲社里都爱当配角、凑热闹。

祖母对于母亲看戏并不反对，可是做媳妇的总不能说我天天要看戏。看戏前母亲总不忘记到祖母前请晚安。我大弟宗和是长孙他比我小五岁，晚上总在祖母面前请安玩耍。每次问我大弟："你妈在家吗？"大弟总是认真地说："在家，洗脚。"有一晚母亲奉祖母之命出门有事去。可是问大弟时，大弟仍然说："在家，洗脚！"祖母大笑。所以母亲看戏，对祖母来说是公开的秘密。

我母亲三十六岁就去世了，丢下九个儿女，只留下人家给保存的戏装照片，后来又在大姐处找到这张照片，我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时不见了。是我母亲给我种下看戏的种子。我今年七十五岁，从五岁算起，看戏看了整整七十年。



（1985年）

二次亮相

江苏省昆剧院来京演出，我因病只看了二三次。胡锦芳就是两折戏是二次亮相，一折是《玉簪记》的《琴挑》，第二折是《艳云亭》的《痴诉·点香》。

亮相可以说是身段中的静止塑像，但偶尔也有动的亮相。亮相是中国戏曲的特殊形式。有多种多样的亮相。基本上在主要演员走上场到九龙口来一次亮相，表示这是一个角色；到下场也要亮相，演出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小亮相。但是在出场时，二次亮相比较少见。



江苏省昆剧院的《琴挑》，陈妙常（胡锦芳饰）一出场，由下场角上场；潘必正（王亨恺饰），由上场角上场。不是传统方式亮相。而以动的背影，作为第一次亮相，使人有一种急欲观看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在两个背影到台中央时，才是真的第二次亮相，是二人相见时的正面亮相。很漂亮，胡锦芳的亮相很有特色。两个情人一转身，一对面，同时向观众亮相，脉脉含情，情意绵绵。王亨恺配合得恰到好处。这种亮相是有形式，但是又不拘形式。

说起王亨恺，原是我们北京昆曲研习社的青年社员。他在曲社曾经跟陈颖演过《梳妆·掷戟》，后来王到了江苏昆剧院。他们建院时，我看过王亨恺和俞振飞、张继青的《贩马记》，王的保童，气度不凡。去年（1982）两省一市昆剧会演时，只看到他的一折《偷诗》，不见有什么特点。今年（1983）全本《玉簪记》中的

潘必正，很出色，想不到有很大的进步，演出丝丝入扣，层次分明。尤其是最后一场，救出陈妙常的张孝祥故穿红帔，表示风流人物。潘必正疑心陈妙常做了张的姨太太，心里很愤慨。在见到陈妙常时，由愤慨变成妒嫉：认为陈妙常变了心；陈妙常疑心潘必正变了心，只有张孝祥心里有数。我认为这是旧戏新做，结尾是有风趣的。可是因时间的限制，把我们听惯了的“长清短清”主曲《朝元歌》删去，对曲友来说有点扫兴。这首《朝元歌》是很典雅的曲子。

至于《痴诉·点香》，胡锦芳的亮相很别致。这是清朝朱佐臣所作《艳云亭》中的两折。写肖惜芬以一弱女子避难装疯，沿途求乞，到一个算命瞎子的庙里，打听她未婚夫的消息，胡锦芳演假疯女，姚继荪演真瞎子诸葛暗。这两个角色出场亮相，不同于其他亮相。本来“亮相”中的“亮”字，主要是眼睛，瞎子就不能亮眼睛，他出场前在台里一声叫：“××，课桌摆好没有？”下场角内有人应：“摆好了”。诸葛暗左手抱着课箱，右手拿着一根竹竿出场。他的眼睛不但看不见台上的东西，也不能像看见台下的观众。眼珠儿呆呆地不动。一步一步稳稳地向前移动。这种亮相很特别，你说他没有亮相吧，他亮了相。台下人知道他是瞎子，说话的调子很低沉。他的手脚没有舞蹈的身段。

胡锦芳的肖惜芬上场第一次亮相是动的。她是一个装疯的小姑娘，双手高举和台内戏弄她的孩子们告别，一面招手一面说：“你们再来耍呀！”她眼看孩子们走远了。胡锦芳动的亮相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应做得更足一些。我记得我第一次（七七事变前）看我四妹充和演《痴诉·点香》的时候，四妹的二次亮相演得很足，她望着孩子们走远了，嘴里还在叫：“来呀！来呀！再来耍呀！”孩子们走远了，她收回了眼光，放下高举的双手，看交叉的双袖，看到她的衣衫又破又龌龊，摇头，有一个无可奈何装疯的亮相，同时也是装疯装得精疲力倦的亮相，然后

双袖低垂，人几乎摇摇欲坠，这二次亮相是充满悲哀凄恻的眼神。这样一来，观众才知道，她是假疯。

这次，胡锦芳和姚继荪，一个真瞎，一个假疯，演来十分紧凑、精彩。昆曲青年演员后来居上，昆曲是有前途的。

说来《痴诉·点香》有一个前奏曲。1934年四妹充和在青岛，由沈传芷为她拍《痴诉·点香》的曲子。当她向传芷老师讨教身段时。传芷说："我没有这折戏的身段，我老娘家(父亲)也许有。这时候沈传芷的父亲沈月泉还在苏州。传芷回苏州，果然把这折戏的身段，向父亲学来了。再教给四妹。后来沈传芷又传教了江苏昆剧院。

我很爱这折戏，这是一套南北曲合套的曲子。通常南北合套是女角唱南曲，男角唱北曲。《痴诉》这折戏是女角唱北曲，男角倒是唱南曲。女疯子唱北曲，表示高亢凄恻；真瞎子唱南曲，表示安静平稳。



由这两出戏的二次亮相，我想到《风筝误》中《惊丑》的二次亮相。

我看过多少次的《惊丑》，有华传浩、朱世藕等人的。我自己也和袁敏宣排过这折戏，我演丑小姐，我的初排老师是沈盘生，二排是华传浩，三排是徐凌云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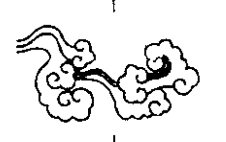
剧目叫《惊丑》，丑小姐有丑的一面，也有不丑的一面。她毕竟是大家闺秀。虽不会做诗。但是念过《千家诗》，她的诗是《千家诗》第一句"云淡风清近午天"。她的扮相有两种，一种是奇丑，不下于《照镜》(《望湖亭》)中的颜大麻子。我想不合乎剧中人的身份；另一种一半是俊扮，一半是丑扮。华传浩的扮相是不吊眉，一半脸美，一半脸丑，我认为华的扮相最好。照例丑小姐詹爱娟以一张大红手帕遮面出场，到九龙口，第一次亮相，是半面美的很庄重，和一般旦角没有什么两样。给观众一看，丑小姐并不丑；再次用红手巾遮了脸，走到台中，放下手巾，亮的是抹

黑的一面，也并不十分丑。可是小嘴那么一撅，来一个 die 脸，表示这位千金有点十三点。

我有个女朋友胡子婴(章乃器夫人)，现已去世。她说："詹爱娟勇敢主动追求男子不错，不过她不好的是冒名顶替。貌既不扬，肚子里也无货。"她不知道那位戚公子也是冒名顶替的。这出戏京戏叫做《凤还巢》。

二次亮相在昆剧中不多见。但是其他剧目也有。尤其是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可以见到譬如川剧中的《乔老爷上轿》，男扮女装，假新娘戴了盖头，在走路时，亮出男子的靴底，不是亮脸而是亮脚。我认为都是二次亮相，二次亮相表示剧中人两种不同性格。

我喜欢看二次亮相的戏。它表现的是复杂的人生。



(1983 年初稿　1998 年修改)

昆曲——江南的枫叶

北京是 “天淡云闲” 的秋天，到处开遍了菊花。典型的江南城市——苏州也正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时候了。从南方寄来的信里，附了一份昆曲观摩的节目单。使我不只是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更怀念着昆剧的群英会。昆剧，这个承继着优良传统的剧种，像严霜后的枫叶一样灿烂夺目。

观摩的剧目，大约有三十多出，这次演出集合了多方面的演员和曲友。传字辈和昆曲演员训练班的年轻学员们，以及一些业余爱好昆曲的曲友们都参加了演出。



老艺人们，像周传瑛、朱传茗、张传芳、华传浩等人的演唱艺术是有口皆碑，人人都知道的，而且一时也谈不尽。我现在仅仅就我所知道的一二曲友的情况谈一谈。曲友们曾有一句话，叫做“俞家唱，徐家做”。俞家是已经去世的俞粟庐先生和这次参加演出的俞振飞先生父子，徐家是徐凌云、徐子权父子，他们都参加了这次演出。

俞粟庐先生讲究声调、音韵、吐字、行腔。他晚年得子，当振飞先生在摇篮中啼哭的时候，老先生一面手里拍着孩子，一面口里哼着曲子。“趁江乡落霞孤鹜”是经常作为催眠歌的。这是汤显祖写的《邯郸梦 · 三醉》中红绣鞋曲牌中的第一句。振飞先生从小得到父亲的熏陶，又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后来自己又下了很大的苦功。去年上海两次演出时，我在后台见到他，他还是手不释卷，时常在揣摩剧情和研究唱腔。他原来是曲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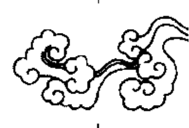
到三十岁左右成为正式演员。一位演员单靠环境和天才是不够的,必须加上不懈的努力,他有今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徐凌云老先生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是这次观摩演出中值得注意的人。他一共演了六出戏,扮了六个不同的角色,几乎把生、旦、净、丑都演到了。如《连环记·小宴》里的王允是老生;又《连环记》里吕布是“雉尾生”;《绣襦记》里“卖兴当巾”的郑元和是“鞋皮生”(不穿靴子而穿鞋子的小生,又叫穷生);《风筝误·惊丑》的丑小姐,这角色是丑,又是旦角;到《水浒记》里,“借茶”的张文远又是副净了。我还记得他的第七种角色呢!二十年前他在“卖兴”当中演的是书童来兴,虽然那时他是五十多岁的人,而且没有了牙齿。郑元和穷得无法要卖来兴的时候,来兴急得就地打滚放赖不肯走,那种小孩子撒泼的情景,到今天还在我的眼前。这次的戏我虽然没有看到,可是想来徐老先生老当益壮,艺术无止境,他的演技可能更进了一步。

徐老先生说,想不到他已经七十多岁,还穿了十七岁时的靴子上台演戏。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能参加这次演出是十分高兴的。这双靴子保存了五十多年,又足见他对于昆曲的爱好和忠于艺术的精神。

昆剧又要在上海举行更盛大的会演了。有各方面更多的艺人和曲友们参加。听说有八十多个剧目。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昆曲像江南枫叶般绚丽多彩的景色,一定会展现在北京和其他各地更多人的面前。

(1956年10月)



悼笛师李荣圻

当全国争谈昆剧《十五贯》的时候,《十五贯》的乐曲处理者之一李荣圻同志,在6月28日因肺炎不治在苏州去世了。

记得是北京5月的一个清晨,我在天桥剧场门口碰到了久别的李荣圻同志。一见面,我觉得很奇怪:他虽然有着不修边幅的老艺人的风度,但何至于在那样晴和的5月天气里,还穿着一身很臃肿的棉衣裤。我和他握手问好的时候,感觉他的手是冰凉的。我不禁问:"您怎么啦,身体不好?"他满不在意地笑笑说:"算是病了吧,咳得厉害,团里让我休息。《十五贯》上演,我都没有吹笛子。"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大概是赶什么任务去。当时我想,老先生准是太高兴了,多喝了酒,不免得了伤风咳嗽的小毛病。没想到不到两个月,噩耗传来,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笛声了。

昆剧《十五贯》的改编,音乐方面,主要得力于李荣圻同志创造性的处理。例如,况钟勘查尤葫芦家那一幕,唱白不多,音乐却把严肃、惨淡而又沉闷的气氛表达了出来。《判斩》一幕是全剧的转折点,戏演到这儿,始则悲愤紧张,使观众为受冤者捏着一把汗;继而况钟决心营救这两个无辜者,以果敢沉着的精神,战胜了一切困难,又使人深深透出了一口气。这两种不同的气氛,都在音乐里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

在江南,凡是爱好昆曲的朋友,没有一个不知道李荣圻的笛子的。他吹笛子吹了四十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

境界。一支简单的笛子，到他口边一吹，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气氛，一一表现了出来。吹到《游园惊梦》就是缠绵婀娜；吹到《惊变埋玉》就是哀怨凄恻；吹到《夜奔》、《山门》就是激昂慷慨。有一次，听到他吹《长生殿·闻铃》的一段，唱词第一句“淅淅沥沥”的雨声、风声、夹着铃声，一时满座寂然。

昆剧以笛子为主要乐器。笛师差不多从开锣吹到散场，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去年昆苏剧团在上海演出时候，我在幕间休息的当儿去看他。他仍然坐在奏乐的位子上，正在为一位青年演员拍曲子。据我所知，昆苏剧团青年演员的曲子，大半是他教授的。

和昆苏剧团的其他同志一样，笛师李荣圻在旧社会里很贫困，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他曾经慨叹地说：“过去服侍大人先生们唱曲子，要你吹的时候赏你一个座位。不吹时候就‘撤座’，真过的是抬不起头来的日子。”

现在昆苏剧团已经走尽了“崎岖小路”，开始踏上“康庄大道”了。而李荣圻却永远离开了他的同道者和观众们，这叫人怎能不深深怀念和哀悼这位杰出的老艺人呢！

（1956年8月）

江湖上的奇妙船队

忆昆曲“全福班”

夜行船序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同一年中先后死去。为了国丧，全国的大城市停止了各种戏剧和其他文娱活动。苏州城里，“文全福班”（又叫“坐城班”）也无法演出昆曲。这样一来，整个戏班断了生活来源，不得已和“鸿福班”（又叫“江湖班”）合作，大家走江湖去。虽然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演员的阵容扩大了，文戏和武戏的剧目更为丰富多彩了。

全福班在一个码头演完了戏，连夜上船开到另一个码头。船是他们的流动旅馆和饭店，船也是那些笨重的道具和服装的运输工具。

初步统计，他们到过六十六个码头，这些码头是在江苏、浙江的太湖平原上，也就是长江三角洲。这些地方，土地肥沃，丘陵起伏；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是景色秀丽的江南的鱼米之乡。

全福班走的两条水路，都是以“东方的威尼斯”苏州为起点：一条是到太湖东面的苏松太（苏州—松江—太仓）线，以苏州河为主要航路；另一条是到太湖南面的杭嘉湖（杭州—嘉兴、嘉善—湖州）线，以大运河为主要航路。前者属于江苏省，后者属于浙江省。



昆曲走这两条水路，由来已久，并不是由全福班开始的，四百年前就这样走了。据王伯良的《曲律》说："昆曲派以太仓魏良辅为祖，今自苏州而太仓、松江以及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所谓昆山腔就是由太仓起家，经昆山这条水路到苏州落户的。再由苏州回到太仓、昆山，可以说是回娘家。后来又发展第二条水路到浙江杭嘉湖一带。

这两条水路几乎绕了太湖大半个圈子，像戏剧上大花脸展开的大折扇：一、东北到近长江的吴市。二、东到近上海的泗泾。三、东南到浙江的海盐。四、南到世界闻名的西子湖边的杭州。五、西南到上柏（浙江）。六、西到以丝绸出名的湖州和长兴。七、北到"石塘湾"（江苏）。

全福班走码头有两句口诀：一是"菜花黄、唱戏像霸王"，二是"七死八活、金九银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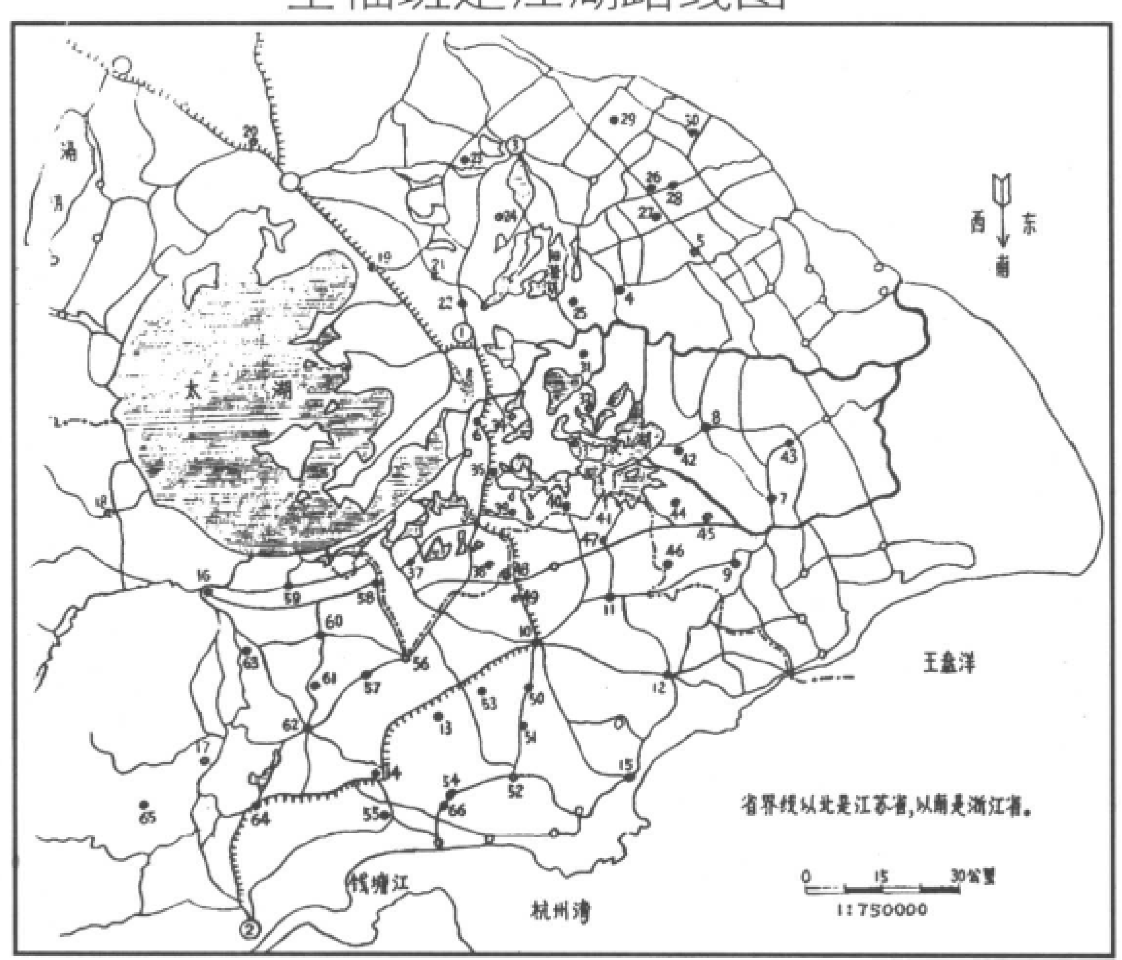
什么叫"菜花黄、唱戏像霸王"呢？前一年的除夕，吃过年夜饭，就上船出发。第二天——也就是新年的大年初一，在最近的第一个码头演出，为农村的新春敲起了欢乐的锣鼓。从新年一直唱到田地里盛开了油菜花。他们说，菜花黄的时候，小麦还没有收割，又没有到插秧的时候，唱到这时候是高潮，越唱越来劲，大有楚霸王的雄伟气概。

什么叫"七死八活、金九银十"呢？下半年七月里，农事正忙得不可开交，下乡唱戏是"死"路一条。八月里过了中秋，桂子飘香，江南农事已毕，下乡唱戏就有了"活"路了。九月、十月庆祝丰收，酬神谢佛，这时候唱戏准能赚钱，"金九"月，"银十"月，是生意兴隆的两个月。

十一月他们回到苏州城里演出。不管在什么地方演戏，最后一定要在苏州镇抚司前的老郎庙，赶上十一月十一日的老郎生日演几台戏。腊月底照例唱过"反串戏"就封箱了。

秋去春来，岁月如流。全福班的艺人们，一年中总要度过浪

全福班走江湖路线图



1. 苏州
2. 杭州
3. 常熟
4. 昆山
5. 太仓
6. 吴江
7. 松江
8. 青浦
9. 金山(洙泾)
10. 嘉兴
11. 嘉善
12. 平湖
13. 桐乡
14. 崇德(崇福)
15. 海盐(武原)
16. 吴兴(湖州)
17. 德清
18. 长兴
19. 望亭
20. 石塘湾
21. 黄埭
22. 五濮泾
23. 练塘
24. 辛庄
25. 正仪
26. 直塘
27. 双凤
28. 沙溪
29. 吴家市
30. 璜泾
31. 甪直
32. 陈墓
33. 周庄
34. 同里
35. 八坼
36. 平望
37. 震泽
38. 盛泽
39. 黎里
40. 芦墟
41. 金泽
42. 朱家角
43. 泗泾
44. 章练塘
45. 石湖荡
46. 枫泾
47. 西塘
48. 王汪泾
49. 双桥
50. 马王塘
51. 王店
52. 海宁(硖石)
53. 濮院
54. 斜桥
55. 长安
56. 乌镇
57. 练市
58. 南浔
59. 织里
60. 双林
61. 善琏
62. 新市
63. 菱湖
64. 塘栖
65. 上柏
66. 小斜桥





漫而又辛酸、欢腾而又流离的大半年的水上生涯。

他们白天在舞台上，扮演着帝王将相的忠奸贤愚，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晚上则蜷伏在船舱里，在筋疲力倦、颠簸动荡中睡着。他们没有心情欣赏江南水乡的春光和秋色，他们想的是如何度过现实的艰难岁月。

当他们“梦回莺啭”时候，已经是“杨柳岸，晓风残月”了。他们如花似锦的青春，就这样在“似水流年”中溜过去。

一江风

全福班有自己独特的船队。它们由苏州阊门解缆。“阊门”表示“昌”盛的意思。清末，阊门是商业繁荣的地方。这种船苏州人叫它“乌舢船”（我想就是鲁迅说的“乌篷船”），都是绍兴帮的，两头尖，吃水浅，赶路快，一天或一夜可以航行一百里。

每到一个码头，就有人群聚集在桥头岸边欢呼：“全福班来了，唱一台戏吧！”即使没有预定在这小码头唱戏，只要不耽误前面大码头的日程，他们总是高兴地停下来，满足乡镇人群的愿望。遇到了大风雨，就停留在任何一个码头上。船队总是趁着“一江风”，顺利地航行，以便一个码头接着一个码头唱戏。

这个船队至少有三只船，外表和内舱都不相同。演员阵容较强的时候，也会有四五只船。第一只船装载衣箱和道具，主要一个箱子叫“青龙箱”。第二只船是艺人们住的，主要的一个铺位叫“天王铺”。第三只船是伙食船。

青龙箱

上面不是说“乌舢船”船头船尾都是尖的吗？可是这只先行船，船头不尖，方头大脑，吃水很重。船头上横放着一个高二尺半、宽二尺、长七尺五寸的长方形朱红漆的箱子。箱子正面从右到左，有三个粗大的黑字“全福班”。人们老远就能见到船头上

这个朱红耀眼的箱子。

这个箱子叫“青龙箱”，俗名“靶子箱”，里面放的是演戏用的刀、枪、剑、戟等道具。其中有一把关公用的“青龙偃月刀”，这就是青龙箱的由来。

箱子放在船头，有两种作用：一是全福班招揽生意的招牌；二是告诉走江湖的人，这箱子里都是武器，你们可别来找麻烦！据说，早先确是有真武器藏在舱板下的。可是江湖上的人从来也没有侵犯过他们。大家都是吃江湖饭的，不但不找麻烦，反而互相帮助。以后，船上不再带真武器了。

普通的船，见到这只方头大脑的、载着大红箱子的船，都乐意让它先行。这只船不到码头，戏就开不了锣。没有它就像孙行者没有了金箍棒。所以这只船必须早五六小时开出，以便及时配合演出。

“青龙箱”是这只船上最大的箱子。舱里还有大衣箱、二衣箱、盔头箱、巾帽箱、旗包箱、靴箱、场面箱等。大衣箱放的是大件戏衣，如帝王将相的龙袍和官衣，有趣的是里面必须夹一件东补一块红、西补一块蓝的乞丐穿的衣服，美其名曰“富贵衣”。二衣箱是武将的甲胄、靠旗等。三衣箱是普通服装。盔头箱和巾帽箱，分别放武人的头盔和文人的头巾和帽子。旗包箱放的是旗帜伞盖和其他道具。靴箱是放各种靴子和鞋子。最后一个场面箱，放各种伴奏乐器。

对待这些箱子有许多禁忌，尤其是青龙箱，艺人们不能脚踏，更不可坐在箱子上。惟一例外是演小丑的可以坐。他们认为戏剧的祖师爷“老郎”，就是唐明皇。他喜欢混在“梨园子弟”中串戏，而且喜欢演小丑。因此小丑在前台可以“插科打诨”，在后台不但可以坐戏箱，而且是第一个化装的人。要等他在鼻子上画了一块“白豆腐”，再勾上几笔黑——“黑白分明”，就是说唱戏的目的是分清是非，辨明忠奸，劝人为善的意思，然后其他角



色才能抹彩上装。

各个箱子里的衣服道具,都有一定的放法。下一代"昆曲传习所"的"传"字辈第一次走江湖时,来不及做箱子,还是借用了全福班的青龙箱放在船头上。各地乡镇的老人见到它,像见到亲人一样,都奔走相告:"老全福班来了!"

这只船的顶篷和舱板可以拆卸,以便搬运箱子。顶篷上放一个长梯。梯子有许多作用,到岸上可以做搭草台之用。真是一只奇异多彩的船。

天王铺

第二只船,外表和乌舢船一样,但是舱里的铺位,却与众不同。没有前舱后舱,是一个大统舱。普通艺人睡在舱的两侧,是上下两层直长的通铺。上铺睡的是官生、老生、正生等,下铺睡的是付、丑、花旦等。当中有个较大的横着的单人铺,位置在船尾前面的正中间,离船梢只隔一层舱板,叫"天王铺",是班子里唱第一名大花脸睡的。

提起天王铺,就不能不谈到全福班的班主沈寿林。沈寿林和他的二儿子沈斌泉睡过这张铺,孙子沈传锟也睡过这张铺。祖孙三代都唱过大花脸。为什么大花脸睡这张铺呢?其中有个缘故。

沈寿林的祖上是浙江吴兴做锡工的(过去婚丧大事使用锡器,如烛台、茶瓶、杯盘和各种小摆设)。后来移居苏州,跟苏州的堂名、昆班挂上钩。沈寿林的祖父就能演昆曲。有人说,沈寿林小时候在他父亲的"金凤班"、"银凤班"当过小演员(我疑心"金凤"、"银凤"是"大章班"、"大雅班"的俗名)。

在太平军进入苏州时,沈寿林不过十三四岁,跟随太平军到了南京,做了天王洪秀全一名小亲随。天王升帐时,寿林就吹"将军令"助威。洪秀全很喜欢他,亲昵地叫他"小林"。

当1864年，洪秀全知道大势已去，便把小林叫到身边，给了他一些财物。对他说："小林，回去成家立业吧！你千万替我留一个根！"小林哭着点点头。他回到苏州时，还不到二十岁。家中只剩下一位寡嫂和侄男侄女。他为嫂嫂和侄儿购置了房子，自己参加了"小高天班"。

小高天班解散后，由原来班子里演"作旦"的聚林重新组织班子。聚林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聚福班"。沈寿林在聚福班里，是一位"十门俱全"的名演员。班主聚林去世后，班里的同伴推沈寿林做了班主。聚林和寿林，只差一字。有人认为改作"寿福班"好啦，但沈寿林却改为"全福班"。大家认为改得好：一是"全"字笔划少，写起来眉眼清楚；二是用"全"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意思；三是既通俗又吉利。但谁也不知道沈寿林还有更重要的想法。直到船上特别设立了"天王铺"，船里又有一句江湖话叫做"同船革命"（这句话不许在其他地方讲），这样大家才明白：沈寿林是有意识地纪念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呢！

至于第三只船，是伙食船，放的是柴米油盐，大师傅们起早摸黑替艺人们烧饭做菜。好在江南是鱼米之乡，只要走江湖挣得来钱，有饭大家吃。如码头上有人家生了孩子，怕不容易养大，就向船上"讨饭吃"。艺人们虽然饿一顿饱一顿的，他们从来不吝啬，总是分给孩子一碗饭一杯羹的。



村里迓鼓

全福班在乡镇唱戏，没有戏单，只写一个"水牌"，挂在庙门口或是茶馆的柱子上。戏多在白天演出，如果晚上演，就用"大青缸灯"，缸里注满了油，点的是大把的灯草。把这种灯吊在戏台上，作为照明之用。有一种人叫"排下"，预定乡村各场的剧目。"排下"等于现在剧场的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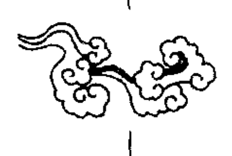
六十六个码头中，以吴江（杭嘉湖线）和甪直（苏松太线）

最盛行昆曲。吴江连傀儡戏都唱昆曲。有个叫“鸿兴”的木偶班子，能唱一百多折昆曲。每年四月底，全福班一定到甪直(甫里)唱几台戏。这里是唐代文学家陆龟蒙(别号甫里先生)的故乡。甪直从来只唱昆曲，不演别的戏。戏台搭在“甫里庙”后面的广场上。开场戏多是“同场”戏，就是在这折戏里，生旦净丑都要上场，如《上寿》、《回营》(《浣纱记》)等。

生旦净丑

全福班走江湖，不是游山玩水，是卖艺玩命。全班角色齐全，这里简单谈一谈他们的阵容。

生行中早期第一名演员自然是沈寿林。据《菊部丛刊》中的《南部戏录》里说：“……苏人以小生负盛名者沈某，佚其名(按，即沈寿林)，周剑泉、强玉泉、赤鼻阿张(应是阿掌，即尤凤泉)咸出其门下。……沈多才多艺，能演巾、官、纱帽、雉尾、黑衣，而无不精妙绝伦……沈子茂泉(海山)、玉泉(月泉)、昭泉(斌泉)、水泉(润福)……[寿林]《白兔记》中的咬脐郎，《铁冠图·别母乱箭》中的周遇吉。自沈死后，无人能演者。”他的二儿子沈月泉和孙子沈传芷继承了他的生行，三儿子沈斌泉和孙子沈传锟继承了他的净行。



全福班的老生后有李子美、李桂泉父子，老外有吴庆寿、吴义生父子。他们父子相传，功力深厚。后期的老生有施桂林、沈金钩，均有独到的表演。

旦行中最负盛名的是周凤林和丁兰荪。各种旦角的戏，周凤林无所不能。嗓子清亮，扮相又好。五旦戏的《题曲》(《疗妒羹》)和《游园·惊梦》的幽娴贞静；六旦戏的《跳墙·着棋》(《西厢记》)的活泼传神；刺杀旦的“三刺”(《刺虎》、《刺梁》、《刺汤》)的跌扑，都是空前绝后的。有时周凤林也当配角。如《水斗》中的蚌壳精“跳蚌”，至如《安天会》的月孛星，简直是在要杂技了。这出

孙行者大闹天宫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全班人马一律登台。有人说，周凤林简直是昆曲中的梅兰芳。

另一位旦角是丁兰荪。据许姬传先生告诉我，梅兰芳的昆曲开蒙老师是"内廷供奉"乔惠兰，苏州人。后来经许伯遒先生的介绍，梅先生又邀请丁兰荪说戏，主要排的是《断桥》、《乔醋》和《瑶台》。《乔醋》是一出很难演好的戏，以五旦当行，要有六旦的底子，才能演得恰到好处。梅先生说，乔惠兰和丁兰荪的精神和身段不相上下，可是丁兰荪有他独到之处，更能丝丝入扣地体贴剧情。许姬传先生小时候，在上海"雅叙园"茶馆里，看过丁兰荪所演《达旦》(《呆中福》)中的葛巧姐。新娘巧姐对替人代做新郎、忠厚老实人陈直十分有意，假新郎却对巧姐十分冷淡，演来极有情趣。陆寿卿演陈直，尤为生动传神，陆是名丑王传淞的老师。

全福班还有徐金虎的花旦，小长生的作旦，又有江湖班加入的刺杀旦双庆和小彩金，一时人才济济。

净行，沈斌泉外，早期有江湖班的祥林与后来有坐城班的茂松、金阿庆。茂松嗓子好，响亮而跌宕有味；阿庆响亮不及茂松，但白口老劲，咬字清楚，嗓音低而宽，适合白面口吻。徐凌云的《昆曲表演一得》曾提到全福班净行的表演艺术。

昆曲在中国戏剧中是首屈一指的，别具一格，有风趣而不庸俗。如《芦林》(《跃鲤记》)中的姜诗，把一个近视眼的书呆子演得穷酸有趣。又如《醉皂》，原来在《红梨记》中仅仅是皂隶的"过场"戏，后来却改为以皂隶为主角的单出戏。它描写一个吃醉了酒的皂隶(衙役)，送请帖请赵汝舟"吃月赏酒"的事，文辞、身段极好，想来是"文人"和"艺人"合作产生的剧目。全福班丑角人才出众。早期以小阿三的丑最为突出，后期有小金寿、小仁生等人。

全福班的艺人们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给后代戏剧留下



了宝贵的表演艺术。

落花时节又逢君

上面谈到全福班的艺人，早已是录鬼簿中的人了，我都没有见到。但我有幸能见到全福班三位先生，他们是尤彩云、沈盘生和徐惠如。

尤彩云是后期全福班演旦的，后因目疾，不能演出。他是“昆曲传习所”的老师，也是我的昆曲开蒙老师。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年大年初二，我父亲把大姐（元和）和我叫到书房里：“小姑娘们，来学唱昆曲，爸爸替你们做花花衣服，上台唱戏，美不美？”因此我们丢下了新年里如“掷状元”之类的游戏，跳跳蹦蹦地被“关”在书房里。尤彩云教得很认真。他教《游园》的曲子和身段，“没揣菱花偷人半面”，杜丽娘和春香照镜的身段。他把着我们的小手，教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花了他多少心血和功夫。

1955年春天，我和胡忌先生去访问尤彩云，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见，我和这位开蒙老师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是传习所的老师中硕果犹存的一位。

他住在苏州一间简陋的小楼上，木板墙上挂了一支笛子。见我们去，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转头对胡忌先生说：“你们是来看李龟年了！”那时，尤老师有了严重的老年病，已经步履艰难，勉强站起来接待客人。我们扶他坐下。三十多年前教我们唱《游园》、诲人不倦的情景，又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问候了他的健康。尤彩云老师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艰苦地在全福班学戏和唱戏。他又说：“昆曲身段不容易掌握。身段有上七段、中七段、下七段。有了这些身段的基本功还不够，还要有一个‘神’字，才能演好戏。”我们怕他太兴奋，谈一会就告辞了。尤彩云就在这年8月1日去世了。我懊悔当时没有追问他，

上、中、下七段是怎样的身段。后来问他的学生,"传"字辈先生也是茫然,也许是尤老师自己教身段的总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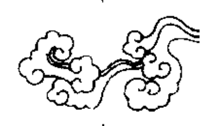
第二位是沈盘生先生。他是沈寿林的孙子(长子海山的次子),全福班最小的演员,在全福班长大的。班子解散的时候,他才十四岁。他的特长是雉尾生,他的《出猎·回猎》可能得到祖父的指点。他的巾生在《玉簪》、《红梨》和《西厢》三记中都有很细致的表演。1956年俞平伯先生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曾请沈盘生做我们的身段老师。我能勉强说几句苏白,在曲社里我曾自告奋勇演过《寄柬》(《西厢记》)和《守岁》(《金不换》)中的书童,身段就是沈盘生教的。《寄柬》中的一段:"盆儿盆,我说的是西游记,东土大唐僧,他往西天去取经。行者来开路,沙僧在后跟,八戒挑行李,白龙马上坐唐僧……",身段不简单,要学孙行者、沙和尚、猪八戒和唐僧的样子,又要"扯四门"。那时候我快五十岁了,老师也近七十了。老师教得一身大汗,我还是学得不够理想。

沈盘生也是生旦净丑无所不教。他教身段讲究"手眼身法步"。我想"手眼"属于"上七段","身"属于"中七段","步"属于"下七段",一个"法"字,也可能相当于尤彩云的"神"字吧?

沈老师晚年在北京这一段时期,最爱到北海公园度假日:渴时在双虹榭泡上一壶茶,饥时吃的是"仿膳"的弟子糕。高兴时倚着栏杆眺望湖上的游艇,困倦时找一块青石板美美地睡一觉。我们也经常在北海公园请沈老师教戏。这些情景,到今天仿佛如在眼前。

1957年6月16日的一次昆曲座谈会上,沈盘生说:"我不愿把身上的东西带进棺材里去,什么人要我教,我一定好好地教。我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文化遗产。我平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把昆曲传下去!"说着说着就哭了。

第三位是徐惠如先生。他在全福班叫徐金龙,是唱花旦徐



金虎的哥哥。九岁学戏,原演小生,因扮相不好,改为音乐场面,有时也演丑角的戏,如《狗洞》(《燕子笺》)之类。他也在“北京昆曲研习社”教曲,为我拍过许多曲子。我记录下来他能吹的昆曲有四百零四折。这样看来,全福班演出的戏可能在四百到五百之间。其中较多的有:《琵琶记》十九折,《荆钗记》十四折,《长生殿》和《铁冠图》各十二折,《十五贯》十一折,《牡丹亭》十折,《幽闺记》八折。所谓“唱煞《琵琶记》,做煞《荆钗记》”,是有事实根据的。

有一次我问徐惠如先生:“昆曲的唱词,像《琵琶记》那样文绉绉的,乡村不一定听得懂。是不是《荆钗记》靠做工,乡村里比较欢迎吧?”徐惠如大不以为然,他说:“不是这么回事,还是《琵琶记》最受乡村欢迎。我在全福班吹得最多的就是《琵琶记》,它连台一唱好几天,台上跟台下的人喜怒哀乐融成一片,那情景才叫动人呢!”他又说:“你别瞧乡村人不懂昆曲,他们才会挑毛病呢!演钱玉莲(《荆钗记》中的女主角)如果带了一只戒指,观众就起哄。他们说:钱玉莲的聘礼只是一根‘黄杨木头簪’,哪里会有金的银的戒指呢?”

以上三位先生于1955年后的二十年间先后去世。最后的一位沈盘生是1975年在苏州去世的。我写此文,谨表我对他们三位的哀悼和怀念!

旱 船

全福班不在江湖唱戏的时候,他们就坐原船回苏州。有家的回家,无家可归的就由班主安排他们的住处。

1977年春天,我在苏州,偶尔听说全福班的后辈——昆曲传习所的演员们,由江湖上回来,曾经住过一位顾先生(忘其名)家里的“旱船”。这不禁引起我的好奇心。打听到地址,于是我做了一次访问。下面是我的日记摘录:

3月12日下午，在斜风细雨中，走过苏州有名的观前街，过了醋坊桥，不久就到了大儒巷迎晓里（原名仁孝里）。主人陪我进了东侧门，经过一条长长的夹弄，穿过大厅（主人告诉我，他小时候，大厅两旁有金瓜、钺斧、旗牌和灯笼），再走过西厢房，就到了所谓"旱船"的所在。

"旱船"，仿佛北京颐和园和苏州拙政园的石舫。但它不在水边，也不是石头做的。苏州过去大户人家，总喜欢搞点园林。掘池堆山做石舫太费钱，所以就用木头造一条"旱船"。它是长方形，像一条没有船头船尾的三间"大统舱"。前后"舱"两边都有窗子，中舱有前后门出进。三个"舱"都不间隔。没有什么上下铺，传字辈睡的是帆布做的折叠床。白天折叠起来，就可以在"旱船"里排戏。夏天还好受，冬天晚上冻得够呛。老实说，看上去"旱船"实在不像船，倒像所谓的"花厅"或是北京故宫的过道厅。

现在，"旱船"已隔成三间，住了人家。我们还是由"中舱"的前门进、后门出。到了后面的一进屋子，有一间极小的东厢房。顾先生说："这间屋子那时住的是朱传茗和顾传玠，他们是昆曲传习所的主要演员。因为有点小名气，所长给他们一间小屋。"现在也住了人家，门儿锁着。我站在门边，似乎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音容笑貌。顾先生又告诉我："你别瞧这舞台上情意相投的小两口子，在台下，在这屋子里，两个人却常常吵嘴打架。"这也难怪，那时他们还是两个小男孩。朱传茗、顾传玠也先后去世。

归途时，雨下得很大。

访问了"旱船"以后半个月，我还是念念不忘全福班。在4月4日，我由苏州坐船去杭州。在苏州南门上船，坐的也是"夜

行船”。我此行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去寻踪觅迹那全福班的航路。

上船后，人静了。我倚靠在船窗上，望着堤岸上的杨柳，一棵一棵地慢慢向后移去，是哪一棵树曾经系缆过全福班的船呢？我们的船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小桥，到了一个小小的码头，这里是不是全福班敲过新年锣鼓的村庄呢？天暗了，朦胧的月色透进了船窗。只听得船头前进的拍水声。渐渐水声也听不见了。江南夜晚的小河上，是多么宁静、安详。

似乎有许多人站立在桥头，我仿佛也在人群中。远远地、远远地来了那有大红箱子的船。红得很，红得好耀眼；大得很，方头大脑的。人群沸腾了，欢呼跳跃：“全福班来了！”大船很快已到了我的身边，撞在桥上了！有人叫：“靠码头啦，吴江到啦！”我睁开眼，码头上的红灯照着我。我望着红灯，想的仍是全福班。



不须曲

我们不敢唱昆曲，连笛子也没有人敢吹，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1978年春天，江苏省昆剧院在南京成立。第一天演出，我坐在小剧场的第八排。

曲子是那般悦耳动听，身段是那般美妙婀娜，使我过去十年铅样重的心，一下子变得轻松了。我抛却了十年的悲惨世界，像插上翅膀飞入了童话中的神仙世界。我飘飘然，心中又甜又酸又有点苦。我偷偷摘下眼镜，揩拭腮边的眼泪，是苦水，也是蜜水。



一句“梦回莺啭”（《游园》第一句），唤醒了我六十年前童年的梦。记得那年大年初二，家里人多。新年有很多玩意儿。我和大姐元和喜欢“掷状元”。可我爸爸反对赌博。他把我和大姐叫到他平日不让我们进去的小书房里，用花花衣服和上台唱戏引诱我们。我姐妹俩就乖乖地跟尤彩云老师（全福班唱旦的）学《游园》的曲子和身段。

小书房里明窗净几。一套笨重的紫檀家具。满屋书籍，四壁字画。我们毫不理会。我有兴趣的是小书房外的一个小小院落。其中的一座太湖山石上，种着芭蕉。我喜欢那棵青翠的芭蕉，它在春夏之际，更青翠得可爱。我母亲的书房和我父亲的书房当中就是这芭蕉院子。直到现在，我记忆中的芭蕉还是那般青翠，像王维画里的“雪中芭蕉”，永远翠生生的——王维没有画错。

在南京，第一天我看完戏，已是黄昏，回到四弟宇和苜蓿园

的家。夜色迷蒙中，我觉得苜蓿园是“姹紫嫣红开遍”。春天，春天毕竟来了。四弟给我一封美国四妹充和寄来的信，信上说，几年前“有人”在她演出《思凡》之后，送她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一曲《思凡》百感侵，京华旧梦已沉沉。
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无此音。

我不以为然，和了“有人”两首诗：

十载连天霜雪侵，回春箫鼓起消沉。
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
卅载相思入梦侵，金陵盛会正酣沉。
不须怕奏阳关曲，按拍归来听旧音。

我回到北京家里，很快就接到四妹的信，信里有两首诗。“答允和二姐观昆曲诗，遂名曰《不须曲》”：

委曲求全心所依，劳生上下场全非①。
不须百战悬沙碛②，自有笙歌扶梦归。
收尽吴歌与楚讴，百年胜况更从头。
不须自冻阳春雪，拆得堤防纳众流。③

有一天，万枚子先生寄来两首诗。“读允和姐佳作《不须曲》，奉和两首，并希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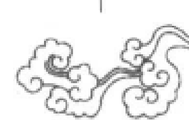
① 在美演剧无上下场。

② 充和在美二十六年中，前后在二十三个大学演唱昆曲，甚为辛苦。

③ 充和给叶某诗有：“但求歌与众，不解唱阳春”。



张元和、张允和姐妹在美国同台演出昆曲《牡丹亭》，这时她们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



忘却十年噩梦侵，波涛四涌几浮沉。
不须俯仰人双劲，一曲高歌济世音。
依旧阳春白雪讴，民生国计上眉头。
不须铅粉添英气，吟尽古今天地流。

我后来又和了"有人"一首：

闻歌《寄子》泪巾侵，卅载抛儿别梦沉。
万里云天无阻隔，明年花发觅知音。

这首诗也是在南京看昆曲引起的。我坐在第三排下场角，左手坐的是俞振飞先生，右手坐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项馨吾先生。我正看到包传铎、包世蓉父女演出《浣纱记》的《寄子》，忽然感觉项馨吾老先生哭得伤心。我吓了一跳，问项老："怎么啦？"项老抽噎说："我去美国，把儿子斯伦寄在上海三十年，三十年！"项老泪痕满面，我握着他被眼泪弄湿了的手。台上正演到伍子胥的儿子晕倒后苏醒，几声哭叫"爹爹在哪里？"台上台下哭声相应。我也陪着流泪了。散戏时，在门口遇到项斯伦，看来还没有三十岁。项老为我介绍。我一看，笑了："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朱传茗。"项老也笑了："可是他一句昆曲也不会唱。"

、我把《不须曲》寄给南京的谢也实先生，我是在南京小剧场第一次认识他的。那天，坐在我右边一位先生满口扬州话。扬州是我母亲的出生地，和镇江一江之隔。我们相互请教姓名之后，我告诉他："1937 年 7 月 1 日，我们曾在镇江江苏省立医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演过昆曲。"谢先生说："不错，确有其事，就是我父亲主办的，我的弟弟还记了日记。"

当时有一个小插曲：我儿子晓平，那时三岁，让保姆钟妈带去看戏，坐在第一排。那天我演《游园》中的春香，一出场，晓平指着我大嚷："妈妈！"观众大笑：怎么叫这小姑娘"妈妈"！抱晓平的钟妈说："真是他的妈妈！"

谢先生很快回了诗两首：

何期一曲识知音，提起京江丝竹情。
白发红颜惊梦里，莺声犹绕牡丹亭。
点点秋霜岁月侵，京江旧友几升沉。
鱼书寄语天涯客，莫负天波赏佳音。

另有一首是胡忌先生写的，他是我的昆曲师兄弟。我那时

住上海山阴路东照里，胡住山阴路恒盛里。由赵景深先生介绍，他到我家跟我的老师张传芳学昆曲。他二十多岁时写了一本《宋金杂剧考》，现在他正在美国研究昆曲史。诗中“平桥”就是苏州我的娘家所在地。胡忌诗步我四妹的韵，如下：

俚曲俗词无所依，狂歌醉草是邪非。
年来百物催霜鬓，惟愿平桥踏月归。

要解开“有人”的谜，且看当年(1978)11月17日我的日记：

我向不送往迎来，今天破例去送傅汉思（四妹充和的夫婿，洋人，耶鲁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同去送行的有周有光和张之佩。我们是下午2点3刻到了飞机场，3点半到了接待室，见到刘仰峤、夏鼐等人。4点半，汉思最后来，他在外面找我们，不知道我们已先被接待了。汉思是美国汉代文学代表团的副团长，他介绍了他们的团长余英时教授。我就坐在两位团长的中间，和余团长讲了不到十分钟的话，他们就上飞机了。

余英时教授一见到我，说我很像四妹。我说：“我今天一半来送汉思，一半来拜望您！我知道您太忙，在您访问的时候，不敢打扰。”他说：“是的，我在来飞机场的汽车上就睡着了。”我说：“我糊里糊涂和了您三首诗，直到今年8月四妹充和回来探亲时，才知‘有人’就是您，我真是胆大妄为！”他说：“那是十年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写的，您的诗和得很好。”他又问：“您是老几?”我告诉他，“我是老二。老三兆和，她的丈夫是沈从文；今天他们派儿媳来送汉思。”我介绍了他们的儿媳张之佩。余教授又问：“近来写诗没有?”我笑了：“我十年写不上十首诗，我不会



做诗，四妹能写。近来我写了一篇《全福班走江湖》，已交汉思带给四妹，请您指教。”

八年之后，我又收到第十二首《不须曲》，是扬州曲社郁念纯先生写的。“次韵允和先生《不须曲》，敬奉郢正。郁念纯呈稿，1986年3月”：

九畹才苏暴雨侵，钧天广乐十年沉。
不须重话昆池劫，梁魏于今有嗣音。

“不须曲”的首创者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和者络绎，这是国内外昆曲爱好者谱写的心声，道出对祖国昆曲艺术的关心和希望。愿昆曲艺术传之后代，愿兰花香溢海内外。



（1985年8月12日）

风月暗消磨，春去春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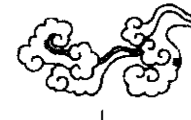
五十五年前，我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我们女同学会有一个昆曲组，请童伯章教授教我们昆曲。他教的第一支曲子《牡丹亭·拾画》的第一句是“则见风月暗消磨”。伯章老师那时已须眉斑白，他眯觑着眼，微微摇头，一板三眼替我们击拍子。这神态今天还在我的眼前。

女同学们都想看看舞台上的《拾画、叫画》是怎样的。那时，仙霓社正在上海大世界演出。顾传玠常常和朱传茗合演《惊梦》。有时演所谓全本《牡丹亭》，但也只演到《冥判》，不见演《拾画、叫画》。我的大姐张元和同我一道，还有几位女同学，冒冒失失地写了一封信给顾传玠，请他唱《拾画、叫画》，果然如愿以偿。

大世界是流氓横行的地方，大学生很少去光顾，尤其女学生不敢去。我们邀了几位男同学做保镖，叫了出租汽车，浩浩荡荡去看《拾画、叫画》。仙霓社在大世界三楼一间大厅里演出，进门要另外买票。舞台很小，照明也差，座位一百多，还常常坐不满。

顾传玠出场了。场子里是那么安静。观众屏声息气，听柳梦梅婉转悠扬、回肠荡气的歌声。顾传玠把汤显祖笔下的那个柳梦梅演活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这次我看了浙江昆剧团汪世瑜的《拾画、叫画》。戏在北京第一流的人民剧场演出。舞台很大，灯火辉煌，



一千几百人的大场子坐得满满的。这气派大大胜过了从前。

汪世瑜出场了，一句引子“惊春谁似我”，就抓住了观众。场子里也是那么安静，一千人的安静跟以前一百人的安静，在意义上是大不相同的。《颜子乐》和《千秋岁》两支曲子，唱来婉转流利，博得掌声阵阵。叫画前，展开了画轴，先以为是观音，后以为是嫦娥，看了画中人的题诗，才知道是人间女子。最后再细细一看，“似曾相识，何方会我?”回忆起来是他梦里的情人。汪世瑜演来层次分明，点清了剧题的“叫”字。那三声对梦里情人的呼唤：“小娘子、姐姐、我那嫡嫡亲亲的姐姐!”一声比一声缠绵、亲热。汪世瑜的柳梦梅，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又一次把汤显祖笔下的柳梦梅演活了。

幕落下来，在几次谢幕的狂热掌声中，演出结束，许多观众在擦眼梢。我也眼泪润湿了老花眼。我是又伤心，又欢喜。伤心的是我的大姐夫顾传玠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欢喜的是“世”字辈的汪世瑜继承顾传玠的精湛艺术，而且更细腻更优美。这是周传瑛老师教导有方，汪世瑜同志刻苦用功，所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我到了后台，紧握着世瑜的手，猛然间看见他的笑窝，这笑窝多么像传玠呀。

风月消磨了“似水流年”，可是这笑窝会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曲谜传友情

引 子

我年老多病，好久没有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活动。从1992年到1995年，连续四年，我每年邮寄十个曲谜，向曲友们贺年拜节。



意难忘

下面是四次的四十个曲谜：

第一次十个曲谜：

(1)曲园家住禄米仓(曲人)　　(2)梁祝相会剧(曲人)
(3)子陵到子牙水边垂钓(曲人)　　(4)吾皇万岁(曲人)
(5)文词第一佳妙(曲人)　　(6)姜太公在此(曲人)
(7)纷纷鹅毛飘扬(曲人)　　(8)伯喈是君子(曲人)
(9)汉语热(曲人)　　(10)朱复录(剧名)

谜底：1. 俞粟庐，2. 楼宇烈，3. 严渭渔，4. 谢锡恩，5. 章元善，6. 胡忌，7. 洪雪飞，8. 蔡正仁，9. 华文漪，10.《双红记》。

第二次十个曲谜：

(11)囍(剧名)　　(12)鲲冲万里(曲人)

(13)寻子(剧名)　(14)洋娃娃(剧名)
(15)突(剧名)　(16)七夕相会(曲牌)
(17)忸怩(剧词)　(18)台有四角(脚色分类)
(19)艳(剧词)　(20)皆大欢喜(曲牌)

谜底:11.《双官诰》,12. 俞振飞,13.《访鼠》,14.《番儿》,15.《狗洞》,16. 鹊桥仙,17. 男有心来女有心,18. 生旦净丑,19. 姹紫嫣红开遍,20. 天下乐。

第三次十个曲谜:

(21)劝君更尽一杯酒(曲牌)　(22)酒卮中有好花枝(曲牌)
(23)万里送行舟(曲牌)　(24)女孩儿家没半点轻狂(曲牌)
(25)剔银灯(曲牌)　(26)三千钟爱在一身(剧名)
(27)一枝红杏出墙来(剧名)　(28)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剧名)
(29)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30)弄粉调朱(剧名·曲牌)

谜底:21. 倾杯乐,22. 倾杯玉芙蓉,23. 一江风,24. 端正好,25. 光光乍,26.《独占》,27.《花荡》,28.《刀会》,29. 惊艳,30. 描容·点绛唇。

第四次十个曲谜:

(31)赤壁鏖兵(曲牌)　(32)与众同乐(曲牌)
(33)知识分子座谈会(曲牌)　(34)孔夫子哭弟子(曲牌)
(35)千呼万呼始出来(曲牌)　(36)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

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曲牌)

(37)怎禁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曲牌)　　(38)头脑简单(剧名)

(39)向群众调查(剧名)　　(40)酒阑人散(剧名)

谜底：31. 满江红，32. 快活三，33. 集贤宾，34. 泣颜回，35. 声声慢，36. 念奴娇，37. 眼儿媚，38.《思凡》，39.《访普》，40.《罢宴》。

传友情

首先，我要提到的是上海陆萼庭先生。他对我的第21个曲谜，谜面和谜底中都有“杯”字，觉得不妥(谜面“劝君更尽一杯酒”；谜底“倾杯乐”)。原来我把“杯”和异体字“盃”，糊里糊涂作为两个字。陆萼庭先生来信说：“‘倾杯乐’的谜面最好用《刺虎》中一只虎的白口，‘干，好快活，好快活！’徐凌云为项馨吾配一只虎如此。如依曲本，则为‘干，喜煞人也’，也可。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我当即复信，感谢他的指正。信后，在署名允和前写了一个字谜是：“二人行必有我师”(徒)。很快，萼庭先生来了复信：“您的二人行必有我师的字谜，正是妙极了。上初中的时候，有位长辈知道我喜欢看戏，就说考考你，‘总是小生的不是’，打《孟子》一句。我《孟子》不熟，先就心慌了，马上交了白卷。原来谜底是《孟子》上的‘平旦之气’。”

其次，我们北京曲友樊书培先生，他两次来信，特别夸奖我。书培先生1994年12月的信：“奉赐贺节书及曲谜，无任欣喜。以谜会友，以谜贺节，而均不离曲，诚属创举。且持续四年，更为难得，似可载入吉尼斯大全。弟不揣鄙陋，回奉五则。量仅一半，质更差之千里，续貂之作，以博一笑耳。”樊先生的曲谜如下：



(1)行来旖旎身不定。	(《亭会》句,打曲牌一)	步步娇
(2)别了他,常挂心。	(《琴挑》句,打曲牌一)	意难忘
(3)和尚我的爹爹。	(《下山》句,打曲牌一)	秃厮儿
(4)卖油郎等着花魁女。	(打曲牌一)	醉扶归
(5)少年杂技。	(打曲牌一)	耍孩儿

他信中请我选若干曲谜,编入《社讯》。朱复先生又说,可以把40个曲谜,全部编入《社讯》。

朱复先生和宋铁铮先生提出意见,第32条曲谜,"与众同乐",打"快活三",不是三个人,有我在内是四个人。应该改"众乐(yue)乐(le)"。铁铮先生还说,第34条"孔夫子哭弟子",太俗了。

大多数曲友写信打电话,大大夸奖我。吴新雷先生来信:"你的'知识分子座谈会',打《集贤宾》,'向群众调查',打《访普》,真是神思妙绝。"

孔相如女士信中说:"谜面谜底如此天衣无缝,足见张先生深厚古典文学功底。"我的毛病是喜欢人家夸我,但是如果有人批评我、指正我,我更高兴。

尾 声

严渭渔先生非常欣赏我打他的名字谜(3)"子陵到子牙水边垂钓"。我们住得很近,时有来往。严先生拿来一个剧谜(不知是谁做的):谜面"大哥大";谜底"奇双会"。我认为这个剧谜,做得极好。这样,我的曲谜不免逊色了。

希望我在来年能再献给曲友十个曲谜。

(1995年4月5日)

附：

第五次贺岁曲谜

亲爱的曲友：

祝福　您：

一帆风顺、事业有成；四季平安、身体健康；

八面玲珑、恭喜发财；十个曲谜、供您玩赏。

(1)没揣那菱花偷人半面	(剧名)	照镜
(2)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	(剧名)	南浦
(3)不才明主弃	(剧名)	辞朝
(4)打开天窗说亮话	(剧名 2)	阳告
悄悄话		阴告
(5)360 度	(戏剧术语)	圆场
(6)打夯歌	(戏剧术语)	小工调
(7)脱榫	(戏剧术语)	散板
(8)丈八蛇矛	(戏剧术语)	长尖
(9)洛神	(曲牌)	临江仙
(10)树木杈桠	(剧中人)	林冲

愿　您春节好！元宵快乐！

张允和

1996 年 2 月 7 日

第六次贺岁曲谜

亲爱的曲友：

春节、元宵节，节节平安！

牛年、丰收年，年年有成！

曲谜：

(1)除夕	(剧名)	《守岁》



(2)朕与先生解战袍　(剧名)　《卸甲封王》
(3)吻　(西厢记曲词)　悄声儿窥视
(4)青青子衿　(曲牌)　皂罗袍
(5)日上三竿　(剧名、卷帘格)　端阳
(6)马嵬坡下泥土中　(剧名)　埋玉
(7)鬼送亲　(剧名)　嫁妹
(8)去除白内障　(剧名)　开眼
(9)欲穷千里目　(曲牌)　上小楼
(10)起来携素手、玉户无声　(曲牌)　夜深沉

加两个诗词谜,为你添寿:

(11)明月几时有　(古诗篇名)　天问
(12)秋光胜似春光　(唐诗一句)　霜叶红于二月花

祝

您健康、快乐!

张允和

1997年1月27日

第七次贺岁曲谜

亲爱的曲友:

奉上曲谜十个，供您欣赏。祝您虎年生活工作虎虎有生气!

(1)新婚之夜　(剧目)　花烛
(2)离骚　(曲词)　怎禁她临去秋波那一转
(3)莲花落　(曲牌)　风吹荷叶煞
(4)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　(曲牌2)　字字双　叠字令
(5)写检讨书　(曲词)　你纸笔只供招详用

(6)相如抚弦、引逗文君	(剧目)	琴挑
(7)小苗条吃的是夫人杖	(剧目)	拷红
(8)景阳岗上武二逞强	(剧目 2)	打虎
路头巷尾武大卖饼		游街
(9)淡妆浓抹总不宜	(曲词)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10)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剧目)	豪宴

张允和

1998 年 1 月 10 日

第八次贺岁曲谜

亲爱的曲友：

兔年快快跑，不要睡大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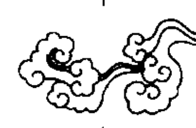
弃我去者昨之日不可留，抓住现在。

祝您　春节、元宵节、节节高！

(1)连升三级	(剧名)	跳加官
(2)人生七十不希奇	(剧名)	不伏老
(3)吾皇万岁	(曲牌)	朝天子
(4)骨渌老儿不寻常	(曲牌)	眼儿媚
(5)脚根儿将心事传	(曲牌)	步步娇
(6)侃侃而谈	(曲牌)	叨叨令
(7)沿街叫卖的孩子	(曲牌)	货郎儿
(8)铺张浪费	(曲牌)卷帘格	金钱花
(9)金刚怒目，罗汉挥拳	(曲牌)	菩萨蛮
(10)man	(剧中人)	西　施

张允和

1999 年 1 月 15 日



人得多情人不老

纪念俞平伯先生和许莹环夫人

画眉序

我的梳妆台上，有一个粉紫色的长方形塑料盒子。这是四十年前俞平伯夫人许莹环大姐送我的，那时候塑料这玩意儿还很稀奇。四十年来，我天天清晨梳妆，必须由这个盒子里取梳子，梳理我的白发，时间过得真快，我也是八十七岁的老奶奶了。

我家的前门在朝阳门内南小街，大门的斜对面就是老君堂，是俞老的故居。这是我四十年前三天两头常去的地方。俞平伯夫妇的画眉居和我们的画眉居，相距只有两百米。斯人已乘黄鹤去，只有望“堂”兴叹，再也不能去老君堂了。

沽美酒

1959年10月8日，是个好日子。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国宴。这是一次不平凡的宴会，有五百桌客人。他们都是参加国庆汇演的全国戏剧团体。我们的北京昆曲研习社，参加了这次宴会，是惟一的业余戏剧团体。我们曲社参加宴会的是俞平伯社长和我，我是联络组长（俞先生出席宴会，总是捎带了我）。这是我们北京昆曲研习社参加全国戏剧汇演的一次盛大的宴会。

我们曲社参加的剧目，是由华粹琛整编的汤显祖的全本《牡丹亭》，最后由俞先生修订，是解放后第一个全本《牡丹亭》。

北京昆曲研习社在1956年8月成立。成立不久，华粹琛先生就着手整编《牡丹亭》。三年中，多次排练、多次修订，才搬上了舞台。

1959年，曲社社员不到百人，可是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工作。主要演员是：袁敏宣的柳梦梅、周铨庵的杜丽娘。次要演员是：范崇实的杜宝、伊克贤的杜母、十二岁许宜春的春香、我的石道姑等人。不谈主要演员排演的次数也罢，就是一折《婚走》，只有四五分钟，袁敏宣、周铨庵、单耀海和我四个人，排练了百次以上。我们每到星期六晚上，就在和平门陆剑霞家排练。有时候排到晚上11点钟。我住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关了大门，我只得住到北池子袁敏宣家。

好姐姐

我们曲社有八位大姐，她们是：许宝驯、许宝骒、陆剑霞、袁敏宣、伊克贤、苏锡龄、郑缤和我（张允和）。许宝驯（号莹环）是俞平伯先生的夫人，可是这许多小妹妹没有一个人称呼她俞太太或俞师母，我们都叫她大姐。大姐对我们好得很。我一星期最少要去老君堂两次。有时候就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吃饭。大姐总是热情招待。

有一年夏天，我的大弟张宗和由贵阳来。我和有光带大弟一同到老君堂开社务会议。这些委员们大吃大喝了一顿。下午忽然雷雨交加，来势十分凶猛。雨还没有停，客人大多走了。大姐留下了我和大弟，还有有光，要我们三人等雨停了再走。雨老不停，只好又吃了晚饭。好不容易雨停了，我们正预备走，可是有人告诉我们："外面水有两尺多深，汽车、电车都不通"。这下



我们急得不得了。大姐说:"急什么,今晚就在我这儿将就睡一晚,好在是夏天。"我们三人在沙发上、藤椅上度过了一宵。

意难忘

我最难忘记平伯先生和莹环大姐，他们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学问、研究昆曲,都让我钦佩得五体投地。平伯先生写的曲社章程,到今天还是我们曲社的规范。

我是曲社的联络组长，可是也做一些文书的工作。譬如编《社讯》、写说明书、写新闻稿、普通来往信电等。我写的这些小稿子,都让平伯先生过目,他都仔细看过、改过。我们每一次演出的说明书,他都要我查这折戏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作家,万一查不到姓名,不可不查清朝代,姓名要写上无名氏。

平伯先生不但是我的曲社社长，也是我的最后一位循循善导的老师。我的一些杂文、歪诗,好多都经过平伯先生改过。平伯先生是我的恩师。

社委中有一位许世箴老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世箴先生在我改写的现代戏《岗旗》上，对我用曲牌写曲子，给了我八十分。我在北京曲社先后工作了十六年，也是学习昆曲的最好的年代。平伯先生和世箴先生都已经作古，他们对于昆曲的贡献是不朽的,也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

尾声

我们在北京昆曲研习社度过了四十个春秋。虽然有十五年的停顿,曲友们群策群力、团结一致,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我们要继承昆曲先驱者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

(1996 年 10 月 6 日)

长相忆

人得多情人不老
多情到老情更好



黄山归来寿莹环大姐

黄山青翠不老松,
不畏顽云加疾风,千年挺秀奇石中。
天女花开依莲峰,
婀娜清丽傲天工,异香不与凡花同。
流水高山知音有,琴和瑟调两心融。
绝世丰姿神秀骨,恬淡心闲气度宏。
耐圃地窄可耐耕,姹紫嫣红碧翠笼。
无圃心田天地阔,胸怀若谷意气雄。
赤脚融融乡居乐,辛劳处处自从容。
白首商量丝与竹① ,清商一曲曲味浓。
老君堂,君不老,
十八年前犹忆阻归雷雨隆。
永安里,里永安,
八十华年酒晕荷花交映红② 。
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① 俞平伯老终年赤脚,下放农村亦然,我们叫他赤脚大仙。

② 莹环姐阴历六月二十七日生,正值荷花盛开时,每饮酒,红晕上腮,与白发相映。

难途有寄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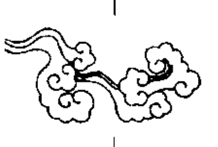
一

岁岁客天涯，夜夜梦还家。
青草漫山碧，孤村月又斜。

二

梅黄桔绿时，归期未有期。
易别难成聚，花飞知不知？

（1943年于重庆迁往西安途中）



过南园乌鹊桥故居(四首)

细细沧浪水,迢迢远客情。
旧巢双燕子,低语近黄昏。

再过乌鹊桥故居

乌鹊桥边玫瑰乡,红楼青瓦旧门墙。
何须鬓插闲花朵,风过妆台闻妙香。



三过乌鹊桥故居

依依杨柳宅边栽,桃花落尽菜花开。
堪笑痴儿顽劣甚,也学小犬溪浴来。

四过乌鹊桥故居

忆昔南园踏青时,一双儿女笑语痴。
事变仓皇西蜀去,痛煞稚兄哭妹诗。

长安喜遇咏莲①

浮云二十载，邂逅长安道。
尾车怯相认，仿佛童年貌。
心切夜书来，梦醒疑君到。
急践昨宵约，中途喜相抱。
语多不择词，情重颇唠叨。
叹息废王基，乐园沦蔓草。
犹忆五子棋，日长茅亭小。
好强争落子，互逐梅椿笑。
粉墨共登场，一双情意俏。
佳会易纷争，我喜君却恼。
世乱苦别离，今逢幸健好。
何日干戈靖，归去觅年少。

（1944年4月10日）

① 抗日战争时期，短期住西安。一天，允和从前在苏州乐益女中的同学阮咏莲在途中看见允和坐在黄包车上，生怕看错人，不敢叫唤，就跟着车走。车到小巷的一个门口停下，坐车的人进门不见了。晚间，允和已经上床睡觉，忽然收到阮托人送来的一封信，询问日间坐车的是否姓张。看了来信地址，允和立刻想要去看阮，可是太晚了，只能回个字条约明天相见。夜里，允和梦见同阮相叙，醒来只有一封信在枕边。

第二天清早，允和带着晓平到阮家去，半途遇到阮也带着她的孩子走来看允和。同回家中，欢谈同学时代，下棋争子、悔输逃追、登台演戏、细故相恼，如此等等。宛然眼前，屈指整整二十年了。

有光从五七干校回京，偶然看见撕破了的旧纸上写着这首允和给阮的旧诗；引起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东奔西走的种种回忆，算来又过了二十七年了。为了留住生活史上的一个点滴，有光抄了这首诗，并写了后记，跟允和同看一笑。

1971年12月3日

周有光注

后　记

许宜春

我与张允和女士认识和往来是缘于昆曲这枝幽香典雅的兰花。1956年俞平伯先生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社长，我爷爷许世箴任副社长，我是当年曲社最小的曲友，只有十一岁。张女士和她的夫婿周有光先生是刚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的新曲友。他们在曲会的彩排上听了我的演唱，便对我爷爷说他们曾失去一个女儿，要我当他们的干女儿。从那时起，我便一个干爹，一个干妈地称呼起来。我曾和张女士同台演出过《牡丹亭》，至今我们都保存着被周总理接见的照片。小时候，干爹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而干妈则是一位清秀、文弱、温柔贤淑的家庭主妇，她勤俭持家，烧得一手好菜，又善于教育孩子，因此我放了学就爱往干妈家跑，她除了教我唱昆曲外，还教我读书、做人的道理。她还教我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今天我还能背诵好多篇。



张女士勤勉聪慧，是一名才女，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她酷爱昆曲，不但擅长清唱、表演，还对昆曲有很深入的研究。她写了几十首曲谜，如：

马嵬坡下泥土中(剧名)——《埋玉》

去除白内障(剧名)——《开眼》

青青子衿(曲牌)——《皂罗袍》

若不是对昆曲的剧目、剧本、剧牌、曲牌非常精通，是无法想出如此绝妙的曲谜的。她昆曲底子好，还写得一手好散文，文笔娟秀，俏皮幽默，如《王觉悟闹学》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年仅十一岁的她教四妹充和读书的故事，她给充和改名为王觉悟，于是姐妹间引起一场妙趣横生的斗嘴，字里行间充满了悠悠的骨肉之情。数十年后，四妹与洋女婿回国探亲，老姐妹回忆起童年往事，都不免哈哈大笑；《本来没有我》描述的是张女士的诞生经过，惊险曲折，风趣感人；《温柔的防浪石堤》是一首初恋女孩含蓄而温馨的诗，是她老年回忆少女时代的杰作。

读了张女士的散文，我有许多感慨：她出生时是个只有四斤重的早产婴儿，刚来到人间就要与死亡搏斗，可就是这个娇小的生命一直活到了八十八岁的今天，还在为周围的人们做那么多的好事，为社会奉献那样多的爱。曾经得到她帮助的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还有小朋友，既有旧社会的昆曲艺人，也有解放以后的贫困曲友。她既能和画家、医生、教师、记者、学生往来，也能和保姆成为知心朋友。今天她的散文集出版了，真是件大喜事。将有更多的人从中感受到她的才慧和美好的生活情趣。

张女士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她和周有光先生结婚时，算命先生称他们只能活到三十五岁，她五十岁就患有严重到登峰造极的心脏病，做过胆囊切除手术，用她自己的话说牙齿是假的，眼睛是假的（清除白内障植入人工晶体），如果她听信了那个算命先生的话，从而陷入了悲观、沮丧、绝望，恐怕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美国作家海明威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打倒自己，世间就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他。"张女士快乐地活到今天，她想的是健康人常想不到的，所做的是许多青年人难以做到的，和她在一起，就能感受到信心、勇气、乐观和充实，感受到她那一片赤子之心。

张女士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大胆尝试新科学、新技术。受周先生的影响，她八十六岁时开始学习用电脑写文章。有人说，年龄这一概念是，你认为自己有多大就有多大。你若认为自己衰老，果然就老气横秋；你若认为自己年轻，果然就生机勃勃。岁月只能在人的皮肤上留下皱纹，失去对生活的热情才能使人的心灵起皱。

晚霞因她的美丽动人而使朝霞惭愧。从张女士的散文中可以看到，她的众姐弟如今虽已白发苍苍，散居世界各地，但手足之情一如当年；可以看到上一代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抱负，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物质生活清贫素朴，精神世界却异常丰富。他们就像水一样，因为柔，故能随遇而安；虽然柔，却力量最大——水，可将沙漠变成绿洲。

人的一生必然从青年走向老年，只要珍惜和把握，无论在哪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创造人生美境。从张女士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她做得十分认真，而且美丽动人。

（1997年6月19日）

